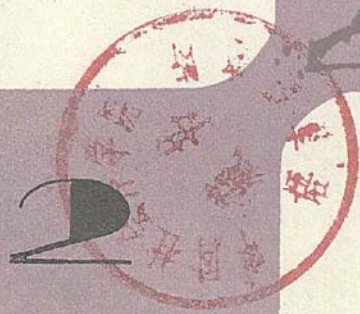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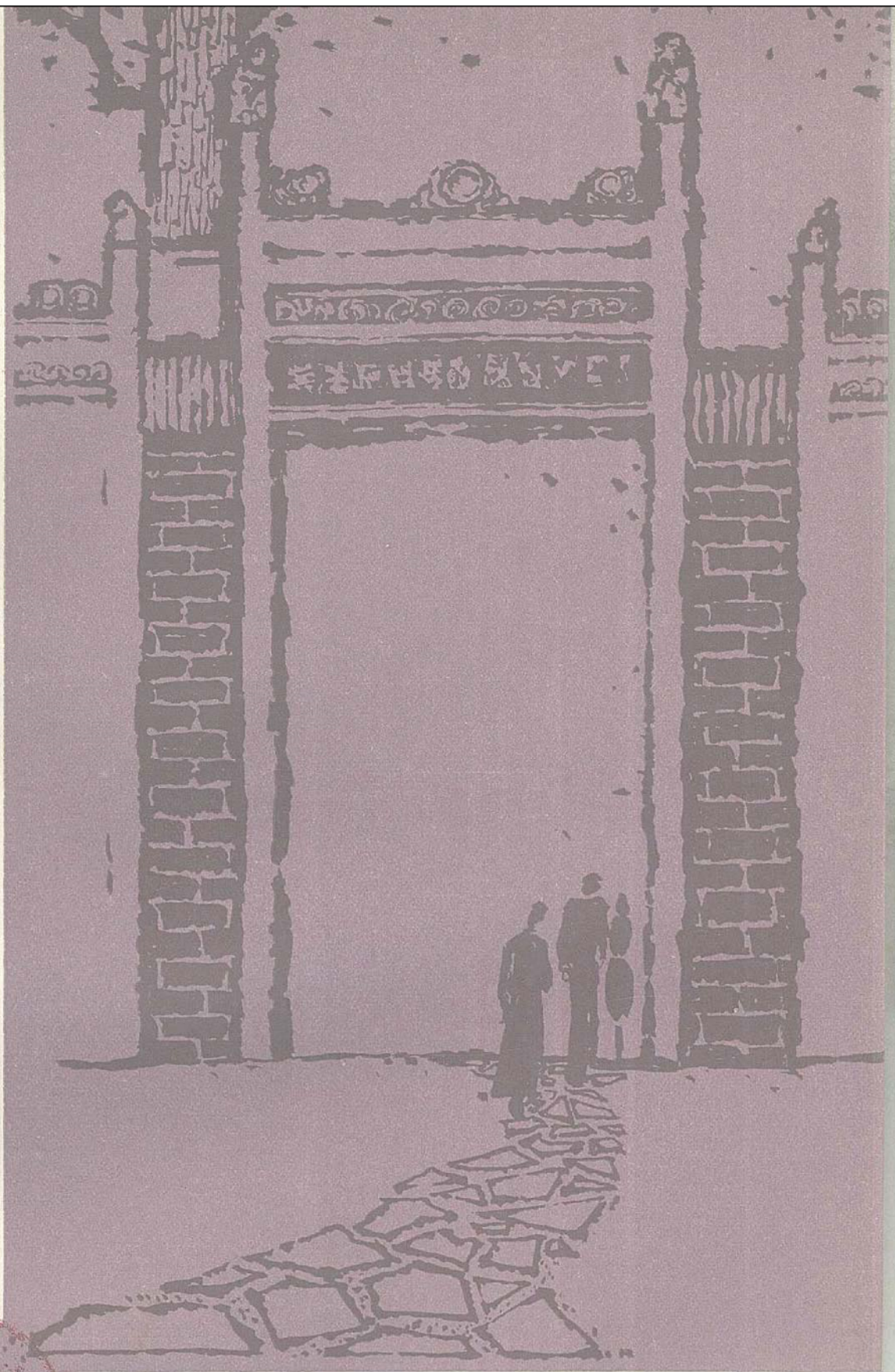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



1283 XUESHUYANYANJIU

目 录

- 论资本输出的新特点和新性质.....江成龙(5)
- 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范畴.....宋正春(15)
- 经济特区研究 ·
- 经济特区必须重视研究和利用国际价值规律.....唐火照 伍琦(21)
- 调查报告 ·
- 当前高校改革中提出的几个问题.....邝彦实(26)
- 比较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也可迅速发展
- 吴川县乡镇企业调查.....何文里 丘明章(80)
- 青年论坛 ·
- 西方世界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为什么科学文化
- 高度发达?.....曾伟荣(32)
-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黎克明 蔡茂生(84)
- 论突破局限性.....张汉青(40)
- 辩证逻辑是哲学与逻辑学的边缘科学.....王经伦(46)
-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
-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论述.....高齐云(58)

· 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

科学与社会分析法和社会管理 钟阳胜 (60)

行为科学与企业管理理论 谭湛明 (68)

宋代广州的外商 关履权 (67)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梁碧莹 (75)

铁钱与北宋商税统计 郭正忠 (80)

晚年的丘逢甲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徐博东 (87)

晚年的丘逢甲是维新派和立宪派 郭汉民 (90)

· 开发岭南的先驱 ·

罗浮山上的科学家葛洪 谈 史 (98)

艺术“商品化”与戏曲的形成 冯建民 (95)

以诗论诗之弊 欧阳世昌 (102)

· 新书评介 ·

评《中国式经济体制研究》 王 珺 袁耀文 (105)

《阮啸仙文集》简介 刘林松 (107)

“枪恨”当作“枪恨” 董志翘 (59)

也说“叵罗” 熊 飞 (45)

吴自牧小考 官桂铨 (52)

“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解 张桂光 (94)

书
海
酌
蠹

· 学术动态 ·

关于“两变”命题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的观点简介 (109) 广东社会科学院举行首

届科学讨论会 (101) 我省逻辑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市召开 (79) 广东省人民政

府批准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成立 (14)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纪事 (108)

· 读者·编者·

不要一稿多投 (86)

封面设计 马丽蓉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 2, 1985)

CONTENTS

- On the New Features and New Character of the Export of Capital
..... Jiāng Chenglong(5)
- A Discussion on the Category of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 Song Zhengchun (15)
- The Special Economic Area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and Utilization of the Law of Value Prevailing in the World
Market..... Tang Huozhao and Wu Qi(21)
- A Few Problems Emerging from the Present Reform in Education in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Kuang Yanshi (26)
- Enterprises Run by Townships and Towns in the Comparatively
Backward Areas Can Also Develop Rapidly—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enterprises run by townships and towns in Wuchuan
County He Wenli and Qiu Mingzhang (30)
- The Vigorous Creative Power of the Masses Is the Basic Factor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Li Keming and Cai Maosheng(34)
- On Breaking through Limitations Zhang Hanqing(40)
- Dialectical Logic Is a Frontier Scien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Logic
..... Wang Jinglun (46)
- Comrade Mao Zedong's Exposition of Dialectics in Socialist Society
..... Gao Qiyun (53)
- Foreign Businessmen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 Guan Luquan(67)

The Virgin Voyage to Guangzhou of the American Merchant Ship— “The Empress of China”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is voyage and its impact	Liang Biying (75)
The “Iron Coins” and “Statistics on Commercial Tax”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Guo Zhengzhong (80)
Qiu Fengjia in His Later Years Was a Bourgeois Revolutionist	Xu Bodong (87)
Qiu Fengjia in His Later Years Was a Reformist and Constitutionalist	Guo Hanmin (90)
“Art as Commod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Opera	Feng Jianmin (95)
The Disadvantages of Discussing Poetics in Terms of Poetry	Ouyang Shichang (102)
Recent Academic Trends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Book Review	

论资本输出的新特点和新性质

江 成 龙

资本输出，历来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进行资金输出？更是难以触及的理论禁区。然而自七十年代以来，资本输出已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其中也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输出。有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仅相互输出资本（资金）以合作发展经济，而且还向发达国家投资并且取得不小的成效。于是，仍然把资本输出的性质限定在是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的手段这一狭义范围内的认识就不全面了，已不能解释近十几年来发生的情况。对现实世界已出现的资本（资金）输出的新情况、新特点加以研究，区分其不同的性质，以指导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实践，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本文就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抛砖引玉。

世界资本输出跨入“立体”交往时期

回顾资本输出的发展史，自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为基本特征以来，可以划分成三个时期：

（一）少数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单向把资本输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时期。当时，世界上几个列强争霸，瓜分势力范围，把“过剩”资本投向各自的势力范围所属的经济落后国家，掠夺资源，榨取高额利润。

（二）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输出资本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输出的流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原来各发达国家单向将资本输往势力所属的不发达国家，而变成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双向输出资本了。据联合国资料估计，全世界现有跨国公司约一万个。二次大战以后产生的跨国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

（三）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进行资本输出和逐步将资本输向发达国家的时期。这是七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新情况，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进展的重要突破。据估计，目前约有三十个到四十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国际公司在外国直接投资，其投资总额约为100亿美元，^①占现世界生产资本输出累计总额5800亿美元的2%左右。^②据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刊载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司》一文的资料，由发展中国家产生的被称为“新兴”国际公司的国外分公司已拥有1900家企业，其中约有1000家企业属于加工业。^③资本输出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巴西、

阿根廷、墨西哥和印度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正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飞速发展，标志着资本输出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的流向有两类：（1）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输出，例如，东盟五国的经济合作组织，就以相互建立合资企业为主要形式；非洲的44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共同筹集发展基金，从事基础工程建设。（2）向发达国家投资建立国际分公司，例如巴西的国际公司已进入美国和西欧，④印度的海外合资企业也有一些进入美国。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流向，如果用几何图形来表示就呈双向的“平行网”状和反向“扇形”集射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就资本家来说仍免不了以谋取高额利润为目的而带剥削性，也已经具有新的特点和性质，决不能再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特征和性质相提并论了。

由此可见，世界资本输出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由原来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对多数经济落后国家的“单向射线”状的资本输出，变化成世界各国相互之间输出资本的“双向立体网”状时期。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在目前仅占极小比重，但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这一资本输出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就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输出也在发展中

回顾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史可以看出，尽管传统的理论总是把资本（资金）输出视为“异己”物而加以排斥，但实践上则是不断冲破禁区而逐步发展的。至今，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资本输出问题上，在实践中已有二大突破：（1）从排斥接受外国资本输出到肯定有必要引进外资的突破。其过程也是颇为曲折的。二十年代，列宁、斯大林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引进了几千万金卢布的外资，对于建立苏联基础工业起了重要的作用。二次大战以后，斯大林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理论为指导，重新排斥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甚至对最早利用外资的南斯拉夫进行批判，这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对的；但是斯大林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利用外资方面，有重要的贡献，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输出资金，只是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范围而已。（2）七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输出，已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范围突破为向西方发达国家投资方向发展。据资料：“至1978年，有7个经互会国家通过合股投资经营的方式，在16个工业化国家内建立了289个混合公司（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据估计经互会七国在西方的投资总额近6亿美元。据说：“在西方建立的东西方合资经营企业之数量大大超过在东欧国家内建立的数量。”⑥不仅如此，东西方合作还从原来的双边发展到三边和多边，甚至把合资企业建在第三国，共同开发多边工程。

资本输出新发展的内在原因

按照传统的理论，资本输出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一方面由于国内

的有利投资场所已被垄断，新资本的渗入受到限制，产生了“资本过剩”，因此需要从国外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从而产生了资本输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已经卷入世界市场，国内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缺乏资本和技术设备，因此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可能条件。于是资本输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在分析发达国家单向将资本输出到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用这一理论去说明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资本输出时，已经产生了一些矛盾，例如为什么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不是主要流向资本缺乏的不发达国家，而是主要流向已经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之间呢？当用这一理论去说明不发达国家相互之间进行资本输出，以及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时，就无法自圆其说了：（1）不发达国家自身资本缺乏，资源丰富、劳动力价廉，是有利投资的场所，并不存在资本过剩的问题，为什么不在国内投资却要投向国外呢？（2）发达国家内部资本已过剩，缺乏有利投资的场所，为什么资本缺乏、技术条件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却能够把资本输向发达国家呢？这是资本输出发展史中偶然出现的情况吗？可是短短二十来年，不发达国家输出资本额和国际公司的迅速发展的事实表明，这种现象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因此，研究资本输出新发展的内在原因，对于把握资本输出的客观必然性和探索其新的性质，是有必要的。

我认为，世界资本输出的新发展，是由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引起的：

（一）政治上反掠夺力量空前增强。二次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纷纷独立，获得了自主权；老殖民主义破产。政治上的独立是经济上反掠夺的前提条件。第三世界为了发展民族经济，行使了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自主权，对发达国家的掠夺性资本输出加以种种限制。于是就产生了双重的成果：（1）迫使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不能任意投向不发达国家，而不得不在发达国家之间扩大争夺投资场所的斗争。这就是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资本输出量激增的政治原因。（2）促进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合，相互输出资本，共同合作发展民族经济。这正是七十年代以来，亚非拉地区各类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这种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合，既可以彼此互补资源，共同开发基础工业；又可以协力对抗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已取得重大的成果。例如，二十年代初，中东石油诸国联合提价，就沉重地打击了新殖民主义政策。又如东盟五国的经济合作，不仅相互输出资本和集资开发基础工业，推行以专业生产为形式的工业互补计划；而且还于1981年1月成立了设在新加坡的东盟金融公司，成为经营亚洲美元的国际金融中心。^①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输出流向上产生的新情况、新特点，正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反霸斗争的胜利成果之一。这种新的资本输出，更多的方面是反帝国主义掠夺性资本输出的需要。

（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空前高涨。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性的经济危机之中而持久难以复苏。与此相反，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却空前高涨。被称为亚洲四只“小老虎”的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南朝鲜，年增长率达到10%左右的高速度。^②第三世界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趋向，正是

世界资本输出流向发生新的变化的综合经济根源。据资料，香港历来是世界资本市场回偿率最高的地区。以1972年至1982年统计资料，香港的资本回偿率为19.8%，比新加坡的18.8%还要高，更远远超过只有6—8%的美、英、法、德等国。^⑨可是自1977年起，香港的资本输出额出现超过外国资本在当地投资额的情况。^⑩这只能以经济实力发生新变化加以解释。

(三)资源占有的相对优势。这是由资源分布不匀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绝对规律所决定的。随着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在世界更广泛地发展，一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现在，任何一个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都不可能独占一切优势，而只能占有相对优势。发达国家占有的相对优势比重较大，不发达国家占有的相对优势较少，差异仅在于此。以美国为例，虽然所创造发明的新技术占世界的70%以上，仅技术转让收入每年就有几十亿，但也必须年花几亿美元引进新技术。资源占有的相对优势，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资本输出，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资本输出，以及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的物质条件。

所谓资源占有的相对优势，表现在多方面：

(1)劳动力、技术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及产品的相对优势。二次大战以后，资本输出为何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双向流通？西方经济学家是用“资源特有优势独占论”、“资源国际供需转移论”和“产品生命周期优势论”等理论加以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日本、西德的汽车工业、家用电器工业逐步达到世界高水平，就有条件首先把资本输入发达国家建立跨国公司，占领发达国家的市场；当这种相对优势在发达国家中消失以后，才转向不发达国家。电视机、石油化工工业、电脑工业等行业的资本输出，都具有此特点。

不发达国家也同样占有相对的优势，只是占有优势的范围较窄、程度较低而已。一般都是利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优势，以资本与劳务、资源同时输出的形式在国外开设生产工艺较为简单、产品档次较低而劳动密集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开始，逐步向中高档产品企业发展。不少国家首先以建筑业为突破口，例如南朝鲜就有50多家建筑公司在25个国家开展业务。^⑪我国在七十年代也为赞比亚等国建筑铁路。至于在技术上也不是没有相对优势，例如新加坡的普拉梅特公司就已成为海上石油钻探设备的主要生产者，南朝鲜的电视机（包括彩电）也打入了美国市场。印度在外的国际分公司的收入中，有四分之三是技术转让费和劳务管理费。^⑫发挥相对优势，正是不发达国家利用有限资本（金）的输出，配以劳务和某些资源甚至产品，在不发达国家相互之间进行经济合作，以及把国际公司打入发达国家区域的成功之处。

(2)资本占有的相对优势。就资本的总占有量讲，优势当然在发达国家；就资本的单个占有量讲，不发达国家也可以占优势。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集中在少数垄断集团手中，中小企业的资本并不雄厚。以美国而言，每年新生的与破产的中小企业数有几万户之多。这些中小企业常常处于既依附垄断集团，又受垄断集团排

挤、并吞的艰难境地。有许多因素会促使它们引进外资，以求竞争中生存。不发达国家的单个资本比起发达国家中这些经营不景气的企业来，就有占相对优势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凡能将资本输出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当然也是颇为有实力的财团，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由于资本回偿率的地区差异和占有生产要素相对优势不同而形成的绝对成本差异，会造成被发达国家垄断集团看成非有利投资场所，而被有些发达国家看来则是有利的投资场所。这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能够打入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相对的环境和经营的优势。如香港相对看来主要是历史上的商港地位形成传统的第三产业很发达；有四通八达的海路和航空交通；有与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工商金融企业的传统联系；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专门的国际公司及遍布世界的办事机构和通讯系统，信息灵通；有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以及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和国际交往中起重要作用的英语普及等等。这都为资本输出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

资本（资金）输出的共性与特性

二次大战以来，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资本输出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及其内在的原因都表明，资本输出已具有新的性质，不应当继续教条式地运用列宁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论断到处乱套。理论工作者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1）正确理解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论断，从实际出发发展列宁主义；（2）研究资本输出产生和发展的一般根源和特殊根源，以区别不同类型的资本输出确定不同的性质；（3）研究是不是任何一种资本输出都具有一国剥削他国的性质，以进一步断定社会主义资金输出的性质和发展前途。

（一）列宁论述的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特殊，而不是一切资本输出的一般。这是我对列宁有关资本输出论断的理解。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③这清楚表明，列宁是把帝国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较而断定帝国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据我所学，列宁著作中并没有广义的资本输出一般的论断，而都是狭义的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特殊的论断。这一点是我们首先必须把握的。把特殊的含意当作一般的含意，在逻辑上是不科学的、片面的；在实践中是错误的，有害的。如果我们硬要把因为列宁讲过帝国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而倒过来讲资本输出具有帝国主义性质；那么我们也会硬把因为列宁讲过自由竞争时期的特征是商品输出，从而倒过来讲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性质。这无疑荒谬的。

列宁正是以研究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为论题，断定资本输出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资本垄断；断定资本输出的必要性在于“资本过剩”；断定资本输出的可能性在于“许多经济落后国家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④断定资本输出的目的是为获得

高额利润，断定资本输出的手段是剥削和压迫，“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⑤ 断定资本输出的后果是即使经济落后国的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又使少数帝国主义同大多数经济落后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用这些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特殊的论述来说明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输出，都是不适用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输出的大量事实表明：其根源并非全是垄断，而且主要不是垄断，而是商品生产国际化协作的发展；其必要性并非资本过剩，而是利用有限资本（资金），发挥相对占有的优势，合作发展经济；其可能性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⑥ 其目的虽然仍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但是，第一，主要是为了发展民族经济；第二，为了共同联合起来对抗帝国主义掠夺性资本输出的；其手段则主要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扬长补短，互助协作，而并非全是剥削，一般也不存在压迫；其后果是不发达国家都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见，非帝国主义类型的资本（资金）输出，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是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大相径庭的。

所以，正确理解列宁对资本输出问题论述的内涵与外延，对于我们解放思想，认识资本输出新特点和新性质是很重要的。当然，列宁在世时，只存在帝国主义性质的资本输出，并不存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我们不应苛求列宁对资本输出的一般加以论述。即使列宁当时对资本输出的一般有个别论述，现在也不应当简单地生搬硬套，而应当根据新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

（二）资本（资金）输出的一般根源在于商品生产在国际范围的进一步社会化。从二次大战以来的资本输出的新特点中可见，资本输出虽然首先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并且作为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手段；但是资本输出并非帝国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范围，更非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天生是带有掠夺性质的手段。其实，资本（资金）输出的深厚根源在于商品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资本（资金）输出无非是国际化的商品经济协作的一种较高级形式而已。其理由是：

（1）从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一般规律看，总是由小范围发展到大范围，由国内到国外；由国际性的低级和简单协作到高级和复杂协作。早在小商品生产时期，国际性的商品贸易已经发生，先是最终产品，继而是原材料和设备。商品的进出口是国际协作中最低级、最简单又是历史最长的形式。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协作，是与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有提高，但又并不高的经济水平相联系的。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生产日益专业化、集约化，即技术密集性和资本密集性的工业空前发展。于是仅仅商品贸易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就必须要求从劳务协作、技术协作和资本协作等方面发展，以解决一国的财力、劳力和技术力所不能解决的宏伟工程或尖端产业。资本协作正是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必然产物，是国际协作的较高级和复杂的形式。资本输出之所以首先成为帝国主义主要的特征之一，撇开其掠夺性质不论，根源就在于其生产社会化程度已达到很高的程度。不发达国家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化

程度的提高，也必然会由商品贸易的低级形式向资本贸易等高级形式发展，从单向的资本输入而成为资本输入与输出兼有的国家。这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

(2)从资本(资金)协作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也呈现由简单的、低级的形式向复杂的高级的形式发展的趋向。早期的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是信贷，这是有钱就可获得利息的最简单、最低级的资本输出；对输入国来讲，只能解决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资本不足的问题；但并不能解决技术落后等问题。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资本的输出就必然得到发展，并从独资经营发展到合资经营；从纯粹的生产资本输出发展到资本和生产要素综合输出等高级形式。合资经营是体现以平等互利为原则的国际协作的较好的形式；又是不仅是资本协作，而且是人才、技术和设备等生产要素以及经营管理的协作。资本输出从单纯的货币资本形式的输出发展成为资本、技术、劳务等综合性全面协作，正是商品生产发展到技术(尤其是软技术)在生产中已达到非常重要的地步的必然结果。

(三)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会有不同性质的资本输出。资本输出虽然有其内在的一般性质，但它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特殊生产关系之下。就如商品一般寓于商品特殊之中，不同生产关系下的商品生产会有不同的性质一样，发生在各特殊生产关系下的资本输出也有不同性质。应当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我认为，由特殊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输出的性质可以分为三类：

(1)掠夺性的资本输出。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不必多言。

(2)互补性与剥削性兼存的资本输出。这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非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不发达国家之间资本合作以及向发达国家投资，是这种性质资本输出的典型。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其主导方面(至少在现时期是如此)是为了发挥相对占有的种种优势，以出养进，扬长补短，协同发展民族经济，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其私有制度所决定，仍带有剥削别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性质。其国际公司大多操纵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投资回偿的剩余价值落入私人资本的腰包。所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具有两重性质。

(3)互补性的资金输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输出就属此类。这是不反映剥削关系的新型的资金协作。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输出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相比，其他都是相类似的，唯有不反映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一根本差别。为什么有此根本性的差别呢？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承担着真正适应由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而形成的包括资金(资本)协作在内的国际协作的责任。具体理由是：

第一，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是私有制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也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关系。这不仅在国内的经济关系是如此，在国际经济关系上也应当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输出，会与输入国的两个阶级发生联系：一是与资产阶级发生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基本上属于商品经济的

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当然也会有二个阶级的斗争，但丝毫不存在剥削的问题；二是两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双方都是劳动者，当然不应当是一国无产阶级榨取另一国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所以，公有制性质决定，社会主义资金输出中，无论从目的、手段和阶级关系上看，都不存在剥削的阶级和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资金协作讲更是如此。

第二，资金输出所得的利润，是两国无产阶级协同创造的价值剩余（或纯收入）的互利分配。关于利润问题，传统的观念总是把它与剥削相提并论，似乎社会主义的资金输出只能是无偿的，而不能获得利息和利润。这是极左的片面的认识。其实，资金与利润，就其一般而言，也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货币的流通具有两重性，一是充当媒介物的货币，其公式是 $W-G-G-W$ ；二是充当目的物的货币，其公式是 $G-W-W-G$ 。^⑩ 并把由货币为起点再以货币为终点的货币流通形式称为“货币回流规律”。^⑪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专门批判过资产阶级把 $G-W-W-G$ 这一货币回流形式与资本主义的 $G-W-G$ 的资本流通公式混淆的错误，强调这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货币的特殊流通形式”。^⑫ 所以，从商品经济一般考察，货币资金是生产的要素的货币表现，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这在专业化的小商品生产时期就已出现。那些手工业者所预付的资金在回流时也会获得一个增殖额，即剩余劳动部分的价值，仅因其自劳自得而不称为利润而已。利润，从商品经济一般加以考察，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货币表现。利润只有在资产阶级占有剩余价值的制度下，才反映出剥削关系。社会主义的资金输出当然也应当获得一定的利润。这是由于社会主义仍是商品经济，必须进行经济计量和等价交换，必须经济核算。对于输出资金的国家来说，一方面把原来投放在国内可以获得的收入让渡给输入国，应当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又相应地在人才、物力和技术、管理等方面为输入国提供了条件，甚至直接参加建设。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所创造的价值，也应当得到补偿。只有这样才体现平等互利的原则。我国历史上在贬斥资本输出的同时，大量采取无偿援助、无息贷款等方式输出资金。这作为特殊的国际援助形式是必要的，作为经常的国际协作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违背商品经济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也违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同志式互助互利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中，片面强调无私的互助合作的经济关系，在理论上是极左的表现，在实践中阻碍了国际资金（资本）的正常协作，应当突破之。

我国也应当逐步发展资金输出

面对现实，我国虽然没有提出资金输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早就产生了。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以引进外资的同时逐步发展资金输出的形式。

首先是我国输出资金有没有可能性的问题。有人可能认为，我国现在资金奇缺，何来资金输出？我认为如果用辩证的观点和商品经济的理论去认识，可能性是存在的。因

为商品经济的国际协作总是双边的，任何一国都既有引进资本的可能，也有输出资本的可能。前面引述的印度等国输出资本之例已充分表明这一点。在国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一边尽可能多引进外资，一边适当输出资金，可以起到相辅相成，以出养进、加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有：（1）可以用少量的资金输出，发挥我国的相对占有的优势，既补充了他国的不足，又争取多收入外汇，以输出养引进；（2）在国外建立合营企业，可以更实际地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有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更好地引进外资；（3）通过资金输出可以促进商品贸易的发展。这是因为，资金输出的同时，会配套输出一些机器设备和其他产品，而且设在国外的机构，又必然起到世界“窗口”和联络点的作用，对于了解国际市场供需状况、密切国际关系，沟通商品信息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香港的产品有70%以上销于国际市场，与其信息灵通，应变迅速有密切的关系，而其所以信息灵通除了本身是自由港以外，还与其资本输出而在各国设有各种企业的机构有关；（4）资金输出必将促进我国金融事业的大发展，逐步跨入国际金融的行列；（5）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扬国际主义的协作精神。总之，不应当把资金输出与引进外资和本国建设对立起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条件未必不如这些国家。

当然，我国经济不发达，资金输出要取得成功并非易事，也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应当慎重。我国可以借鉴不发达国家的经验有：（1）先易后难，先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平行发展，后以发达国家为目标；（2）择优突破，研究我国占有的相对优势，组织力量加以突破。如我国的农业某些栽培技术世界闻名，我国的菜肴饮食香飘全球，我国的丝绸、瓷器等工业有传统优势，我国的航天技术在世界上属于先进行列，我国的建筑业也有一定的基础。如果以投资建设中国餐馆为突破口，更具有独占的优势，易于广泛突破；（3）学习印度先选择本国侨民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可以事半功倍；（4）先低后高，先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服务性产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5）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情况选择有利时机，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资金，尤其要注意时机的选择；（6）投资方式主要是生产性资金。

1985年元月7日

- ① 《世界经济》1984年第10期第58页。
- ② 《世界经济》1984年第9期第22页。
- ③ 《外国经济参考资料》1983年第9期第27页
- ④ 《社会科学情报资料》1984年第1期第69页
- ⑤ 同①第59页
- ⑥ 《东西方经济合作》中国展望出版社第21页
- ⑦ 《世界经济》1984年第2期第53页
- ⑧ 《1984年世界发展年报》世界银行出版

- ⑨ <信息与研究>1984年第88期, 转引自<社会科学情报资料>1984年第4期第79页
- ⑩ <社会科学情报资料>1984年第1期69页。
- ⑪ 同③
- ⑫ 同③
- ⑬ <列宁选集>第2卷第834页
- ⑭ <列宁选集>第2卷第835页
- ⑮ <列宁选集>第2卷第835页
- ⑯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八点
-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0页及以后几页
-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684页,
- ⑲ <资本论通信集>第275页, 并参见<马恩全集>46卷上第150页及以后几页。



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成立

今年一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广东社会科学大学。社科大由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广东省委宣传部顾问、省社联主席张江明担任校党组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 原中山大学副校长刘焯教授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长, 省社联副主席陈枫担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还有省高教局副局长李冠创、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黎克明、暨南大学副校长何军、省社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张绰、省社科院副院长金应熙、张磊, 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等也担任了该校的领导工作。该校还聘请了一批富有办学经验的学者、专家、教授担任各系主任和参加教学工作。

社科大属成人专科学校, 今年秋季开始招生, 主要招收广州地区各级党、政、军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中具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干部、职工及部分自费走读的社会青年。

社科大今年开设经济、政治、中文、法律、图书馆学五个系六个专业。学制二年。学生入学需参加全省成人高教统考, 择优录取, 不包分配, 修完全部课程经考试及格者发给大专毕业证书, 国家承认其学历。

三月四日, 广东社科大召开了第一次校务委员会会议。

(周聘秋)

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范畴

宋正春

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我认为，这一范畴所概括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两重属性、两个方面的统一，而不能理解成两个东西、两种经济的混合。把社会主义经济表述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实际上是对经济范畴作板块结构式解释痕迹的残留，是理论不彻底的表现。为了准确把握这一范畴，有必要对有关范畴作些考察。

对商品经济的理论考察

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范畴，突破了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专有这一固定观念。认识的这一飞跃，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

本来，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已由马克思解决。他不仅认为商品生产是历史上各个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而且还作出了经典性概括：“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①这便是马克思的商品一般与商品特殊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经济存在，这大概就成了后来人们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依据。

列宁一开始便全盘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取消商品经济的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就在全国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如果说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在战时是难以避免的话，那么战后继续推行它就不能不导致失误。列宁后来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②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他强调：“应当把商品交换提高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③列宁的这些意见无疑是宝贵的，但他来不及从理论上根本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他虽然曾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作过区分，^④但又没有将这一方法贯彻到底去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由于这样，他一面借助商品交换来解决士兵和工人的饥饿问题，一面又说同农民交换粮食的国家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为商品。”^⑤他最终也没有摆脱这么一个幽灵：“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⑥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上有所前进，表现在他能运用商品一般与商品特殊的理论来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同样是不彻底的。他用两种公有制的存在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一方面说明斯大林还是试图从理论回答问题。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公有制取消商品生产的结论在先，而苏联实现公有制后却保存商品经济，理论逻辑逼得斯大林不能不在所有制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他的这一回答又没有超出列宁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不是商品的框框，其实质还是不承认全民所有企业的产品、特别是生产资料是商品。这样就导出他那著名的商品“外壳”论，也是他急于把集体农庄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急于用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的根本原因所在。斯大林也始终没有放弃“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⑦观念。

由此看来，照搬经典著作现成的答案是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问题的。历史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机会。国际上近七十年、我国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面的经验都一再表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什么时候重视商品生产，社会生产就发展得快、人民生活就改善得快；什么时候限制商品生产，经济增长就缓慢，人民生活就困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迫使人们不能不承认它、不得不研究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端正了指导思想、特别是受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经验所鼓舞，从而具备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出理论概括的条件。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新结论的产生，不仅彻底破除了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专有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将导致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而且它把社会主义采用商品经济形式与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从而从根本上揭示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原因，是符合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的。

对计划调节的历史考察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范畴的确定，还得破除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专有的固定观念。

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道：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断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时，使用的是“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⑧的字眼；马克思描绘未来社会时，讲的又是“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⑨的言词。依此看来，经济计划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只是它所反映的经济内容、经济规律才是客观的；计划调节生产就是把从经济运动中得到的符合客观规律的主观意图付诸实施，表现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经济活动的反作用；而计划要能调节生产，又需运用价格、税收、利息、利润等经

济杠杆，要制定有关计划的条例、规章、制度、法律等保障措施，要采取指令性、指导性等不同计划管理形式，要设置从中央到地方在企业不同层次的计划职能机关，如此等等就构成了人们所说的计划体制。这种计划体制应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计划职能和经济运动的客观比例关系相联结的中介，既是人的意识灵敏反映经济运动状况的传导系统，又是人的意识能动指导生产过程的制导系统。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⑩当然，人类劳动开始时的计划性是不那么完善和自觉的，有一个从不太完备到相对完备、从不甚自觉到比较自觉的发展过程。

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进程平行发展，计划调节生产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恩格斯说过：“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⑪列宁也注意到现代资本主义向高度计划性发展的趋势，指出：“托拉斯生产商品恰恰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划进行的。”^⑫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更社会化、国际化了。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愈演愈烈，为了保护本国资本的利益，资本家便提出了国家计划干预生产的要求；为了保障区域性资本的利益，又形成了区域性的国际垄断资本同盟，提出了国际垄断组织计划调节参与国生产的要求。

我们应当把计划调节看成一个与一般生产过程相联系的普遍范畴。同时，计划调节的范围又是与经营管理权辖的范围直接同一的。就是说，经营管理权所及的范围有多大，计划就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调节生产。而我们过去只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讲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性，更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有一定范围内的计划调节，久而久之就把计划调节视为社会主义的专有功能。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观念，既不符合马克思原意，也不符合自有人类以来的整个生产发展史。

商品经济和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结合

在这里，我们则要分析商品经济、计划调节的个性、特殊性，揭示商品经济和计划调节不同社会结合的区别所在。

本文把社会主义经济表述为计划调节与商品经济的统一，我是基于以下的考虑：一是恩格斯从来没有使用过“计划经济”的范畴，他们无论是批判资本主义无计划、还是描绘未来社会有计划，都是从人的意识、社会意识对经济运动调节、控制的角度出发的；二是“计划经济”虽是列宁使用过的概念^⑬，但列宁使用这个概念也是对生产和分配的调节作用而言的；三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虽保留了“计划经济”的提法，但“计划经济”后的文章还是做在计划调节、计划体制上，并没有对“计划经济”作出与商品经济相

对应的规定。而所谓商品经济，那是就人类劳动产品的存在方式而言的，是一种在外部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借用这一流行术语）相区别的经济类型，是有形实体。所谓计划调节，是对人类控制生产过程的方式而言的，是一种调节机制、管理手段（即使强调计划是一种制度，也仍属于管理手段范围），它只有依附于、作用于某一经济实体并通过它的运动才将其存在表现出来，就是说计划调节并不是经济类型那样独立的形体。社会主义计划调节同样是统一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因此，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计划调节，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拥有的那种调节方式；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指的就是用社会主义计划自觉调节的那种经济类型；两者共处于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统一体之中。社会主义的商品性、计划性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重属性、两个方面，即一方面从经济类型上看，人们劳动产品商品化，另一方面从调节机制上看，人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计划化；决不是什么两个东西、两种经济成分的拼合。如果一定要使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的提法，那么，也只有对两者加以限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这一层次上使用，才有意义。那就要把前者“计划经济”限定为“用社会主义计划调节的商品经济”，把后者“商品经济”限定为“社会主义计划外的商品经济或小商品经济”。这样，两种不同的经济在现阶段我们这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是能够统一的。它们的统一性，就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前者是“一种普照的光”，后者便是由前者决定了“存在的比重”的“其他色彩”。而我们现在则是在低一个层次上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体经济本身的属性、特征，而不是讨论主体经济与从属经济的关系问题。而一种经济成分内部具有多种属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开始讲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时就指出：“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⑧正是这一方法论的贯彻，同一劳动过程在马克思那里既可以表现为具体劳动又可以表现为抽象劳动，既可以看成是私人劳动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劳动。后来，列宁从哲学上对事物的多种属性问题作出了概括，他说：“任何事物都具有‘许多’——‘内容的规定’关系和见解”。“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⑨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理解为商品性和计划性的统一，正是运用这一方法的结果。

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计划调节的统一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全社会一致性。上面讲过计划调节与经营权辖范围的同一。这里只不过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罢了。也就是说，商品生产者在多大的范围内有一致性的经济利益，商品经济和计划调节便可以在多大范围内实现统一。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计划调节的统一是局部的个别的，它们统一于一个个资本家，整个社会是无法统一的。参与垄断组织的资本家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在一个个垄断组织中可以实现商品经济和计划调节的统一。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主要是相对外国资本家来说，国内垄断资本家之间利益有一致性，因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可以实现商品经济与计划调节的统

一。国际垄断资本同盟(如欧洲共同体)之所以也能在某些方面实现商品经济与计划调节的统一,那是因为在这些方面在与其它垄断资本大国的对立中参与国之间有共同利益。

由于社会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商品经济与计划调节的统一,也就带来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调节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计划调节的不同特点。人们习惯于从所有制的不同去说明它们的区别。其实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所在。它是决定经济类型和调节方式特征的前提,而不是经济类型、调节方式特征本身。人们又习惯于用生产目的不同去区分经济类型和调节方式的不同特征。这也是难说得具体的。如攫取剩余价值,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采用商品经济这种经济类型去实现这目的而已。再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经济当然得服从这一目的,但社会主义生产这一目的并不始终是通过商品经济去实现的,在将来它可能是通过“产品经济”的形式去实现。总之,整个生产方式的特征会影响到它所采用的经济类型、使其发生适应生产方式要求的变化,但这毕竟不是经济类型本身的特征。

马克思指出:“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这种性质,即1.产品作为商品和2.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⑥由此我受到启发,从中引伸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有一个奇特的二元结构和二重属性。所谓二元结构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的构成既包括了劳动者(体力的脑力的)的劳动产品,也包括了劳动者的劳动力;所谓二重性是从资本主义商品总体上看,不论是劳动产品还是劳动力,都是雇佣劳动者生产的,但同时又都表现为资本的产物,因为劳动力也不过是以商品形式作为资本的生产要素而存在。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商品就只有劳动产品的一元结构,就是说劳动力不再加入商品行列了,同时也就表现为联合劳动的一重属性。这就是说,不管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商品、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商品,都不过是范围不同、层次不同的联合劳动的产物,没有与之相异己的力量存在。我很同意这么一种说法:商品存在就其本意就是劳动产品经过交换而发生形态变换,不应包括劳动力在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畸形发展,把本来不属商品范围的劳动力也商品化了;社会主义使劳动力退出商品领域,这是商品关系往本来意义上的一种回复,是商品生产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⑦当然我也不同意从商品品种、数量和质量上去论证社会主义如何优于资本主义。因为:第一,这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而是商品学研究的范围;第二,况且在事实上也很难说得很清楚。

至于社会主义计划调节与资本主义计划调节的区别,人们会说在于它们有否全社会性。前面,我们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计划调节的统一性就在于商品生产者利益全社会的一致性,这是可以的,但这里具体分析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笼统地说在于有否全社会性则是不够的。因为在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同

盟的发展，正一天天地把计划调节的范围扩大。如法国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47年开始到1988年已制定和执行了八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处于第九个（1984—1988）五年计划当中。欧洲经济共同体也有协调经济发展的计划。面对着现代资本主义计划日益社会化、国际化的趋势，你还重复着上述那样划分标准，就感到说服力不够。我认为，资本主义计划调节的基本特征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自始都存着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的对立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过是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即使到了今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比重扩大了、社会计划调节的范围也扩大了；但由于资本主义并没有强制性的指令计划，只有指导性、预测性的计划；平时社会计划与资本家之间利益冲突不严重时，资本家可以执行社会计划，使自己的个别计划与之协调；一旦这种利益对立激化、表面化，资本家就可以不履行社会计划。国际垄断组织中也存在这种情况。这就是资本主义始终无法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经济危机就是生产无计划性造成的后果。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自发调节总在不断地反抗计划调节。当然，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上，计划调节与自发调节对经济发生作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表现为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在经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战后，特别近年来资本主义“滞胀”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则表明这两种调节机制已处在势均力敌的境况之中了。

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计划调节并没有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么一个对立面，就是说社会主义计划调节的特征是全社会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有宏观计划调节，而且还有中观计划调节、微观计划调节；不仅有远期计划，而且有中期计划、近期计划；这样从横向从空间上是宏观计划、中观计划、微观计划协调一致；从纵向从时间上是远期计划、中期计划、近期计划有条不紊。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应具备的图景，是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实现的。

（文中着重点是笔者加的。）

① <资本论>第1卷第2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4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4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⑤⑥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4、375页

⑦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7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⑨ <资本论>第1卷第97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⑫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0页

⑬ <列宁全集>第10卷第407页、第35卷第555页

⑭ <资本论>第1卷48页

⑮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3、154页

⑯ <资本论>第3卷第994—995页

⑰ 吴培珏 <试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地位>，<学术研究>内部文稿1984年第4期

经济特区

必须重视研究和利用国际价值规律

唐火照 伍琦

特区经济既然是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经济结构以与客商合资合作为主，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那末，特区的商品经济与全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和一般向外开放的沿海地区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种种的区别集中起来可以说也是国际价值规律所起的地位作用上存在的差异。我国内地国际价值规律只是在对外贸易中存在和起作用，即只从外部影响内在的经济，而在经济特区，它是在生产和流通中即在整個社会经济中内在地起着作用，可以说，国际价值规律起着主要的调节作用，是主导的经济规律。

国际价值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世界市场大范围研究劳动价值论。他说：“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资本论》第1卷第168页）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那里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会起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则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区的商品经济，是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进行的。从商品价值的实体上讲，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其实体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在国际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它的价值仍然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不过，这种凝结的劳动已经达到了更高的社会化程度，比区域市场、民族市场具有了更高的要求，所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也就有所区别。区域市场的商品价值、民族市场的商品价值、世界市场的商品价值，存在不同的级差，有不同要求与标准，形成一个价值阶梯。

在国际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各国的国内社会必要劳动，它是在国际市场上同来自各国的同类商品进行比较以后才形成。商品的国际价值是由参加国际市场交换的各国生产的商品世界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所进行的商品交换低于世界劳动平均单位的劳动就不能成为国际价值所要求的正常质量的国民劳动，而高于世界劳动平均单位的劳动则是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

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这个变化，使得特区的商品生产者面临着比非特区的商品生产者所没有的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国际价值规律也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起作用，并没有脱离国内价值规律。而实际上，是由于价值规律在市场时空范围的变化，决定商品价值的必要劳动消耗量有所不同。我国的生产率低，劳动消耗高，要达到国际价值的标准，现阶段对经济特区，对我们整个国家，都是更高的要求。

由于商品的价格是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的，国际市场的竞争，使得商品的国际价格总是围绕着国际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国际价值规律的表现和作用。在我国，特区经济是更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整个经济都介入国际市场，国际价值规律，必然在那里存在而且起着主导的作用。

既然如此，经济特区就必须重视国际价值规律的研究，必须在正确认识国际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自觉运用它来为特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认为，在目前特别要重视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根据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来建立特区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从特区的起步发展的情况看，由于忽视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区企业往往只从适应国内市场的要求，或者只满足于眼前的图利挣钱，而盲目发展一些不适应国际市场要求的企业或产品，这与特区要发展成为“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是不相适应的。深圳特区1984年的工业项目和技术先进的项目的引进之所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正确运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作为投资指南是分不开的。特区要成为内外经济的枢纽，发展两个扇面。而关键在向外的扇面，向外的辐射。从实践来看，调节外资在特区的投向、特区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控制劳动密集的来料加工业的发展，依靠自己力量发展打出去的拳头产品，这是可以实现的。而这就必须加强国际市场的调查和预测，很好地研究和利用国际价值规律。

第二，特区大量引进外资、外技、外智，能否成功呢？这也需要通过研究国际价值规律基础上制定引进的措施。价值规律在一个国家内起着调节生产、流通，刺激技术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国际上则还起着调节国际资本、技术流向的作用。追求投资利润是投资者来特区投资的基本动因。那么，什么样的利润率才是较为合理而又对客商有吸引力呢？这就必须按国际平均利润率和国际市场供求方面变化来考虑，这就不可能离开国际价值，国际平均利润、国际价值规律的研究和利用。

第三，商品在国际市场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按照商品的国际生产价格来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特区在掌握国际市场行情，了解市场供求的变化上，加强对国际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商品交换中的作用的研究。在这里，特区商品价格依据什么来确定？取消国内价格，直接采用国际价格行不行？还需要创造什么条件和如何去创造条件？在目前，特区在解决市场价格、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的关系上，需要对国际价值、国际生产价格、国际市场价格等方面和关系进行广泛的研究。

第四，世界货币是国际价值尺度，国际市场商品交换的中介和手段。要掌握世界货币的变化规律，也需要研究国际价值规律。特区要发展经济，搞活金融，有必要发行特区货币。而特区货币与外币的关系如何，怎样依据国际价值来确定其与外币、与人民币的兑换率；怎样发挥它在与国内外特区经济发展的联系，促进特区的发展，又保持国内经济的合理发展，等等，这是有很多问题的，不认真进行国际价值、价格以及国际货币规律等等的研究和利用，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的。

总之，特区必须对国际价值规律进行广泛而又具体的研究。只有把握住它的运动规律，才能有特区的经济发展的“自由”。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国际价值规律也如此。它在不同方向上都会起作用，即一方面促进特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盲目性，带来新的矛盾。所以，我们研究应如何利用国际价值规律时，还应从这两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对特区来说，国际价值比国内价值是更高的等级标准，特区就必须用国际价值规律衡量一切工作，更上一层楼。国际价值之所以要求更高，如上所述就是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生产水平相比还是低，在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中，劳动量是不相等的，我们还是吃亏。在全国范围内，产品的价值要赶上“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但在特区就不同了，不仅是而且也是必须。只有达到和超越了国际价值的水准，特区的建设才能是成功的。如何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它达到这个水准呢？关键是靠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而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营水平的提高，又需要借助价值规律。国际价值规律是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开路和表现出来，剧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刺激或迫使各个企业采用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以减少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

马克思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资本论》第1卷第354页）。可见，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它的个别劳动也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更有竞争力。考察深圳特区一些打入国际市场的产品并取得较高利润的企业，它们的成功就是靠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产品价廉物美适销对路而又重视市场反应，善于打通销售渠道，及时调整价格、组织货源，利用我交通便利，劳动力工资低等优势，打入香港市场。

从目前来看，特区的技术结构尚不适应国际市场要求，先进或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在生产中应用还是占少数。在这种状况到底是更加放开，让国际市场商品流入，还是大力限制而采取对本区工业保护的措施呢？我们认为，过多的保护是会维护落后，阻碍技术引进和产品的更新的。保守性的保护政策，会使特区跟不上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从特区的使命来看，应更多地把企业放到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去锻炼，迫使它们不断改用先进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只有这样，特区的企业才能逐渐适应国际市场的更为广泛复杂剧烈的竞争。当然，也必须有步骤地实施，而不是一个号令，打开关闸，让海外商品全无区别地涌流进来。

第二，当前国际经济关系，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国际市场还是依靠国际价值规律自发调节难于计划。这种自发性，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波动和破坏，这是因为国际价值规律作为一种强制性力量，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适者生存，不适应者淘汰，不管人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国际价值规律对特区企业的商品经济的调节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我们应该充分地估计到，并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抵消，使特区经济有国际市场急剧变化的适应能力。

特区要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动荡和危机的冲击，抵消国际市场竞争所起的消极影响，提高应变力。我们认为，必须在加强对国际市场行情的了解和做好对国际市场的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自觉地而根据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的比例来安排、分配社会劳动时间，即使特区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都有一定的指导性计划，尤其是对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科学决策，而不是只凭感性的经验指挥。国外的市场变化我们是计划和指挥不了的，但不是不可以预测的，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尤其是本特区范围内，在经济上是可以做到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即把企业微观的“活”和特区宏观的“管”结合起来。可以使国际价值规律有效而又灵敏地调节特区经济，但又不产生很突然的很强大的盲目冲击。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研究还是利用国际价值规律都必须特别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特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必须以能充分利用国际价值规律调节作用为目标。

国际价值规律既然在特区起着决定国际必要劳动时间和分配世界社会劳动的作用，那就必须建立和形成一种新的、适应国际价值规律调节活动要求的经济体制，使国际价值规律得以有效地灵敏地对特区经济活动起积极调节作用，迫使企业依据国际价值的要求来组织生产和改善经营。而这就必要在特区经济体制内部实行由静态调节向动态调节的改革；由集中决策向分层决策的改革；由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调节的改革；由数量目标向价值目标的改革；由实物指标平衡向国内价值平衡向国际价值平衡的改革；由单一进出口商务机制向多功能、多渠道、交叉性机制的改革；由间接的国际市场营销向直接经销的改革；由商品输出向逐步劳力、资金输出到目标市场合资办企业过渡。通过改革，逐步实现特区经济管理现代化，使特区经济真正成为外向型经济。

2. 特区利用国际价值规律的积极调节作用，必须借助于各种经济杠杆的运用。特区的价格、税率、工资、土地费、产品内销比例、利率等经济杠杆，是调节投资者的利益的手段，也是特区依据和利用好国际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重要工具。正确地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可以防止因国际价值规律的盲目作用和可能出现的生产无政府的失控状况，促使外商按指导特区经济的计划方向发展。如果没有经济杠杆或经济杠杆之间不能互相适应和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国际价值规律就不能有效地起积极调节的作用，或者它的作用不能使特区经济朝着结构合理、综合平衡的方向，稳步地向前发展。

现在特区经济杠杆的运用，不仅过于“集中”，如价格、工资、内销比例等政策的确

定，特区权力有限，无法进行必要的和及时的调整；而且各种经济杠杆的横向协调过于分散，物价、财政、金融、税务等职能部门相对独立，各种经济杠杆的运用缺乏必要的横向联系，不能协调一致，出现互不通气、扯皮或相互抵消。这对特区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在利用好各种经济杠杆的关系上，应该既考虑各种经济杠杆作用的互相关系，又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整体性，统一调度，灵活运用。

3. 应该在价格体系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地实行特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的“国际竞争价格”。这有利于企业——商品生产者对自己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比较，能作出及时反映和选择。实行这种竞争价格，必须解决一个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的问题。目前，特区国营企业与涉外经济的企业（合资、独资）在税收政策上是不平等的，国营企业的税率比合资、独资的企业高。这就削弱了国营企业竞争能力，压抑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的拓展能力也受影响，就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营经济在特区经济中的应有作用。为繁荣发展特区经济，有必要在同等条件实行与国际市场挂钩的“竞争价格”，规定特区所有企业的燃料、原料、劳务费按国际市场的价格支付，其商品的价格也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确定，并且以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样，既可以直接反映出特区企业的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在世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关系，又可以限制那种不追求生产技术密集的企业和初级产品的发展和出口，迫使企业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依靠自己的力量到国际市场去竞争。

4. 发展信息事业，加强国际市场的调研。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信息已经和材料、能源鼎足三立，成为当代社会经济的三大技术支柱。信息是资源，信息是金钱——这对于外向型的特区经济，尤为重要。当前国际上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市场竞争十分剧烈，特区商品要挤进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是特区经营什么样的出口商品，那些商品在国际市场有销路，市场的容量又有多大，今后如何发展等等，都需要我们通过信息来分析了解，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再比如，特区要打入某一个目标市场，那就必须研究该市场的结构和销售渠道，了解当地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心理和消费发展趋向，熟悉当地政府的政策措施和分配渠道，掌握当地主要进口商、中间商和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等等。然后根据当地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设计，研究采用的适应的销售方式和对策。而这一切只有通过信息，建立信息网，才能掌握并运用好。这也就是说，只有信息灵敏了，才能掌握国际价值规律，自觉地调节特区的经济，使特区经济在国际市场复杂剧烈的竞争中，不断向前发展，发挥“窗口”的更大作用。

当前高校改革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邝彦实

前段时间，我们到华南师大和华南工学院进行了近三个月的调查。其中，直接调查了221人，间接调查了226人，共447人。从两（院）校来看，当前高校冲破旧的框框和条条，挖掘内在的潜力，进行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办学，面向社会开展科技协作和科技服务，改变过去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教学、科研体制等方面，正出现喜人的气象，改革的势头很好。但前进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认识和解决。

一、要扩大学校的办学权，鼓励学校创造和扩大“第二智力投资”，以智力开发智力

扩大学校的办学权，把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增强学校自我扩展的能力，应是高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学校不仅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两条腿办学，而且可以与物质生产部门进行广泛的合作，建立技术协作关系和联合组织，有偿转让各种科研成果，还可以兴办试验性的实验工厂，建立各种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经济实体。

华南师大在实行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办学方面，已取得显著的成绩。他们在1982年以前，只招收本科生和函授生约六千人。1983年起，他们进一步挖掘潜力，扩大另一条腿，采取代培、办夜大、专修班、培训班等形式，为各部门培养人才，把学校办成了内部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大学。至1984年，学生人数猛增至一万三千人，“一校”变成了“两校”。按目前国家培养一个大专生的投资额计，国家每年至少需给他们增拨教育经费600万元。现在，从社会集中了这笔资金。

同时，他们面向社会进行科技开发，直接为生产服务。该校微电子学研究所，实行独立核算，课题承包，仅1983年就完成了九项科研项目。现在，这个所不仅建立了实验工厂，而且还和深圳、珠海、韶关、中山、南海等市（县）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电脑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生物系与许多市（县）进行技术协作，研究和推广养鱼技术。电教中心采取技术协作的形式，生产多种电教录相片，文科各系举办刊授中心和开展科研咨询活动，搞得也很活跃。

但是，目前对上述做法，在认识上还不一致。我们认为，高等学校通过改革和扩权，开展多种形式办学，加强科学研究，兴办各种事业，自己创造一定的经济条件，增加智力投资，实际是通过智力为社会服务的途径，创造和扩大智力投资的一种创举，是内部充满活力的生动表现。如果说，国家的拨款可称为“第一智力投资”，那么，“创收”则可看作是“第二智力投资”，或叫“第一智力投资”的补充。

首先，从实际用途来看。华南师大1983年校一级创收260万元，1984年可达350万元，分别达到国家当年教育投资的26%和35%。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基建投资、添置教学科研设备，其余部分用于教职工书报费、保健、疗养、子女入学入托等集体福利和发放奖金等。两年来，他们从创收中支出的基建费共846万元，相当于国家基建投资的46%，兴建和扩建教室、宿舍6800平方米。系一级创收，主要用于发放奖金和职务、岗位津贴。1983年，每个教师的这类收入，约300—400元。这样做，不仅改善了教学、科研的物质条件，而且提高了教师的福利待遇。

其次，从教育与生产的关系和知识的价值来看。学校不仅是一个消费单位，更重要的是一个生产单位，即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单位。知识是有价值的。教学、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或学校把编外人员组织起来，为社会服务，付出智力劳动，理应取得劳动报酬。他们的收入，不仅不应非议，而且要大加提倡和鼓励。随着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学校通过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加强，必将逐步成为以智力创造价值的实体或半实体。学校不仅可以通过财政拨款取得智力投资，而且可以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自己创造和扩大智力投资。

最后，从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来看。上述做法有利于从物质利益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学校各方面的改革和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在实践上改变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为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目前，我省一方面迫切要求教育要大发展，另一方面是财力有限，智力投资不足。解决这个矛盾，无疑首先要靠国家扩大智力投资。同时，学校通过智力为社会服务的途径，把分散于社会各部门、各单位乃至个人的资金转化为学校的教育经费，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应成为今后扩大智力投资的一个方向。

二、要沟通学校与物质生产部门的联系，为知识分子开拓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广辟渠道，沟通学校与物质生产部门的联系，是高校改革的一个内容。

1983年，华南工学院承担的科研项目共418项，其中基础研究41项，占9.8%；应用、开发研究377项，占90.2%；省下达的任务和企业委托研究的项目240项，占57.3%。据不完全统计，该院科研成果的应用，仅去年一年就为国家创造利润达5000多万元，且其中年创利润100万元以上的有五项目。到目前止，全院已与近二十个县（市）建立了包括电子、轻工、食品、机电、塑料、建筑等方面的技术协作关系，签订了100多项单项合同，增收教学、科研经费340多万元，相当于国家当年拨款的20%。

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科研成果的转

移，学校与物质生产部门的联系，又存在不少问题，渠道还不畅通。华南工学院去年完成应用研究项目48项，其中25项，即52%的科研成果未能及时应用于生产。就是其中应用于生产的23项，中间周折也很多，需教师自己多方游说，才能“成交”。大量的科研成果，鉴定会开了，奖品发了，文章登了，但就是不能应用而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高校本身，一是社会及其各个生产部门。首先，学校要重视应用研究，鼓励教学、科研人员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选择和确定科研课题，到生产第一线推广科研成果。对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不仅要在升职上破格提拔，而且要在物质上给予奖励。

其次，要广辟渠道，建立必要的社会化机构和多样化渠道，推动科研成果转移的社会化。

（1）要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学校与产业部门进行技术协作，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华南工学院帮助广州市钟表工业公司进行全行业的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和工艺改革，而市钟表工业公司则为该校提供精密仪器和其他实验条件，解决科研成果的应用技术和生产技术问题。这种联合形式，应加以扶持和推广。

（2）政府部门和各经济部门，要创造条件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参与决策过程，充分发挥他们在提供决策参考方案和进行各方面论证中的作用。

（3）成立省思想产品（科技成果）购销公司，进行委托应用和开发。各校（院）可将成果向公司登记，然后由公司委托给有关企业开发，使新技术的转移企业化。公司在新技术开发成功并投产后，向企业收取占年销售额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并与高校合理分成。

（4）推荐开发。由思想产品购销公司做中介人，让企业直接从院校取得科研成果，公司按新技术项目拨给一定额度的促进费。开发成功后，学校通过公司按一定比例，从新产品销售利润中提取成果转让费。

（5）定期举行科技成果交流会，促进技术转让。交流会可由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科技服务咨询公司举办，也可由思想产品购销公司举办。

第三，为了鼓励学校和企业二者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要尽快对收费标准、收益

分配、专利权和合同管理等，制定具体的政策规定和地方性法规。

三、要抓紧解决教学、科研队伍的“断层”问题，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

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文革”的破坏，目前教学、科研队伍的“断层”问题非常严重。华南师大现有12个系，18个专业，列入省重点的学科9个，全校教学、科研人员共1056人，其中：教授38人，除1人外均60岁以上，平均年龄69岁；副教授172人，60岁以上的占30%，平均年龄56岁；讲师469人，50岁以上的占20%，平均年龄48岁；助教377人，中年以上的占21%，平均年龄34岁；整个队伍的总平均年龄49岁，老化的问题非常突出。

学科带头人同样有老化的趋势。华南师大校一级重点培养教师，共25名。其中，年龄最小的46岁，最大的61岁，平均51岁。根据“双峰型”理论，该校学科带头人的年龄在46—61岁之间，虽然尚处于45—65岁形成创造力的第二个高峰期，还有55岁的第二个峰值，但毕竟已超过25—45岁、峰值在35岁的形成最佳创造力的第一个高峰期。因此，形不成梯队，缺乏后劲，作为学科带头人，活力不足。

与年龄结构不合理相联系，职称结构也不合理。1953年，华南师大正、副教授占41%，讲师占25%，助教占34%；1983年，相应职称教师分别占20%，45%和35%。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认为，比较合理的应是三、四、三制，即正、副教授占30%，讲师占40%，助教占30%。不少讲师，干的是副教授的工作，有的甚至是教授的工作，但职称却上不去。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现在的职称结构，在制度上承认他们的教学、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做到职责相符。

同时，知识老化的问题也很突出。老教授一方面学识渊博，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更新知识的精力，专业知识有不少已经老化，有的甚至仍处于五十年代的水平。就是中、青年教师，也有知识更新的问题。现在使用的教材，好些是1962年或五十年代编写的。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要求极不适应。

上述状况往往造成年富力强、有精力主动更新知识的中青年教师，不能在教学、科研特别是培养研究生的前台扮演主角，而只能在后台充当

主力，在职称、劳动报酬上出现严重的苦乐不均，甚至出现个别不在第一线的压制在第一线苦干的教师，并决定其学术命运的不应有的现象。这样，又进一步造成中青年的助教、讲师和老教授在感情上或明或暗的“代沟”。

可以预测，上述问题如不抓紧解决，高等学校（主要是老校）教学、科研队伍于1990—1995年，将会整个严重老化，专业素质将会严重不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热切希望，各级领导，特别是主管高校工作的领导部门和高校的领导，一定要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下决心迅速解决“断层”问题。为此，我们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抓紧贯彻中央关于教学、科研人员退休的规定，让力不胜任的老教授（包括一部分副教授）和部分老讲师退下来，创造条件让他们在第二线发挥作用；二、改革职称评审办法，彻底打破论资排辈，破格把优秀的中青年教师晋升为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并大胆地把他们放在教学、科研的学术领导岗位；三、调整学科带头人队伍的结构，充实一批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形成第一峰值创造力的学科带头人队伍，建立合理的梯形结构；四、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青年教师，扩大研究生的培养规模；五、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加强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促进知识的更新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六、扩大高校选留毕业生的权限，允许从实际出发多留毕业生；七、搞好学校与产业部门的人才流动，促进教学、科研人员的更新和素质的提高。

四、要在改革教学、科研的管理体制上下功夫，调整好精神生产的关系

从华南师大和华南工学院的情况来看，当前高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体制，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领导体制。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应是校（院）系两级。系不仅是一级领导机构，而且是独立的教学、科研实体。但现在的体制，实际是校及其直属部（处）的领导体制，系作为教学、科研实体和一级领导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往往被忽视或得不到承认。各种权力几乎都集中于校（院）一级及直属部（处），各系（所）在人、财、物上缺乏应有的自主权。系（所）要调配教学、科研力量，购买仪器设备，进行较大的

教学活动和科研攻关项目，或与生产部门进行技术协作，自己无权拍板，而必须由校（院）直属部（处）批准。系（所）甚至连给教师解决一间房子，报销一元几角钱的旅差费，都无权办理。不少系（所）一级领导和教学、科研人员认为，这种领导体制和机构设置，不利于调动系（所）一级和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二是学术职称评审制度。这是在教学、科研中建立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生产关系的杠杆。现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1）对各级职称的晋升条件规定不具体，从教研室到校系都未有一套比较全面而又切实可行的考核制度，没有定期进行必要的考核并建立业务档案，以致职称的评定难以做到准确。（2）权、责分离。从系职称评审小组到学校和高教局职称评审委员会，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其成员只画圈而不写意见，也不签名。这种方式，使参加表决的委员有很大的权力而可以不负责任，甚至使个别人易于趁机徇私和打击报复。（3）权力过于集中。现在，审批讲师的权在校一级，审批副教授的权在高教局，审批教授的权在教育部。对教师的使用权和晋升权脱节，不利于调动校（院）、系两级的积极性，搞好评审工作。由于上述原因，恢复职称评审制度以来的几次评审工作，虽然对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因素，造成了一些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

三是实验室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管理制度。在精神生产中，仪器设备是物质性的生产资料，图书资料是思想性的生产资料，两者都是教

学科研活动所不可缺少的。目前由于管理制度上的不合理，往往使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管理与使用脱节，造成教学、科研人员不能按精神生产规律的要求，高效率地借阅图书资料，更不能高效率地使用实验室进行实验，跟踪观察实验的全过程。这就阻碍了教学、科研人员与实验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直接结合，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现实的精神生产力，影响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四是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科研人员奋发向上，争相为四化多作贡献，思想的主流很好。但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中也有“左”的影响，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等消极的思想因素，以及互相间不团结的现象，还有待克服。对于这些，我们有些政工干部虽然注意到了，但不愿花力气去工作；或者力气花了，但不得法，效果不好。

我们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过程，是一个精神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各种教学、科研的管理体制，本质上是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结成的精神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精神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要求。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目前高等学校的精神生产关系与精神生产力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正是这种不适应，使学校精神生产关系的不少环节不能反映教学、科研人员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束缚了他们的教学、科研积极性。据对两（院）校三系 189 名教学、科研人员进行的无记名书面调查统计，其中 68—85% 的人认为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调整好精神生产关系，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为教学、科研第一线服务的管理体制，进一步调动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两个中心”的作用，把学校办活。



比较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也可迅速发展

——吴川县乡镇企业调查

何文里 丘明章

吴川县地处商品经济历来比较落后的粤西地区，面积八百四十四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四十一万亩，人口六十三万，其中农业人口五十六万，每人平均不到七分耕地，原有社队企业基础也很薄弱，一九七八年全县社、队两级企业总产值只有二千多万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吴川县的乡镇企业有了较大发展，尤以新型的合作企业和家庭工业、各项服务业发展更为迅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到一九八三年止，全县已有八千七百多户，共集资一千九百多万元，大办联户企业。1983年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达一亿二千九百多万元，其中新的合作企业收入四千三百多万元，占百分之三十三，乡镇企业产值在全县农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1984年一至九月份，乡镇企业总收入已超过一亿元，比1983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多。从总的看，吴川县乡镇企业无论是规模、速度，与发达地区比还有不小差距，但其具有自己的特色，开创了一条发展乡镇工业的新道路。他们以区乡村干部和能人牵头，以农民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找场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合作企业和家庭工业、各项服务业为主要形式，以立足本地资源的加工业、传统工艺和建筑业为主要方向，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吴川县的乡镇企业为什么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们是如何去组织、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呢？我们从调查中看他们是从理论指导上和实际工作中解决好下面的几个问题：

（一）从实际出发，坚持多层次、多成份、多形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束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阶段，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公有制为主的基础上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

通渠道和多种经营形式，这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由我国目前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决定的。这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突出表现。乡镇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层次、一种形式，就全国全省以至一个地区一个县内来说，情况则是千差万别的。乡镇企业从其发展形式来看，包括原有社队集体企业和新发展起来的区、乡、村集体企业，农民联户集资兴办的合作企业，农民家庭工业及各种服务业，个体工商企业，各种形式之间的联合企业等。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地方原有社队企业发展快、基础好，有的起步迟、发展慢，有的至今还处于空白状况。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走多层次、多成份、多形式的道路。吴川县原有社队企业底子薄，如果只局限在以此为基础发展乡镇企业，是难于奏效的。他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面向千家万户，发动群众集资着重发展联户企业和家庭工业，这正是他们乡镇企业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吴川县的联户企业和家庭工业、各种服务业，萌芽于一九七九年，它是在部分地方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业单一经济开始突破的农村现实土壤上萌发出来的新事物。由农民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找场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新经济联合体，一经出现，便以其投资少、经营活、见效快、群众实惠大的特色，吸引着千家万户渴望致富而又有了经营自主权的农民群众，至一九八二年进入有领导的发展时期，就进入更为蓬勃兴旺的阶段。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企业户数由四百五十家发展到二千一百多家，从业人员从五千人发展到三万一千多人，产值从五百万元增到四千三百三十多万元。在两年内每年递增百分之一百九十五，净增产值一千九百万元。与此同时，原有社队企业经过整顿调整，也有了提高和发展。事

实践证明，这种区、乡、村和农民联户企业、家庭工业一齐上而形成的多种经济成份的结构，与目前农村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是适应的。它有效地利用人、财、物和自然资源，变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 在发展项目上，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本身自然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吴川县的乡镇企业以立足本地资源的农副产品加工和传统手工艺为主要方向，这是他们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又一大特色。王村港区有丰富的葵树资源，重点发展了葵制品加工：这个区的覃寮乡涌尾村，1983年葵业收入人均七百〇一元。覃巴区对面坡乡调旦村利用传统编织工艺的优势，重点发展竹器编织，1983年人均收入超千元。吴川大部分地区都有经营建筑、建材业的传统，社会上又大量需要，便大力发展建筑业、建材业，全县十五个区、镇都成立了工程队，许多区、乡、村都办了砖瓦厂，1983年建筑业总收入达六千万元，砖瓦产值达七百万元，成为乡镇企业的“大头”。由于各地都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一、二个项目为发展乡镇企业的突破口，现在吴川各地出现了不少很有特色的、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生产、销售中心。如县城梅茶镇内的塑料制鞋街、王村港区的葵制品、覃巴区劳保用品、塘尾区的塑料绳网具、黄坡区的炮竹筒、塘寮区的五金机械、振文区的包线、长岐区的麻制品和豆制品、樟铺区三浪村的种蛋孵化、袂花江沿岸的砖瓦等。这些小厂群有的由数以百计的工厂组成，规模相当可观。它们如烂漫山花，遍布吴川大地，改变着历史遗留的不合理经济建设布局，显示着农民办工业的巨大优越性和蓬勃生命力。

(三) 充分发挥能人作用，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关键。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吴川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各种能人起着排头兵的作用。这些能人，有的是基层干部，更多的是群众中的能工巧匠，基本上都是在致富道路上起步早的专业户。他们在农村单一经济局面开始突破以后，率先“洗脚上田”，把目光转向兴办工业、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的广阔天地，卓有成效地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如覃巴区的覃巴墟，首先由一位能人办起一间手套厂。在他的带动下，现在全墟手套厂发展到十四间，拥有手套机一百一十多台，分散加工手套的衣车平均每户一点二台，全墟七成以上的群众从事手套加工。1983年为

社会提供劳保手套五百二十万对，总产值达二百六十二万元。这种“一人带一厂、一厂带一村”的情况，在吴川已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趋势。乡镇企业正面临多种竞争，但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吴川乡镇工业发展快的地方，有凭自然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有依靠传统工艺优势发展起来的，但归根结底都是人才在起作用。有不少地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善于经营的人才，致使乡镇企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相反有的地方并没有某种资源，却发展了某种产品，关键问题就是有了人才。有“人”则有“财”，这个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因此，无论是现有乡镇企业的巩固提高，还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人才问题都是非常迫切的问题。除了本地积极物色、培养外，应大力鼓励、提倡工程技术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工业去，这要有一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证才行。

(四) 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吴川县乡镇企业的局面之所以能打开，决定的因素是他们思想解放，政策放宽，正确的引导和各方面的扶持。吴川县乡镇企业以联户企业和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在经营的灵活性上具有很大优势。但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农村，信息闭塞，农民在兴办企业中往往由于不了解市场情况会陷于盲目性。吴川县各有关部门提供及时的、优质的信息服务和供销服务外，还考虑引导企业自愿组织民间行业机构。如塑料厂，全县已达四、五百家之多，他们准备引导有关企业组织国家指导下民间组织性质的行业协会，作为国家和企业联系的一条纽带，以协调行业活动，进行联系、指导、服务、咨询，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另外，吴川现有乡镇企业，特别是联户工业和家庭工业，基本上是工场手工业。其产品主要还是以廉取胜，还不能做到以优取胜、以新取胜。如塑料鞋生产批量甚大，但基本上是依靠特别低廉的价格打入市场的不少传统工艺，也停留于落后的生产手段，难于适应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新形势。因此，吴川县还准备在技术上加以指导和帮助，以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引导企业正确处理分配与积累的关系，防止分光吃尽以求不断扩大再生产，更新技术设备，提高竞争能力。



西方世界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 为什么科学文化高度发达？

曾伟荣

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他们的科学文化高度发达又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其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速度比以前快得多，被称为第二个黄金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科学文化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科学属于生产力范畴，而生产力又有其自身独立的运动发展规律，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永远不会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并且有加速发展的趋势。那么，推动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和斗争。人类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要求，总是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品种上不断增多，在质量上不断提高的。因此，人类在同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不仅要继承前人遗留下来的一切征服自然的现有手段、技能和经验，而且要不断地总结新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不断地改变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推动生产力永不停顿地向前发展，又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同样，科学文化也是在前人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的。也就是说，由于生产经验日积月累，知识世代相传，人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劳动技能不断提高，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使人们借以进行生产和科学实验的物质手段的种类和数量也

愈来愈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文化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是同前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的，在最普通的情况下，文化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文化科学的发展，又引起生产力的大发展。例如，十九世纪初蒸汽机和纺纱机的发明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促使了工场手工业生产时代向大机器生产时代的过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力、化学方法的采用，又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当代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机器人、高分子化学、高能物理、遗传工程和航天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又造成了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达。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达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它们有自身发展运动的规律。

当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和文化科学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尖锐矛盾，但它又不愿自我毁灭，因而总是想尽千方百计地进行挣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政府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在私有制允许的范围内，能够对生产关系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生产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研究有可能更大规模地进行组织和规划，促进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自由竞争变为垄断，使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很大的进展，

文化科学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这时，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战后，股份公司、跨国公司和各种垄断组织实力的加强，使他们能够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许多垄断企业都有自己庞大的和比较庞大的科研机构，社会化程度很高，对某些科研项目和工程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也很强。这些都有利于加速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由国家出面组织或提供资本建立科研机构的现象，就更有利于进行规模更大的科研项目，使科学技术有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了。如1973年，美国科研经费中，由国家提供的比重占54%，法国占56.4%。日本仅1983年度国家提供的科研经费就高达18,008亿日元，比1982年度增加8.3%。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资产阶级，在国内还实行福利主义政策，实行消费信贷、资本“民主化”、管理“民主化”等措施，也有利于促进他们国家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日本丰田汽车制造厂的资本家，根据工人给厂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采用情况和采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好差，分别给予轻重不同的奖赏，每当工人生日，厂里就给他送“红包”以示“关心”，工人可以在工厂入股分红等等。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觉悟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加强劳动强度来取得更多的利润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于是资本家改为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指出劳动生产率是随着科学和技术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有人估计，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得来的。因此，当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并表明它能带来更多的利润时，资本家就会想尽办法将新技术运用于生产领域，并不断地将其推广，从而推动和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列宁曾经指出，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且会使竞争在新的条件下变

得更加尖锐和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情况的变化，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各垄断组织之间、各国垄断财团之间的竞争，表现得更加尖锐复杂。竞争是无情的，谁要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能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获得生存和发展，谁就必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谁就必须发展新技术，采用新技术。这样，竞争就成为战后推动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一种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扩展和控制国外市场，牟取高额利润，进行大规模的扩展军备，大力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使军费开支不断增加。197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商品和劳务采购总额中，有三分之二是军事采购。1972年至1979年，西方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费开支都大幅度增加。1979年美国、西德、英国、法国的军费开支比1972年分别增长68.7%、36.8%、45%和39.1%。互相之间的军备竞争，也加强与之有关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并推动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资本家出于追逐利润的欲望，还往往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将军事科研成果运用于民用生产，从而促进文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资本主义世界积三百多年发展经验，加上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文化科学高度发达。然而，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始终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由它决定的腐朽的意识形态，必然成为障碍生产力全面迅速发展的桎梏。当着新技术出现时，如果它不能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或者反过来动摇他的垄断地位时，资本家就会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将新技术买回来，束之高阁，人为地障碍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科学技术一定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快更好。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 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

黎克明 蔡茂生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当前的改革实践中所提出来的迫切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其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呢？探讨这些问题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的主体

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同时，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群众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其社会主体地位。

“社会主体”是跟“创造者”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从来就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主体。然而，在阶级社会，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着。作为物质财富的实际“创造者”的劳动群众，却没有在任何时候都体现其主体地位。因为主体地位，只有当他们的创造活动成为积极的自觉创造时，才能体现出来。例如，在以往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在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过渡的一定时期内，劳动群众曾表现出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时，他们是以社会主体的姿态出现的。但在以往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劳动群众对于历史的创造活动往往是被压抑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供人使用的劳动力，他们的“创造”活动是在“皮鞭”、“棍棒”或“饥饿规律”驱使下被迫进行的。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以真正的社会主体的姿态出现，尽管他们本来是而且应该是社会的主体。

在消灭剥削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从根本上克服了历史进步的对抗性质，使人民群众第一次有可能以社会真正主体的资格自觉地从历史创造活

动。在这里，每个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人都有可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作用也就日益增长。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具有而且应该具有的特征。

决定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作用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首先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劳动群众摆脱了剥削，劳动由为别人发财致富的“异化劳动”转化为为劳动者自己的自觉劳动；劳动者不再是供他人使用的劳动力，而是名副其实的“创造者”。这种劳动本质上是解放劳动者的创造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其次，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促使群众创造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提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不仅成为经济上的主人，而且成为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人。因此，他们在劳动中，在一切社会活动中，表现出完全新的姿态。

可见，劳动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真正实现，并日益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本质要求和必然结果，它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当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过渡时，也可以使劳动者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当代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甚至可以得到十分优厚的物质待遇。然而，私有制社会却始终不能改变劳动者在人格上从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地位和命运。因此，无论怎样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不过是给奴隶以较好的报酬，并且既不会使劳动者，也不会使劳动赢得人的身份和价值。^①而社会主义，恰恰是在使劳动者成为真正主体和名副其实的创造者方面，优越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剥削制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泉也在于，它本身吸引极其广泛的人民群众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的创造，并从而为它自己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在它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采取具有各种特征的“模式”，然而，只要是社会主义模式，就必须是确实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有利于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否则，就很难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创造过程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的主体，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群众的创造实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②

社会主义是对旧社会的根本变革，因而它不可能象以往的经济形态那样，在旧社会的胞胎里自发地生长出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有可能建立起来。然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这一特点，决不意味着它是意志的产物，决不意味着党和国家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去建立超越于生产力所允许的范围和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程度的生产关系。历史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超越生产力所允许的范围、纯粹依

靠行政命令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生产关系，都必定是短命的，是经不起群众实践的检验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历史上其他类型的生产关系一样，都具有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根源于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关系，永远是在一定生产力状况下，人们所能够接受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生产关系“不是人们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⑤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觉”建立，只能就下面两方面意义而言：一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对旧的剥削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之后才能建立起来；二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政府可以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自觉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整、改革生产关系，使之不断适应发展着的生产力。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它发展的各阶段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也就是说，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归根到底取决于具体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取决于群众可以接受的程度。在这里，既不能从某一经典著作所规定的某些原则出发，也不能从领导人构想的“理想模式”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实践之前，就知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形，他们只能大概指出这条道路的方向。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形，那只有在千百万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才能揭示出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结合本国的实际，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但他们不能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之前，就很具体地制定出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经济形式和具体政策。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只有在群众实践提供的新经验基础上不断修改和完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上面“颁布”下来的，而是群众自己在实践中“创造”的。

那么，人民群众是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呢？如前所述，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确立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使他们有可能在自己的劳动中，在自己的经济生活中以主人的资格“创造着”社会主义的新关系。然而，获取主体地位的人民群众，并非象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一旦进入社会主义就可以毫不顾及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依靠“觉悟”和“热情”，自觉地按照某种“理想模式”的要求从事创造活动。生产关系，本来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超越于人们物质利益的抽象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只能是劳动者在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时，在处理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利益关系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正是在处理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过程中，人们不得不去“寻找”切合实际的形式，从而不断地创造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具体形式。党和国家正是在广大群众实践中所提供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筛选出其中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发展方向的形式，通过法律、法令、文件等形式加以确定和推广，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可见，群众实践——国家法定——群众再实践——国家再法定……，这恐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这从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济形式的形成过程就看得很清楚：在中央正式纠正“一大二公”为特征的农村经济模式之前，我国一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这是他们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形式。后来中央正是在总结他们的

经验基础上，把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一种新的劳动形式确定下来并向全国推广。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实践过程中，群众在解决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和新任务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自己的创造性。例如，目前各种经济联合体、专业组（户）、协作组的涌现，就是群众在新的经济形式实行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中央对这一方向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农村的改革实践，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在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新形式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头等重要作用。同样，在城市的改革和各方面的改革实践中，情况也是如此。

至于谈到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对于社会主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的重要意义，更不用说了。包括广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内的千百万劳动群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直接建设者，社会的全部财富，都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人民群众蕴藏的巨大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丰富创造才能，是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之极其伟大的源泉。在政治生活领域，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主人无疑也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总之，“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④没有群众的创造实践，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诚然，强调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头等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和削弱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党和国家的作用在于，它善于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集中群众的意志和智慧，并在充分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群众的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同他们的领导者——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作用是有机的地联系一起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高群众创造性积极性的基本途径

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但这不等于说，一旦进入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不再受到任何障碍，群众的创造积极性会畅通无阻地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还存在某些不利于群众创造性发挥的因素，甚至还会出现严重压抑群众创造性的现象。这些不利于群众创造性发挥的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够完善的方面和环节，会影响到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二是由于旧社会的思想残余影响或者工作失误等原因，人为形成的某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如官僚主义作风、传统的旧观念、保守思想等等，都严重伤害和束缚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始终“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⑤因此，任何对人民群众这个社会主体有影响的因素，也就影响到他们的创造积极性。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人的能动创造性与客观环境的制约性始终是一对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跟以往社会形态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群众的能动创造性与制约他们的客观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

这种矛盾只有通过根本变革客观环境（社会制度）才能最后解决。而社会主义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一矛盾的对抗性质，这一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和完善化，扫除群众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使群众的创造作用日益增长，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规律。

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呢？基本的途径有哪些呢？恩格斯说，在制约着人们创造作用的前提和条件中，“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⑥因此，为了提高人们的创造作用，也必须从经济、政治和精神三方面创造良好的条件。

首先是经济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必须从经济体制上保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这是基本前提。如前所述，群众的创造作用是同他们的主人翁地位联系一起的。只有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保障时，劳动者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看成自己的事业，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从事工作，他们的积极性和智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说，已确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但由于没有一套相应的具体制度加以保证，体制本身存在着“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群众缺乏应有的自主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就是要改革这种不利于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保证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二是要把人们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物质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多数仍然是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关心自己的工作成果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所恪守的道德准则。当然我们要尽可能增加人们“主观”也“为别人”的因素，但却不能要求我们的社会所有成员现在都做到主观完全不为自己。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⑦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违反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就会降低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延缓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当劳动者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就大大提高。我国农村进行改革前后的鲜明差别，从正反两方面生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正在城市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也必须贯彻这一原则。

其次是政治条件。建立起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应该看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苦任务。由于我国的民主制度本来就不够健全，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严重破坏，虽然近几年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也必将继续改革和完善，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

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条件中，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所存在的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是发挥群众创造性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以权谋私的歪风，不仅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损害党的威信，大大降低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在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的地区和单位，群众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重视，革新精神得不到支持，学有专长的人得不到合理使用，结果严重打击了群众积极性，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

最后是精神条件。人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只有当人们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时，才有可能积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我们搞社会主义，其目的也正是实现劳动者的全面解放，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使劳动者从旧社会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处境中解放出来，而且要把劳动者从精神上受奴役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为劳动者解除精神枷锁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要给劳动者套上新的精神枷锁。思想禁锢政策和文化禁锢政策本质上跟社会主义毫不相容。只有当社会为人们的学术探讨、文艺创作等科学文化活动和思维活动提供一个比较自由的创造环境时，各种各样的精神产品才有可能较多地涌现出来，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满足。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以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战胜和取代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振奋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千百万群众的丰富创造性和聪明才智。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群众性探索和创新的事业。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只要我们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积极而有秩序地进行，我们的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① 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55

②④ 《列宁全集》第26卷，p269

③ 《斯大林文选》p204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506

⑥ 同上书，p478

⑦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572



论突破局限性

张汉青

一、任何人都有局限性，在历史转变时期更是如此

关于局限性问题，应当说不是新问题，因为这是实际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大量现象，不能不为人们所承认。古人就说过：“井鼃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意思就是：不能和井底的蛙谈海，是因为它受到居地的限制；不能和夏天的小虫谈冰，是因为它受到季节的限制。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都很可以用来说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然而，这毕竟是指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所引起的局限性。就认识发展本身来说，思想落后于形势的情况是常有的，在形势急剧发展和转变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由于主观对于客观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只能通过基于变革现实的不断实践，认识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深化，从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因而在不同的时间，对于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谓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都是局限性的表现。只有不断地打破这种局限性，人的认识才能不断地前进和完善，才能较好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并做到具有科学的预见，使工作取得好的结果。真理和知识是不可能穷尽的，人生有涯，学海无边，作为个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即使是伟大人物，也会有不足之处，不可能通晓一切，完美无缺。

除了认识的局限性以外，还有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即时代的局限性。作为某一阶级和生活在那个历史时代的人来说，其认识往往要受其本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制约。这对剥削阶级来说，是至为明显，也是他们所难于摆脱的。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和滥用阶级局限性的概念。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就是这样的，以致混淆了问题的性质，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相对于每个不同历史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人的局限性总是存在的，旧的局限性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局限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存在的新的局限性就更多，更明显。在我们的认识、经验和文化科学知识方面，都有局限性，都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这就有一系列新课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和解决，还有许多必然王国

要我们用实践和思考去征服它。只要我们还没有较好地解决这些课题，我们也就不能摆脱这种局限，还无法得到较多的自由。

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为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那种凝固的，落后于形势的，因而必然障碍改革进行的陈旧概念和框框。这些陈旧概念和框框的存在，有的是“左”倾思想尚未肃清；有的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别国模式而又习以为常；有的是小生产的狭隘眼光，故步自封，得过且过；有的是囿于业已过时的经验，看不到客观事物已大大地推向前进了；有的是官僚主义，闭目不看实际生活中茁壮成长的新生事物，抱残守缺，我行我素。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P142）这些概念、框框之所以陈旧，就在于它脱离了新的生活和实践，用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看问题，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想事情，既不承认情况不断变化，也看不见客观世界的千差万别。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充满辩证哲理的话。其实，就同一时间来说，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哪里又有绝对相同的呢？试看一树浓荫，那无数的绿叶，谁又能从中找出百分之百地、绝对地相同的两片叶子呢？

应该承认局限性。它的存在有社会的根源，也有认识的根源。

二、开创新局面的历史任务，要求每个人自觉地勇敢地突破局限性

承认局限性，就要正视局限性。这个问题并不是都解决了。口头上承认有局限性，实际上仍然用陈旧的观点来观察事物，用老的一套制度、办法来处理新问题的情况，还是不少的。

由于多年来“左”的错误影响，形成了一套观念和模式，并且往往被人们用它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十年动乱中黑白颠倒的公式，诸如“贫穷=社会主义；富裕=资本主义”；“打大捞=社会主义；分散管理=资本主义”等等，今天看来其荒谬性是至为明显的，但它的影响还不能说已完全肃清。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过程，就碰到过重重阻力，有过许多责难，集中的就是那个“包”字，谈“包”色变，把“包”同“单干”等同起来，看不到这是我国广大农民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的一件了不起的伟大创造。在实行对外开放中，也有类似情形，过去闭关锁国情况下的那一套观念、制度、规章，被视为正宗，有些规章是三十多年前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夜时制定的。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的决策，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并为全国的改革探索新经验的，但实施过程中不断碰到这类用陈旧概念和框框来套新事物的问题。一般来说，这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同中央不一致，而是习惯成自然，在旧的轨道上走惯了，不知不觉地用陈旧概念把头脑禁锢起来。这种局限性不打破，何来新的局面？

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例如过去对城市经济体制中长期存在的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等，不认为是什么问题，相反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过去长期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以及分配中长期搞平均主义等，也不认为是什么问题，相反，对提出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观点，视之为异端邪说。这种在经济体制上形成的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伴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决策，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如果不在观念形态上破除这些陈旧的东西，经济建设怎么能突飞猛进呢？

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文化科学和专业知 识，这个局限性对我们很多同志都存在，同样要正视它，自觉地突破它。恩格斯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575）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论断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要把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先进的中国，科学技术确实是使我们如虎添翼的革命力量。

自觉地突破局限性，首先要加强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提高素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p448）我们要突破局限性，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强大的武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古人尚且懂得这个突破视野局限的道理，我们共产党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更要把自己的立足点站得高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活动的基石。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有责任把这个“基石”在自己的思想中打牢靠。回顾这些年走过来的路子，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以及能否适应形势的要求，最终还是世界观问题，即能否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欠缺或随意性，甚至任意支解、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为错误的路线、口号作诠释，这都是理论基石不牢的表现。

自觉地突破局限性，必须重视实践。实践也是学习，在某种意义上是更重要的学习。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19）正确地解释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是我们整个生活道路上不断经历的两个基本环节，但它们的基础都离不开实践。我们要吸收前人、他人的经验和知识，要依靠集体的智慧，这些知识和经验，其根源也是前人、他人和集体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毛泽东同志把这种能动性称之为“自觉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不能离开客观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观本身也是能动的，它不会停滞不前，而是随着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认识论本身，就表明

马克思主义是生气勃勃的。思想上的局限性，头脑中的陈旧观念和框框，要靠正确理论指导下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来突破；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就有了突破思想局限性的正确标准。这样，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

自觉地突破局限性，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把理论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特点，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自己的道路，搞革命是如此，搞建设也是如此。所以，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是党的作风的头一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而要搞好这个“结合”，就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实践，是个人的学习和吸收他人经验的有机结合，也是接触客观实际，以突破思想局限性的最有效办法。只有做好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使理论同实际密切结合，形成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方案、计划、措施等等，才能正确地解放思想，从而勇敢地突破局限性，以高兴的心情，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改革和开放的行列中去，为开创新局面贡献力量。人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多下去跑，多找人谈话，多作调查，不仅头脑感到充实得多，而且眼界也开阔了，同创造新生活的人民群众的感情也加深了。相反，坐在机关久了，脑子就空虚，离生活的激流也就越来越远，这就难免为各种错误论调和陈腐框框所惑。这个解惑的工作，也就是突破局限性。其最好的办法，就是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

胡耀邦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嘱咐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青年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多要求自己”，其中就包括了要突破局限性的问题。他希望中青年干部摆正个人同组织、集体、群众的关系，依靠大家，尊重党组织，尊重集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我们对突破局限性有较高的自觉，我们会想方设法从生活中汲取力量，从而使自己视野开阔，头脑清醒，为完成开创新局面的历史任务而努力。

三、正确处理突破局限性与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关系

突破局限性，是任何时代要求进步、要求改革的人们所共有的；但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阶段中，突破局限性就其最基本的内容来说，又必然带有时代的特点和印记。因此，我们讲突破局限性，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突破局限性，只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进行；而突破局限性，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了顺利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坚持这样做，就会在新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拨乱反正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实践中，已经卓有成效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朝着正确的方向，研究新情况，学习新知识，增强新本事，开创新局面。

突破局限性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但它决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一种螺旋式地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愉快地同过去告别，这个“过去”指的是陈旧的、障碍前进和革新的东西，而一切健康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十分珍惜的。这就是一种批判和继承的关系，突破局限和维护优良传统的关系，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就，对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都必然会产生巨大的作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学说、流派在酝酿、探索或形成。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的新成就、新学派，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一些正是我们的短处和局限。随着对外开放、内外交流的发展，研究国外学术和科学文化的风气，还会进一步开展，看不到这种趋势，是不对的。列宁讲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p348）共产主义者从来对科学方面的新发现、新成就，都是抱着由衷的喜悦的。马克思精通数学，恩格斯移居伦敦后也用了许多时间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革命导师用科学来论证和丰富了他们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对于新流传的学说、流派，以及在如何应用新的综合性基础理论（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方面，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科学的态度。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拘泥于过去的一套理论、方针和方法，显然是不行了的了。那怕是这些理论、方针和方法曾经是正确的，产生过很好的效果的，但今天形势发展了，客观条件变化了，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的任务也是新的了，那末，我们从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都要随着变化了的形势作相应的改变，要吸取新的科学成就使之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发展它。在这里，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拒绝接受新理论和完全抛弃传统，都是不对的。我们要处理好发展和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发展，但其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并在这个前提下随着实践的前进不断发展它，丰富它。恩格斯早就说过：“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538）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突破局限性、解放思想中，必须坚持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遇事多问、多思考几个为什么，提高辨别力，择善而从之。毛泽东同志一九四〇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就有明确的论述，他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

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1964年版合订本P667）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也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一条最基本的结论，这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国传进来的，但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在结合中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而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

突破局限性，是对自己思想的扬弃，同时在学习和借鉴中对所见所闻也要扬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坚信党的优良传统是会传之久远和发扬光大的。这个信念问题，是任何时候也不应动摇的。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共产党员的生命之泉。我们要在改造世界的进程中，不断突破局限性，大胆进行改革，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本文是一九八三年初写成，这次发表时经作者稍作删节和修改。）

.....



也说“叵罗”

熊 飞

王德宇《何物“金叵罗”》（《文学遗产》1982第1期）认为金叵罗是“不能盛酒的金吸管。”窃有疑焉。王文所引诸例，骤看似乎都能证成其说。但古书中例子甚多，比如下引的一些，其中“叵罗”若作吸管理解便说不通了：

“珊瑚杓，金破（叵）罗，倾酒凛凛如龙涡。”（刘长卿《高兴歌》）

“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叵罗，或见银鬘斗者。”（《酉阳杂俎》）

“相得何以酬今日，倒尽樽前金筐箩。”（《平山冷燕》十四）

“一叵罗浑水泼街，登时通道绝尘埃。”（《续都门竹枝词》）

上例一，“叵罗”与“杓”对举，均属能“倾酒”之器物。例二，“叵罗”与“鬘斗”对举，当亦具一定体积，如为一根细细的吸管，即使白昼，在深井之下恐怕也是难于窥见的。例三，与例一情形相类，其中叵罗作“筐箩”，似可揣测此物亦有以竹织制者。例四，明言“一叵罗浑水”，更见叵罗是可盛水之物。综此数例可见，叵罗应是一种容器，可装水、酒等液体。金叵罗，则必是盛酒容器，而非“不能盛酒之金吸管”。

“金叵罗”，作为一种珍贵的酒器，原非汉物，乃西北少数民族所产，至少龟兹、吐蕃等少数民族制造、使用这种酒器，一般用金、银、铜等金属制作，与汉民族的盃、杯、盅、盏等酒器的形制大概相去不远（祖珽可藏于帽底髻上，黄幡绰可藏于靴中，想不会太大）。《辞海》释为“酒卮，敞口的浅杯。”大致是不错的。

辩证逻辑是哲学与逻辑学的边缘科学

王 经 伦

关于辩证逻辑的性质问题，目前我国哲学界和逻辑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辩证逻辑是纯粹的哲学；与此对立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辩证逻辑是纯粹的逻辑学。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似乎都失之偏颇，辩证逻辑应该是哲学与逻辑学的边缘科学。

所谓辩证逻辑是哲学与逻辑学的边缘科学是指，无论是辩证逻辑这一概念的含义，还是辩证逻辑体系中的内容，都具有哲学与逻辑学二重性，其中哲学的特点和逻辑学的特点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逻辑顾名思义是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学相结合而成的一门科学，辩证逻辑的名称本身就已经明显地反映出哲学与逻辑学的双重性质。当然，在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学的结合中，二者的关系是前者指导后者的关系。这是由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地位所决定的。

辩证逻辑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思想来研究思维，使辩证逻辑体系中的各部分内容都呈现出对立同一的哲学特点和逻辑范畴特点。

辩证逻辑的内容包括辩证思维形式（如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辩证思维规律和方法。下面首先阐述它们的对立同一哲学特点的具体表现：

辩证逻辑所研究的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的内涵和外延的对立同一的思维形式，无论是概念的内涵、外延自身、还是内涵与外延的关系，都存在着对立同一的特点。概念的内涵包括类对象的一般属性与个体对象的特殊属性的对立同一，它表明思维对象的一般属性与特殊属性的联系和区别；概念的外延具有理性概念与客观对象（思维对象）的对立同一，它表明理性概念的实体存在于客观对象之中；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关系具有内涵越丰富则外延越宽广、内涵越简单则外延越狭窄的对立同一，它表明对思维对象认识的本质内容与所指对象之间的正比关系。这是辩证逻辑所研究的具体概念与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抽象概念在内涵外延关系上的根本区别。概念具有对偶性概念和具体概念等类型，对偶性概念是自觉地反映思维对象的矛盾双方同时存在的概念；具体概念则是思维对象“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对立同一的概念。

由于判断是表达主词和宾词自身以及主宾之间的矛盾复合结构的思维形式，因此在判断中，思维对象内部的矛盾性得到充分的展示，使对立同一特点鲜明地表露出来。判

断结构中的主词和宾词分别包含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复合结构，如果用符号 S 来表示主词，那么，主词内部的对立同一结构就是 $[S \wedge \bar{S}]$ 。其中， S 和 \bar{S} 分别表示主词的矛盾双方， $[]$ 则表示 S 和 \bar{S} 的同一、即矛盾的双方有机地组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主词矛盾复合结构。如“男性和女性都是人的性别”这一判断中的“男性和女性”则属于这种主词矛盾复合结构。如果用符号 P 来表示宾词，则宾词内部的对立同一结构是 $[P \wedge \bar{P}]$ 。如“运动是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中的“既在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这种宾词矛盾复合结构。除此之外，判断中的主词与宾词之间也存在着肯定与否定的对立同一结构，它表明矛盾的主词和宾词双方分别反映了判断对象的对立面，它们辩证地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判断整体。如“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好事。”它的符号为 S 是 \bar{S} 。这里的 \bar{S} 则表示判断结构中的宾词。当然，判断中的对立同一结构是多种多样的。

判断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展开，发展为推理。推理是揭示推理前提与推出结论之间的对立同一的思维形式，因此，推理的各组成部分以及整个推理过程都是对立同一的。推理是由推理的前提和推出的结论所组成的，由于推理前提、推出的结论是以带有主词或宾词的矛盾复合判断的判断形式出现的，不言而喻，推理的前提和结论内部的结构是对立同一的。在推理的过程中，由于推出的结论除包含有从前提中必然地引伸出来的、具有同一性的意义外，还包含有在前提中尚未展开的、对立的意，表现为推理前提与推出结论的对立同一。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推理的前提，依据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最后推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对立同一结论。在辩证逻辑中，尽管推理的种类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推理过程的对立同一特点却是相同的。

辩证思维规律和方法同样具有对立同一的哲学特点。

辩证的思维规律是整个辩证思维的本质联系，辩证思维通过对自身运动过程的规律性考察，总结出对立同一为辩证逻辑的最本质联系，即最基本的规律。从而使对立同一在辩证逻辑中具有最根本的规定性。

辩证的思维方法是受辩证的思维规律制约的，既然对立同一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那么，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为基本的辩证思维方法也同样具有对立同一的特点。分析就是把完整的思维对象“折散”即分解为各个部分、方面、层次和关系等，然后分别加以考察的逻辑方法。综合则是把被“折散”的思维对象的各部分、方面、层次和关系等重新“组装”为有内在联系的整体逻辑方法。显然，分析的方法与综合的方法是对立的，但是，又是同一的，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综合是以分析为前提的，如果不是通过分析的方法了解思维对象的各部分等的基本规定性，那么，就不可能进一步把握各部分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同理，没有综合也就不能把分析的结果概括起来。

以上看出，辩证逻辑体系中的每一部分内容，毫不例外地表现出对立同一的哲学特点，贯穿着整个辩证思维的过程。不仅如此，辩证逻辑同时还具有逻辑范畴的特点。

任何一门科学总是需要一些基本范畴来表述该门科学的特定内容，辩证逻辑也不例外。由于辩证逻辑是以辩证思维为研究对象，它属于主观领域中的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的目的，是要揭示对象的本质及对象之间的本质联系等。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然要借助于专门揭示思维对象的本质属性及思维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手段才能实现。因此，辩证逻辑的基本范畴就是包括上述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在内的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思维规律和辩证思维方法。综观国内外的辩证逻辑著作、论文，不可能有辩证思维形式、规律及方法之外的基本范畴来反映辩证逻辑的特定内容，而只存在着如何表述或规定这些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区别。这就是说，辩证逻辑不可避免地具有逻辑范畴的特点。

尽管形式逻辑也具有思维形式、规律、方法的基本范畴，而辩证逻辑的基本范畴区别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的标志之一，就是辩证逻辑的基本范畴具有体系性。即辩证的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自成体系，最后由这些形式、规律及方法体系构成整门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

以思维形式体系加以说明。辩证的思维形式体系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等基本思维形式所组成的，在这些基本思维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形式向另一基本形式过渡的逻辑连贯性，各基本的思维形式一环紧扣一环，由此组成辩证思维形式的体系之网。而在这个体系之网中，是以概念这一基本形式的研究为核心的。

概念是个矛盾的同一体，它凝聚了内涵与外延中的主观与客观、同一与差异、肯定与否定等矛盾。当思维向前运动时，要求把这些矛盾展开，区分为各个环节。概念内部矛盾的展开形式就是判断，这时概念过渡到判断。判断展示了概念的矛盾内容，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里体现了概念与判断之间的相互联系。

判断内部矛盾的展开过渡到推理。由于构成判断的要素——概念内部集结了对象的多方面的个别属性和一般属性，而企图通过一个判断同时展示概念所反映的这些属性是不可能的，这是受判断的主宾词对应结构所制约。而要达到概念内部属性的全面展开，需要有两个以上的判断，并且按其规律性合理地联结起来才行，这就导致推理的产生。

通过推理获得的知识，又可以进一步凝聚为包括思维对象内部的各种矛盾的具体概念形式。

这说明，辩证思维形式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以概念这一基本形式的研究为起点和终点的。辩证逻辑中的辩证思维规律及方法的基本范畴，同样具有体系性，这是辩证逻辑基本范畴的特点。

以上分别阐述了辩证逻辑的哲学特点和逻辑特点。这两点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对立同一的哲学特点是通过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的逻辑范畴表现出来的。反过来，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的逻辑范畴又总是呈现出对立同一的哲学特点。正是由于辩证逻辑具有哲学的和逻辑的特点以及两特点的密切关系，决定了辩证逻辑的性质属于哲学与逻辑学的边缘科学。反之，如果把辩证逻辑只看作是单纯的哲学或单纯的逻辑

学，其结果是抹煞了其中某一方面的特点以及哲学与逻辑学特点的相互关系，显然，这是不符合辩证逻辑的实际情况的。

二

把辩证逻辑规定为哲学与逻辑学的边缘科学，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有利于运用辩证法揭示思维的运动和发展，使辩证逻辑克服形式逻辑撇开思维矛盾的局限性。

辩证逻辑对思维运动、发展的研究，是遵循着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这一途径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就是通过分别确立思维对象各部分、各方面和各阶段等的基本规定性，然后揭示各部分、方面和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这些部分、方面、阶段有机地综合为思维整体。在抽象上升为具体的途径中，分别出现了辩证思维过程的起点、中间和终点环节问题。

所谓起点环节，就是考察抽象的必要性和局限性的环节。抽象就是概括一类思维对象的基本规定性，即是把一类对象的基本性质、关系这些相同属性提取出来，赋予理性认识的形式，使认识脱离感性具体材料的直观性、形象性和表面性。抽象是辩证逻辑的思维全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阶段（或环节），人们要把感性认识深化为辩证的认识，必须经过抽象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辩证逻辑不可能全盘否定抽象，相反，它吸取了抽象的积极因素，把抽象作为辩证的思维全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因此在辩证逻辑的认识成果中仍然保留着抽象的积极因素。

但当辩证逻辑进一步考察抽象时，发现抽象同时又存在着局限性——它只反映了思维对象中相同的属性，而不能同时反映出对象中的相异之处。这一局限性是抽象本身无法克服的，这是由抽象的本性决定的。只有把抽象上升为具体，其局限性才能彻底克服。这就导致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思维途径的中间环节的出现。

所谓中间环节，就是展示思维对象的内部矛盾的环节，因而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环节。辩证逻辑通过批判抽象撇开矛盾的局限性，进入到自觉地揭示思维对象的内部矛盾。在这个环节中，思维对象各部分、方面的内部、以及各部分、方面之间的相异属性被揭示出来，相异属性和相同属性以及相异属性内部都表现为相互对立，因而处于这一环节中的认识也呈现出对立的状态。

‘相同属性和相异属性内部矛盾的揭示，标志着思维已经超出了只看到思维对象相同属性的抽象水平，它是抽象上升为具体这个根本质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阶段。如果进一步从对立状态中把握思维对象的同一性——这就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途径的终点环节了。

所谓终点环节，就是综合了相同的和相异的属性，达到对思维对象的同和异的对立同一的认识。因此，终点环节是思维对象“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即是辩证逻辑认识成果的体现。

从上面看出，辩证逻辑所阐述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思维途径，是分别通过上述三个环节来实现的。那么，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思维途径的本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对立统一。因为在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起点环节，辩证逻辑虽然对抽象进行了考察，但处于这一环节上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无矛盾（即把思维对象相同的属性概括在一起，相异的属性被撇开）的水平上，表现为思维的同一性。在抽象上升为具体的中间环节，思维对象中的相异属性被揭示，认识到“同”与“异”的矛盾，表现为思维的对立性。在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终点环节，思维综合“同”与“异”的矛盾，从对立中把握思维对象的同一，形成对立的同一。

辩证逻辑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这一途径来研究它自己的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因此，对立统一的哲学特点体现于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之中。

三

辩证逻辑是发展中的一门科学，它向边缘科学的方向发展，是顺应逻辑学当今的发展趋势的。

自十九世纪以来，一些逻辑学家力图从边缘科学的方向发展逻辑学。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理逻辑首先获得卓越的成就。

数理逻辑是借助数学中常用的形式化语言的方法来研究演绎推理的科学。数理逻辑中的推理，是通过把推理前提和推出结论之间的形式关系化为一系列的符号系统，并且对这些符号系统进行演算而实现的。关于数理逻辑的性质，无论是逻辑学家还是数学家，都承认它是逻辑学与数学的边缘科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数理逻辑不但形成了科学体系，而且它的原理在开关线路、自动化系统和计算机设计等技术部门中得到了应用，这说明对逻辑边缘科学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同时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继数理逻辑之后，人们把辩证法引入逻辑学，研究思维的运动和发展，并力图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起来，黑格尔无疑是这一思想的先驱。黑格尔是辩证大师，主张靠概念、思维来把握认识的对立统一。他继承前人把思维过程分为悟性、理性阶段的思想，认为悟性思维是形式逻辑同一律的思维。这种思维是空洞的、僵化的和片段的。他实际上是辩证地否定悟性思维，认为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对立统一，才是合理的思维。黑格尔进一步把理性思维分为消极理性和积极理性，消极理性能认识思维内在的矛盾及其转化，而积极理性超越矛盾的转化，达到对立统一。黑格尔在研究思维的过程中，紧紧抓住矛盾分析的方法，认为矛盾是思维发展的动力，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是思维矛盾运动、发展的过程。他在《逻辑学》一书中构造了完整的“思辨体系”，其中贯串着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位一体”的思想。列宁指出：“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列宁全集》88卷第258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对逻辑学与辩证法、认识论的

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同上书，第89至90页）这就是说，逻辑学既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辩证法，又是对认识史进行总结的哲学认识论。后来，列宁更明确地表述了这“三同一”的思想，指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于同一门科学”。（同上书，第357页）

此外，近代逻辑史上还出现了逻辑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的不乏其人。其中德国逻辑学家、心理学家冯特提出，把逻辑学与心理学融合起来，由心理学提供逻辑学的认识基础。冯特这些思想，对于后人处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颇有影响。

由此可见，近代逻辑学的发展趋势，不是把逻辑学封闭在自身的狭小范围内，而是结合逻辑学以外的思想、方法，从边缘科学的方向来发展的。这是逻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趋势，务必引起我们逻辑工作者的注意。

为什么逻辑学沿着边缘科学的方向发展呢？这是由形式逻辑存在的必然性以及改革形式逻辑自身局限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沿用的形式逻辑，除增加了十七世纪培根提出的归纳法和十九世纪穆勒概括的确定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等部分内容之外，基本上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那套形式逻辑。形式逻辑长期延续下来，如此“长寿”，是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的。这种存在的必然性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形式化”以及和自然语言密切联系这两大特点之上的。第一、“形式化”特点：形式逻辑是指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其名称足以标明该门科学的特点。它采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思维形式的结构。思维形式是对各种各样的思维具体内容的最高概括。试问：对“我是一个人”、“明天是晴天”和“老虎是动物”等直言判断（性质判断），除用“S是P”的符号来表达其形式结构之外，能想象还有更高的概括？由于形式逻辑具有高度的科学概括价值，因而适用于任何一个语言不同的民族，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第二、和自然语言结合的特点：形式逻辑是和人类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要运用语言交流思想，必定要通过形式逻辑把语言组织起来才能实现。这说明形式逻辑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人类不能没有语言，因而也就不可能废除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将伴随着人类自然语言而永久存在。那种认为可以人为地将形式逻辑送进历史博物馆的高论，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形式逻辑具有以上两个特点，因此使它长期存在。

承认形式逻辑存在的必然性，并不等于说形式逻辑是完美无缺的。在实际的思维过程中，合乎事实的思维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形式逻辑既然不能反映这些矛盾，由此产生改造形式逻辑局限的必然性。

从对形式逻辑存在的必然性和改造其局限的必然性的分析中看出：人们不能奢望出现一门完全不同于形式逻辑的思维科学，形式逻辑两千多年的存在历史雄辩地证明这一点。而只能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借助新思想、新方法的优势，来克服形式逻辑的不足，使新思想、新方法和形式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新型的思维科学。这就规定了逻辑学只能沿着边缘科学的方向发展。



吴自牧小考

官桂铨

《梦粱录》是非常有名的宋人笔记。清初学者王士禛《渔洋文略》中有《梦粱录》跋语说：“《梦粱录》二十卷，不著名氏。”乾隆四库馆臣谓王士禛所见抄本，脱掉了作者吴自牧自序，故不知也。检《永乐大典》所引，“条条皆题自牧之名，与此本相合。”确定作者为吴自牧无疑。然而，“自牧，钱塘人，仕履未详。”（均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梦粱录条》）钱塘人仍据《梦粱录》自序未署“钱塘吴自牧书。”《中国人名大辞典》吴自牧条只写“宋钱塘人，有《梦粱录》”八字。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吴自牧条同样说“生平亦无考。”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标点本《梦粱录》的“出版说明”也说：“吴自牧，宋代钱塘（即今杭州市）人，生平已无从查考。”可见二百年来，吴自牧的生平并无新的发现。

我在明藏书家徐燊《红雨楼书目》卷四集部最后的“家集类”中看到一条有关吴自牧的重要线索：“《新安吴氏倡于篇》一卷。唐吴少微、吴巩，宋吴自牧、自中。”新安即今安徽歙县。吴少微（？—706），唐新安人，进士出身，武周长安中（701—704）任晋阳尉，与武功富嘉谟友善，文词以经学为本，古朴典雅，时人慕之，称“吴富体”。吏部侍郎韦嗣立荐为监察御史。神龙二年（706）三月，闻富嘉谟死，哀伤过度，不久亦死。有集十卷，已佚。《全唐诗》、《全唐文》分别收其诗六首，文六篇。新、旧《唐书》均有传。吴自中乃吴自牧之弟。

可见，吴自牧原籍新安，为唐文学家吴少微的后裔，后迁居钱塘，遂为钱塘人。有弟名吴自中，亦能文。吴自牧、吴自中及其远祖吴少微、吴巩的著作均收入其“家集”——《新安吴氏倡于篇》中。徐燊藏书散于清初，今福建省图书馆等还有其藏书不少，《倡于篇》未见传本，当早已散佚。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论述

高 齐 云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始终以认识、掌握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及其运动特点为中心，以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种具体矛盾为任务，从而达到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目的。把理论和实践、探索和运用结合起来，是他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显著特色。

把握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 创造性地解决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中国社会将出现什么样的矛盾，怎样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顺利地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夺取全国政权前后，摆在党的领导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考察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消长的趋势，科学地预见了在基本解决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解决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实施纲领，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首要步骤。

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解决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首要特点。国家工业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任何国家强大兴旺的物质基础。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工业化，是在剥夺资产阶级后和农业集体

化运动前进行的。在过渡时期内，中国社会仍然是落后的。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的生产关系方面，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私有制，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大量的部分。它还表现在社会的生产力的水平很低，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这就说明要解决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既要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更要发展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因而在制定、贯彻总路线时，不仅要求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时间上同步的，而且要求二者在内容上互相配合。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带动社会主义改造。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

先抓个体农业的改造，以农业合作化的浪潮推动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国解决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另一特点。过渡时期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农业又是工业产品的主要国内市场并为工业提供众多的原材料。因而，个体农业的改造成为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的突破口和先行点。

从各方面准备条件，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是中国解决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又一特点。中国解决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重点是解决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做过大量的思想工作，指出他们只要继续过好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在经济方面，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这就必然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推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展开，更有力地推动了 this 进程。

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阐述的阐述，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实际情况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承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他却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就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并使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在长期内未能真正实现。

从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中确定基本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这是一个长期争论而未能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的思想。

从纵的方面考察，从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运动史考察，是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内容之一。他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侧面，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有的矛盾发生了、有的矛盾突出的情况。在生产关系方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以后，又发生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在这两种公有制经济内部，积累与消费之间又存在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处理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以及目前需要和长远需要的矛盾。在消费方面，又有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经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①上层建筑方

面存在的官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也日益突出。这种不适应，在官僚主义的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上集中地表现出来。这种官僚主义压制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成为根本的任务。因而，劳动方式中手工劳动与机械化劳动的矛盾、机械化劳动与自动化劳动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个矛盾是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必须着重解决的矛盾，并且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广泛地实行技术革命才能解决。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②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还强调在技术革命上，我们应该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不要跟别人的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重复世界各国发展技术的老路。

从横的方面考察，从社会的不同领域所包含的不同矛盾的内容考察，这是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又一内容。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正是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为基础的。他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就揭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同矛盾，从而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普遍性。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日益突出，毛泽东同志着重考察了经济建设中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因此重工业是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就发生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矛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矛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矛盾等，需要处理和解决。与经济建设有关的这些矛盾，都共同地涉及到投资的安排问题。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当然必须保证重工业作为投资的重点。要改变工业布局的不平衡，就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工业投资的大部分必须放在内地。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同样必须保证较大的投资。但是，如果认识上出现片面性，把“重点”变成“唯一”，轻视甚至忽视非重点的投资，那末，不仅影响非重点本身的发展，也势必影响到重点的发展。这就说明投资的安排

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使矛盾双方互相削弱还是互相促进，这才是处理这些矛盾必须考虑的关键。后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必须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去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安排整个经济建设。这种顺序体现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客观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是有利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的。

毛泽东同志接着考察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些矛盾既涉及到经济领域的问题，又涉及到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上述几种矛盾，首先在经济方面表现出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里，都存在财政收入的分配和投资的分配等经济问题。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以及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后来，他又提出了“统筹兼顾”，作为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則。这样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因为上述矛盾的双方在根本的经济、政治利益上是一致的。只有兼顾矛盾双方的利益，才能妥善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中，还揭示了这些矛盾涉及的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他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时，指出“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④在这里，关键是中央和地方应当正确地划分权限，扩大地方的权力。地方有了应有的权力，才有更多的独立性，才能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少数民族必须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工厂、合作社的主人，应当具有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所以，这些矛盾的处理，关系到上层建筑的改革。这个问题虽然早已提出，但在实际中并未得到解决。目前，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体制改革，才真正解决了扩权的问题，从而使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

毛泽东同志还考察了党和非党的矛盾、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是非矛盾，这些是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在分析这些矛盾时，他强调要正确地划清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

是和非的界限。后来，他进一步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区分敌我界限和是大非的界限，并且具体地提出了区分敌我的政治标准和区分大是大非的六条标准。他还强调处理这些矛盾，要做好转化工作，即变反革命为不反革命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达到矛盾的解决。

最后，毛泽东同志还考察了中国和外国的矛盾，这是涉及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矛盾。在研究中国和外国的矛盾时，他首先阐述辩证的两点论是正确认识、处理中国与外国的矛盾的指导思想。其次，他阐明对一切国家及其经验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全部肯定、一切照搬，也不要全部否定、一概排斥。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④再次，他还应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经济不发达和文化科学水平低这两大缺点，指出这两大缺点也是优点。因为正确地认识了这些缺点，就会谦虚谨慎、奋发图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同志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发现这些矛盾制约着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并且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因此，他明确地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还具体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特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上层建筑是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这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还很不完善，还包含旧的残余和影响，因而同生产力、经济基础又存在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⑥

毛泽东同志从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中，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非对抗性的性质，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思想，为人们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矛盾的变化规律，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怎样变化的？它们的变化规律怎么样？这是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所必须阐明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是和发现、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紧密联系的。

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仅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后仍然存在矛盾，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他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认为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而这种平衡和统一不断地为经济的实际发展所打破，有时也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而破坏，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矛盾是不断解决又不断出现的。毛泽东同志由此得出结论说：“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⑦

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矛盾变化的普遍性。而对抗将消失，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变化的特殊性，是毛泽东同志所着重探讨的。为了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的规律，毛泽东同志丰富、深化了对抗和非对抗的概念。在《矛盾论》中，他把对抗和非对抗解释为矛盾的斗争形式的差别。到社会主义时期，他认为对抗和非对抗既是矛盾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又是矛盾的性质区别，因为矛盾的斗争形式是受矛盾的性质制约的。因此，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引进、使用了“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概念。社会中的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区别，在于矛盾双方是否在本质上根本对立。

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的消失是逐步的，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并从几个方面作了阐述。首先，这种演变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从在阶级对抗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变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居于非主导地位。其次，这种演变还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从阶级对抗社会的大量存在，变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非大量的存在。再次，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出现某些新的对抗性的矛盾，某些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

完善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的阶级斗争必将完全消失，而社会的其他的对抗性的矛盾也必然成为偶然的、与社会的本质无关的现象。毛泽东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探讨，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的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

社会矛盾的变化与解决是和人们的活动分不开的，这是各个社会形态矛盾运动的共同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变化与解决具有什么特点？毛泽东同志在其研究中，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和阐述。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基本一致的，社会不再分裂为彼此对抗的阶级。虽然，社会还存在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调节，这些特殊的利益不允许超过共同的利益，这些不同的社会势力也不允许变成相互对抗的社会力量。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变化和解决的过程中，人们的活动虽然是不同的，其中却包含着一致性，即使矛盾在有利于矛盾各方的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在有利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这样解决矛盾的结果，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或双方同归于尽，而是矛盾双方的共同的协调的发展。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变化和解决，仍然存在两种可能性。毛泽东同志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⑧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产生和变化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这就使矛盾有可能朝着好的方向解决。但是，由于在国外还存在敌对性的社会力量，在国内也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主观上还可能对矛盾的认识、处理不当。这样，矛盾也可能朝坏的方向变化和解决。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经济基础制约着社会的矛盾朝着有利于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方向变化，广大的人民群众促使社会的矛盾朝着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方向解决，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规律的认识日益提高，引导着社会的矛盾按照客观的规律变化和解决。因此，可以说实现好的可能性，朝着有利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得到解决，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演变的基本趋势。

毛泽东同志通过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变化及其规律，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地位与作用，肯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他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and 变化。”^⑩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依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确定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 探索解决各种矛盾的具体方法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变化的规律，是为了引导全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的任务。

为了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其研究中提出、阐发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与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哲学概念不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政治的概念。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说，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而敌我之间的矛盾，则是在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⑪前者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政治性的矛盾，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相联的。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如果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那就势必破坏人民的团结，危害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统一。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要以我为敌，扩大打击面；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不要认敌为我，纵敌为患。毛泽东同志在开始论述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时，明确地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⑫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提出和阐发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正是为了引导全党正确地认识、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加强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为了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首先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制定和阐发了一个基本的方针。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最初是以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经验为基础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⑬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完善了这个基本方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地表述了这个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⑭

这个基本方针要求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毛泽东同志研究和运用社会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成果。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积极因素将日益增多，消极因素将日益减少。这种积极的因素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且随着自身的增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总结国内外的正反经验，肯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消极因素可以转变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认识了这种客观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要尽可能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减少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阻力，增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促进力量。显然，这是对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巧妙运用，是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正确方针。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为了正确地解决它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针，也只有矛盾的解决中得到贯彻和实现。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大量的。因此，根据非对抗性矛盾的特点，找到解决它们的具体方式方法，就是研究、运用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实际课题。

毛泽东同志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在涉及矛盾各方的利益时，要做到统筹

兼顾。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各方，它们的根本利益是彼此一致的，矛盾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对根本利益缺乏一致的认识或在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上不一致。因此在涉及矛盾各方的利益时，不能以损害一方的利益去增加另一方的利益，而必须实行统筹兼顾，在不损害矛盾各方的情况下发展它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以达到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④这里谈到的种种问题，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各个部分、各个阶层、各个团体的实际利益。因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决不可以撇开或忽略某一部分人，损害或否认他们的利益。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扩大、加剧矛盾。正确的办法是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就实际的可能条件，作出适当的安排。这样，矛盾各方就可以建立新的平衡，得到新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在涉及矛盾各方的关系时，要使它们互相结合。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各方的对立，不是本质上的根本对立，而是非本质的对立。因而矛盾双方的要求虽然各不相同，这些要求又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⑤所谓红，是要求干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但又要反对空头政治家。所谓专，是要求干部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专业本领，但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与业务的要求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构成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干部的必然要求。这样，通过矛盾各方互相吸收、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自我扬弃的办法，去克服消灭彼此间的差距，使彼此之间的一致因素不断增加，彼此的关系达到新的协调，形成新的矛盾统一体。

毛泽东同志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在涉及矛盾各方的发展进度时，要使它们同时并举。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各方的对立不是本质上的根本对立，彼此之间的要求具有一致性，它们之间还具有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彼此朝着共同的目标、方向前进。毛泽东同志提

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大中小企业等，应该同时并举。因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虽属不同的生产部门，各有不同的生产内容，但矛盾双方却朝着共同的目标运动。所谓同时并举，就是要求彼此具有相适应的比例，使双方能朝着一致的方向共同前进。

毛泽东同志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在涉及矛盾双方的先进与落后的对立时，应该发挥先进方面的帮、带作用。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双方的对立不是本质上的根本对立，双方还存在一致性的要求和共同的前进方向，因而矛盾双方的斗争形式是和风细雨式的，这集中地表现在解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上。由于各自条件的不同和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存在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往往表现在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对立上。解决这种矛盾，只应采取和风细雨式的斗争方式，让先进的一方帮助落后的一方去克服错误、缺点和弱点。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⑥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前进。

总之，从统筹兼顾着眼，通过和风细雨式的斗争，使矛盾双方互相结合，同时并举，协调发展，共同前进，这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方式方法。

不断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 是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社 会辩证法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还重视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如何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并且得出了重要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认为要正确地掌握、应用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必须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他说：“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⑦正确地反映矛盾，是正确地解决矛盾的前提。而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矛盾，就是要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

要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首先必须承认主观和客观之间存在矛盾，承认主观的认识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之间存在矛盾，从而才有可能

使主观的认识去符合客观的实际。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承认我们在经济建设上还缺乏经验，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⑧到一九六二年，他仍然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⑨这些见解的提出，对于全党认识主观世界同社会主义社会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从而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其次，要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完整地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还必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

国。”^⑩如果人们的认识不能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并且用原有的经验、认识去指导实践，那就必定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犯错误。

在原则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后，继续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实践，不仅造成工作的失误，而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严重的错误。这的确是非常沉痛的教训。

①、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75、188、275、285

⑤、⑥：同①书P373

⑦、⑧、⑨、⑩：同①书P375、352、372、365

⑪、⑫、⑬、⑭：同①书P363、267、387、387—388

⑮《解放军报》1970年4月18日

⑯、⑰、⑱：同①书P157—158、401、401

⑲、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P22、18—19

.....



“怆恨”当作“怆恨”

董志翘

汪绍楹校注本《搜神记》卷一：“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

按：“怆恨”当作“怆恨”。“怆恨”乃汉魏时习用语，为“悲伤”之意。《三国志·魏书·臧洪传》：“幸相去步武之间耳，而以越舍异规，不得相见，其为怆恨，可为心哉！”《文选·班彪·北征赋》：“游子悲其故乡兮，心怆恨以伤怀。”李善注：《广雅·释训》：“怆怆恨恨，悲也。恨，力上切。”又《文选·曹大家·东征赋》：“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恨而怀悲。”字均作“怆恨”。《搜神记》中因“恨”、“恨”形近而误作“怆恨”，遂难索解。又《搜神记》卷十六：“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犹斫之，伤脾。”此段中“繇意恨”之“恨”亦当为“恨”。此“恨”为“眷恋”之意，因钟繇虽知女为鬼物，仍有依恋之情，若作恨，则意不可通。而汪校因未联系上下文意而漏校。

科学与社会分析法和行政管理*

钟阳胜

(一)

科学在社会发展中,一方面作为生产力在促进社会经济的高涨和整个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作为思想资料和技术手段,不断帮助人们创造新的社会分析法和获得新的社会管理的手段。本文拟就后一方面进行粗浅的探讨。

科学的发展是和人类社会整个历史的进程相一致的。从原始社会直到封建社会灭亡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科学的缓慢发展及其历史运动形态的不完整性,不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它的制约,而且人们作为社会主体对社会客体的认识、改造和管理,也受到它的直接或间接的制约,在思想方法上一直不能跳越唯心历史观的障壁。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有机体实际是一个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是一个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关系的复杂体系。在这个关系体系中,每一种关系都构成一种次体系,且彼此之间总是按一定的序列,相互作用而组成一个处于运动状态的整体。其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即实践和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物质力量——物质生产力这一人类自己控制的自然力,是人类社会整个关系体系的物质前提和基石。而思想关系,则是一切物质关系的升华,处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最表层。

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一切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在分析和考察社会客体时,几乎都只看到社会关系总体系中“悬浮于空中”(恩格斯语)的这一最表层次的思想关系及其历史作用,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

思想发展的历史,“变动着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①这种对于社会客体长期停滞不前的认识,不仅取决于当时人们主观的认识能力,更主要取决于客观的认识条件。

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科学作为直接和间接的认识条件,制约着人们对社会客体的认识。

一方面,是科学作为思想资料在认识方法上的制约作用。人类的认识史,是首先从对自然的认识开始的。^②在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往往只能通过语言和动作来积累有限的知识。只有进入奴隶社会,有了文字记载,并产生了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以后,才开始出现“有意识的科学”。^③但是,直至封建社会崩溃,自然科学仍然处于直观的、零散的萌芽状态,没有取得独立的知识形态。整个说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表面的、直观的阶段,没有形成本质上互相联系的系统理论知识。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虽然给人类知识带来了第一次大综合,使力学和其他若干科学学科形成为独立的知识形态,但就科学的整体来说,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则尚处于初期阶段,还很不完备。人们将自己在与自然进行直接的物质交往中得到的思想资料和初步形成的机械的认识方法,直接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用以认识变动不居的社会客体,就必然要从直观的认识开始,以社会关系总体系的表层即思想关系为起点,一步一步往里深入。因此,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萌芽状态相适应,人类对社会客体的认识,只能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社会客体的表层和其他不深的层次上徘徊,始终未能揭示历史运动的最终决定力量,未能奔向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大道。

另一方面,是科学借助于物质生产力的中

*文中科学一般指自然科学

介，在认识的物质条件上的制约作用。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灭亡乃至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科学的发展仍处于不发达阶段，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在广阔的领域和较深的层次上，改变自然物质形态，制造技术水平较高的生产工具，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总是不能走出手工工具阶段。与此相适应，在这个历经几个社会形态的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一直都比较简单，且往往被各种血缘的宗法的关系所掩盖，社会生活的各种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充分显露出来。再加上狭小的生产规模，以及不发展的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对人们认识眼界的限制，因此使人们不可能对社会客体及其发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可能在认识上达到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阶段。

(二)

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狂飙时期，并使之由手工工具阶段跃进到一般机器体系阶段。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和社会生产在前进中的困难和要求，又给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刺激，使科学于十九世纪中叶跃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仅有被恩格斯称为三大发现的进化论、细胞理论和能量守恒原理的创立，而且其他如生物学、胚胎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等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所有这些发现和理论，标志科学在对宏观现象的研究上，进入了以整理材料为主的理论整体化过程。接着，十九世纪后半叶，又发现了放射现象和电子。于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便从宏观领域跨进到一个崭新的领域——微观领域。科学和社会生产力在相互作用中的这种富于革命性的发展，不能不对整个社会客体带来革命性的改造，使人们对社会客体认识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一次彻底的变革，使人们对社会的管理上升到科学的阶段。

首先，科学的发展不仅积累了空前丰富的自然信息，比较充分地暴露了自然界各个领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在永恒运动中普遍联系的多姿多彩的自然画面，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使人们由片面的、静止的、分割的方法，逐步进到了整体的、综合的、过程的方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取得丰富的思想资料，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克服过去唯

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创立科学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④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一次最彻底的革命。

其次，科学通过技术的途径，在实践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创造了一个轮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的社会客体。社会生产由狭小规模的小生产进到社会化的大生产，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宗法的纽带为广泛的复杂的经济关系所代替，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全面地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个渗透着科学精神的物质基础上，社会客体获得了过去无法比拟的丰富性，使社会关系首先以经济关系的形式明朗起来，并进而使社会发展规律及其作用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扫除过去历史思想中的各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⑤深入到人对自然的物质关系这个复杂关系体系的最深层次，发现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⑥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⑦是“全部历史的基础”，⑧从而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历史“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⑨奠定了唯物主义地进行社会分析的科学基础。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因而对社会客体的认识，总的只向前迈进到定性分析上，即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社会客体关系体系内部的各种因素和关系的相互制约及制约的性质上。至于对社会客体进行比较精确的量的分析，在当时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新兴学科学的创立和发展，正在推动社会分析法面临重大的突破，为人们对社会客体进行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定量分析，日益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

且先看理论方面。由于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作为数学理论，它包括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博弈论、排队论、库存论、决策论、统筹法、优选法等学科）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以及概率和数学统计方法的应用，人们已经能够运用几十个、几百个乃至几千个数学公式，来精确地描述复杂的社会客体的定量关系，用数学模型把社会客体的整体结构关系体系，完整地严密地表示出来。

再看技术手段方面。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演算技术的革命，使演算的速度上百倍、上千倍乃至几万倍地提高，这就为人们解决对社会客体进行量的分析中演算速度慢的难题，提供了有力的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从而使定量的社会分析的方法形成和运用，有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的保证。

不仅如此，现代科学的发展，还使人们能够通过模拟实验，检验量的分析的正确与否和可行的程度。现在，在控制的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电子计算机，特别是运用正在出现的智能机，人们已经可以把对社会客体进行静态的、分割式的定性分析和模拟它的现实运动状态，对它内部复杂的关系进行动态的、立体式的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得到各种定性的理论结论和反映量的关系的参数，更真实、更具体地认识社会客体及其运动过程，预测它发展的各种可能趋势和预后状况，从而对分析的结果及其运动的过程进行“实验”和“检验”。

社会分析法的这种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法的丰富、完善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法的现代化。

(三)

现代科学的发展深入社会客体，改造社会客体，推动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社会客体认识的社会分析法的创立和发展，必然地要使社会主体对社会客体的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

现在，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借助定性和定量分析法，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手段，正在日益扩大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科学管理领域。它们不仅在工业生产中，而且在商业、交通、银行、教育、科研乃至政府管理和社会个体的家庭生活中，都已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管理。因此，各国都纷纷建立全国性的“资料银行”，即电子计算机中心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按一定的通讯线路，把各个生产单位、学校和科研机构、交通运输部门、商业部门，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联结起来，进行统一的科学管理。唯其如此，所以各发达国家的管理教育发展非常迅速。

历史地看，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管理理论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迄今已大体经过

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生产由手工工场过渡到大机器生产，由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大卫·李嘉图，提出劳动价值理论和分工理论，强调要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科学管理。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以电磁理论为标志的科学的全面发展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完成，电力的广泛应用而带来的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理论便进入了“科学管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过去依据经验进行管理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提，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管理理论。美国的泰罗，就是其主要的代表之一。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在继承和发展泰罗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科学的新成果，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手段，实现了科学的组织管理；另一方面，又创立和发展了“行为科学”，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强调生产管理须在重视物质技术条件的同时，重视社会条件对工效的影响，从人的行为的本质中去激发动力，提高效率。从七十年代开始，又进入第四个阶段，即“最新管理理论”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管理中，普遍采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运筹学等最新科学成果，进一步把管理理论发展为“系统管理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对于社会运动过程，强调要把同某一事物有关的全部组成要素总合起来看成一个系统，把整个国民经济看成一个系统，把每一个行业看成一个系统，把每一个企业乃至其内部各部分也看成一个系统。通过对系统整体及其组成要素在量上的全面分析研究，形成协调模型，求得计划、方案和实施办法的最佳化。

资本主义的管理理论，从反映、把握生产和经营以及对社会过程进行行政管理的规律来说，包含着不少合理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大胆地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的指导下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管理理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通过自身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使社会的生产过程从生产到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协调地构成一个总体，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使社

会的生活过程从经济、政治到精神文化等的内部及其彼此之间，有条件形成一个完整的协调体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巨大的优越性的发挥，毕竟还要靠我们的主观努力。过去，我们在长时期内，由于把可能性等同于现实性，看不清运用现代科学进行社会分析、社会调节、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忽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和发展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科学，而往往停留于用小生产方式的管理办法，是吃了不少亏的。经验和挫折告诉我们，必须面向科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高度重视运用现代科学认识、管理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极端重要性。

必须看到，科学的这种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具有预见作用。吸收了控制论、系统论等最新科学成果的各门管理科学和管理决策科学，都从特定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本质关系乃至数量关系，以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制约，并形成最佳的结构和运动趋向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借助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提供的技术手段，掌握和运用管理科学，就能够从规律上更全面地发现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的协调结构和运动的客观要求，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趋势，从各个方面更清楚地揭示其未来的基本面貌和历史前景，构成一幅未来的图画，形成历史活动的明确目标。可以说，我们能够描绘一幅二〇〇〇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实际就是科学的这种预见作用的生动表现。其次，它具有建立管理模式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社

会的生产和生活中，诸如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流通、卫生体育，以及相应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等，究竟各自采取何种发展模型和正常运动的模式，都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制造”的结果。它们必须根据各自内部的制约关系和彼此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才能合理地建立起来。这样，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管理理论和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各种技术手段，进行系统的分析，作出科学的判断和论证。再次，它具有组织协调作用。各门现代管理科学作为知识形态，都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它如同一切科学理论一样，具有一种“组织作用”。⑩各种科学管理知识，只要具体化为各种管理的原则、计划、制度、指令等，为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及进行具体社会活动的其他社会成员所掌握，就会产生一种象“粘合剂”一样的组织力量。通过这种组织力量，就能够帮助社会机体内部结成较合理的人际之关系和物际关系，以及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形成社会过程内部的协调结构和运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38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③〔英〕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1959年中文版，第32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⑤⑥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245、321、24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页

行为科学与企业管理理论

谭湛明

在本世纪初，科学领域里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欧洲一部分社会科学家、人文科学家和哲学家发起统一运动，1947年成立了“科学统一研究所”的组织；第二，维纳的“控制论”创立，综合运用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心理学、生理学的

知识，把机器的通讯行为与人类的通讯行为融合为一。这两件事启示科学家们利用各种现成的科学知识来发展关于人类和生物行为的一般性理论。行为科学就是五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是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

学的理论,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现在广泛应用于管理、医药卫生、法律、公共行政、教育、国际事务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为特出的是,行为科学自引进企业管理理论后,使管理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突破了英国边沁主张的以最小的努力去换取最大的满足的“功利主义”原则;也从“效率是唯一的标准,人都是没有个性的‘经济人’”的唯理智论者的框框中解脱出来。至此,行为科学成为当代管理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

本世纪一、二十年,人们还习惯于机械地看问题,认为工人的疲劳主要由于血液中积聚了乳酸霉素,如果每日服用磷酸钠,就可消除疲劳。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工作环境和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美国国立研究院在霍桑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开始的出发点还是传统的工业心理学的做法,即研究物质条件如何影响生产效率。试验的目的是想探索劳动条件、工资支付方式、工间休息时间及物质福利条件的改变对劳动效率的影响。但是,试验结果,改善照明条件与未改善照明条件的两个接受试验的小组同样提高了效率,由供应午餐而提高了的劳动效率在减掉午餐供应后仍然得到了保持。因而无法判明改变劳动日或物质条件对生产率的影响。1927年,哈佛大学的教授梅奥参加了这一试验,他分析了前期试验的资料,在继续试验的同时,对实验进行了总结,于1933年出版了《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与传统管理不同的新观点:

1.传统管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认为金钱是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霍桑试验把人看成是“社会人”,认为除了物质条件外,还有社会和心里的因素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

2.传统管理认为生产效率简单地受工作方法和工作条件的制约。霍桑实验认为,生产率的升降主要决定于工人的态度,即“士气”,而士气决定于工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3.传统管理只注意“正式团体”诸如组织结构,职权划分,规章制度等。霍桑试验意识到企业组织中存在着无形的“非正式团体”,这种无形组织有它特殊的感情、规范和倾向,左右着成员的行为。在感情和逻辑之间,人们的思想会更多地受感情的支配。

4.霍桑试验还指出了“新型领导”的必要性。

认为,领导在了解人们合乎逻辑的行为时,还必须了解不合逻辑的行为;要善于倾听和沟通职工意见,使正式组织的经济需要与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要取得平衡。

在霍桑试验的影响下,人群关系的研究有了广泛的发展。1949年科学家们集合芝加哥,提出以“行为科学”取代“人群关系”,形成了行为科学学派。

行为科学在管理上的探讨焦点,集中于将人类看成一个社会的整体,又将世界环境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将企业看成社会总体中的一个经济细胞。这个细胞由技术、经济、管理、领导以及人事等诸因变量组成,其中重要的变量是个人的活动、交往与情绪。在一个企业中,这三者的交互影响,就产生真正的行为,决定企业生产力的高低,反过来又影响生产者的满意与情绪。由此形成一个系统的方法,足以分析企业中各种行为的类型,作出正确的管理决策。

行为科学被引进管理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与某些社会科学有着很大的不同。社会科学家,或许能以逻辑和历史的抽象模式来分析人类行为,这种情况尤以经济学家最为突出。行为科学则着重由控制观察中直接获得的经验资料,指导管理实践。它从企业中人的行为的内在因素出发,作出动态分析,客观地研究人类行为产生的原因及造成的后果。它的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调查法、测验法、实验法、统计法、逻辑法与假设法等,所以它可作为直接改善管理的科学方法。这对管理理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从行为科学来看企业管理,需要与组织是应该着重考虑的两个交切面。需要是从个人出发,组织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考虑问题。这两方面相互影响,派生出激发动机理论、领导行为论和团体行为论等几大层次。

激发动机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它在企业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根本点是动机问题,这是心理学的传统领域。心理学家马斯洛四十年代提出“需要层次说”,这是早期的激发理论。按照马斯洛的原意,人有生理、安全、归属、尊重、自我成就这五种基本需要,从下至上形成一个金字塔。也就是说,不先满足底层的需要,就不得不牺牲高一级的需要,需要是一级一级地得到满足的。当然,生理的需

要是最基础的，一般必先满足它才能顾及较高级的需要。但这个理论是有其缺陷的，因为一切需要不是一定都要按层次先后去得到满足，特别是没有必要将一个一个需要分别加以考虑。各种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受文化背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的，美国人“相当水准的满足”，与印度僻远乡村比较，就要高得多了。五十年代后期，赫茨伯格提出了双因素论，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激发理论。他认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因素归结为两类：①“保健因素”。这类因素只能消除工人的不满，不能刺激他们的积极性。就象保健一样，只能防止疾病，不能医治疾病。其中包括企业政策的公平合理性、工资、工作条件与上级及同事的关系等。②“激励因素”。这类因素能刺激人的工作积极性。其中包括工作成就、工作的被人承认、工作的挑战性、责任和前途等。他的核心思想在于说明工资、工作条件等都是外部条件，真正调动人们内在积极性的力量存在于工作本身。六十年代，麦克莱伦又提出“成就需要激发论”，他把人的需要分成三类：成就需要、情谊需要和权力需要。认为成就需要是事业成功的首要因素。具有高度成就需要的人，其特点是：关心自己的成败；喜欢挑战性工作；主动寻找新事物的尝试机会；能为自己订出经过努力而能完成的指标；对事业不采取赌博的态度；愿意承担责任，注意自己的影响和工作成果；刻苦耐劳等。他指出成就需要可通过教育来提高。一个企业的成败，一个国家的盛衰与有高成就需要的人数有直接关系。接着，佛隆在1964年出版了《工作与激发》一书，提出“期望模型”，发展了前两者的激发理论。他认为对一种行为的激发作用，取决于这一行为对达成个人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其理论模型为：激发力量 = 效价 × 期望（效价：即目标价值，是指某一目标的实现，对于满足个人需要的重要性的评价；期望：指一定行为能使个人所期望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概率）。由于它考虑到激发对象的心理特殊性，因此受到重视，但这一理论较新且抽象，目前在管理上还未能实际应用。后来，斯金纳等人又提出了行为改造理论，认为人会对外界刺激做出相应反应，因而可以利用各种强化因素对人的行为加以诱导和改造，使之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行为科学渗入企业管理的第二层次是研究领导行为。所谓领导的含义是对他人行为的引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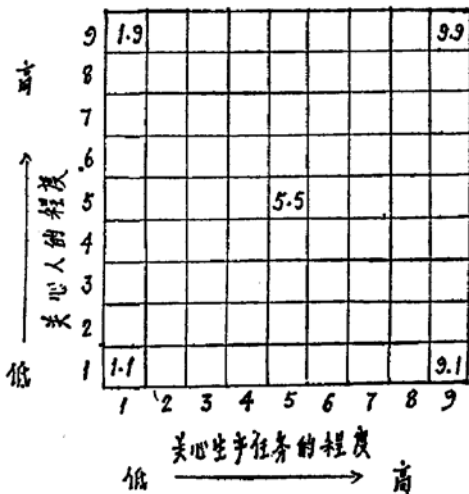
影响和协调。以往，社会学和心理学家对企业领导的研究着重领导者个人的品质，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实验，大多数行为科学家抛弃了这种领导品质天生论的观点，把领导看成为一种动态过程，可在实践中培养提高。而且认为有效的领导行为，应随着被领导者的特点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领导 = f（领导者、跟从者、环境）。

麦葛端哥将古典组织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理论，他把前者称为x理论，后者称为Y理论。他认为：x理论来源于教会和军队，没有接触现代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此对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企业经理根据这种传统观点看人，因此对人性作出了错误的假设：人类天性厌恶工作，他们尽可能避免工作；对大多数人必须用管、卡、压以至蒙受惩罚的威胁，使他们为完成组织的目标而努力；一般人宁愿被领导，不愿负责任，没有抱负，明哲保身。用x理论指导的领导行为是独裁式的，所有的政策都由领导者决定。麦氏认为如果当工人主要停留在追求生活和安全需要时，从“x理论”出发采取的管理措施是有效的，这些基本要求满足后再那样做就不行了，必须从“y理论”出发才能适应新情况。“y理论”假定：人并不厌恶工作，在工作中，体力和精神的消耗象游戏、休息一样地自然；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不但勇于承担责任，而且还追求责任；人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工作中要求自我控制，并不需要外部控制和处罚；在现代化工业生产中，一般人的智力只发挥了一部分。基于上述假定，麦氏认为，如果工人没有搞好工作，就得从管理上寻找阻碍工人发挥积极性的原因。所以他提出企业管理者的任务是创造条件使个人和组织的目标溶合一致；激励职工更加自觉地控制自己和承担责任；不采取严格的管理方法，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等等。用y理论指导的领导行为是民主的，所有政策可公开讨论和制定。

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在李克特的主持下，运用行为科学方法对企业领导行为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就领导方法、激发措施、交流信息、人员相互影响、决策过程、制定目标过程、控制和制定工作指标八个方面列出51个问题，向企业调查，得出四种管理模型：①剥削式独裁；②仁慈式独裁；③咨询式；④职工参加管理。通

过考察，证明民主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模式。它能提高士气，增加产量，加强团结。并使职工得到满足。同一时期，布洛克和莫顿于1964年提出了区分领导行为的管理方格图（如下图示）。他们把管理风格划分为五个类型：1.1管理称“贫乏式”，对职工和生产都不关心；9.1管理称“任务式”，只抓生产任务，不关心人；1.9管理称“俱乐部式”，企业充满轻松友好气氛，生产松垮；9.9管理称“战斗集体式”，关系协调，浑然一体，生产效率高，职工利益与企业目标一致；5.5管理称“中间式”，大多数是“仁慈式独裁型”，完成任务过得去，不突出。“管理方格图”在美国和西方已成为改善领导行为的武器，他们倡导把改进管理规划同管理方格图结合起来运用。促使领导者向9.9式发展。

管理方格图



团体行为论是行为科学引进企业管理研究的第三层次。任何企业不论大小，都是一个由团体组成的组织，企业管理所面对的对象，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而且是团体的行为。团体行为不只是个人行为的简单集合，它往往会引起个人行为的质变。所以，很多行为科学家都很重视团体行为的研究。六十年代后期皮尔尼克提出了团体行为准则与企业利益直接相关的理论和“规范分析法”。使人们注意到团体有它独特的行为准则。即使是不成文的准则，同样有约束成员行为的效力。当团体成员行为背离这些准则时，集体会对其进行纠正，以维护团体准则不受破坏。团体意识的形成，会造成团体压力。使成员的行为受团体倾向的制约。当一个人的认识和行为与团体不一致的时候，他会彷徨，趋向于同团体保持一致。行为科学家同时指出，团体内部以及团体之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对于团体来说，并非完全是坏事，有破坏性的冲突，也有建设性的冲突。以往所以把冲突看成为坏事，是受了那种把和睦、融洽看成为美德的社会意识的影响。事实上，适当的冲突能够发现存在问题，推动竞争，启发创造力，提高决策质量。因此，企业经理应该善于维持建设性冲突，防止破坏性冲突，使冲突保持在必要的水平。

行为科学方法引进企业管理理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当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现代系统管理理论出现了，标志着管理理论又向新的高度发展。但行为科学作为一门方法，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对于那些仍受传统管理束缚的企业解决有效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搞活企业，加速企业管理改革的进行等问题仍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对我们进行管理理论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方法。

宋代广州的外商

关履权

一

唐代外商居留广州做买卖的很多，其中尤以大食商人为最。《萍洲可谈》说：广州“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①朱彧在这里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的风习作为广州所有蕃人的代表；而且官方记载来华的海外蕃国也常以大食为首，可见广州大食商人之多。传说唐末黄巢起义军攻进广州时，杀死大食（即阿拉伯）商人及其他外国人便有十二万余人，这个数字虽然夸大了，不可信，但当时来广州的外商很多，却是事实。

宋代广州海外贸易比唐代更加发达，因此，宋代的外商比唐代更多。“越商海贾，朝盈夕充”。^②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壮族侬智高起兵反宋围攻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③可见广州的外商不少。宋代来广州贸易的外商以东南亚各国最多，太祖“开宝四年，置市舶使于广州，……凡大食、古逻、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④来广州做买卖的大商大贾，主要也是来自东南亚诸国，“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⑤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外商居留广州的日渐增多，宋政府怎样管理？定出了哪些管理条例？外商的贸易活动产生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二

宋政府对广州外商的接待和管理主要是由市舶司负责。北宋初年广州便设置了市舶司，是宋代全国各地的市舶司或市舶务中最早设立的，但何时设置，历来的说法却不一致。清代顾炎武认为：“宋太祖开宝二年置市舶司于广州”。^⑥《宋史》中说是在太祖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⑦即使同是主张开宝四年设广州市舶司的，对设置的月份也有分歧的意见，例如《宋史·潘美传》说：“（开宝四年二月）克广州，擒（刘）铢送京师，露布以闻，即日令美与尹崇珂同知广州兼市舶使”；^⑧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说是“（开宝四年六月）壬申，初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并兼使，通判谢珙兼判官”。^⑨又《宋会要辑稿》也认为：“太祖开宝四年六月，令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充市舶使，以驾部员外郎通判广州谢处珙兼市舶判官”。^⑩开宝四年以前，广州尚在南汉刘氏的统治下，到开宝四年，刘铢被俘，南汉始被宋所灭。上引《宋史·潘美传》说：“擒铢送京师，露布以闻，即日令美与尹崇珂同知广州兼市舶使”以及

《尹崇珂传》中说：“克广州擒刘铢，即日诏与潘美同知广州兼市舶转运等使”。^①潘美克广州及刘铢被俘送至汴京的时间，是在开宝四年的四月二十七日，“（开宝四年夏四月）壬辰（二十七日），潘美遣使部送刘铢及其宗党、官属献于京师”。^②太祖正式受俘则在：“（开宝四年五月乙未朔）御明德门，受刘铢俘，释之”。^③上述材料证明，潘美克广州俘刘铢是在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刘铢被送至汴京时则是在当年四月。克广州后的开宝四年四月壬申七日，宋太祖“以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副都部署尹崇珂同知广州”，^④开宝四年四月，潘美、尹崇珂同知广州，仍未言及兼市舶使事。到了开宝四年的五月初三，“以潭州防御使潘美领山南东道节度使；朗州团练使尹崇珂领保信节度使，同知广州如故”。^⑤这时潘美等仍未兼任广州市舶使。可见潘美等兼市舶使必在五月初三以后。由此推知，广州市舶司的设置及命同知广州的潘美、尹崇珂兼充市舶使的时间，《宋会要辑稿》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认为在广南平定，刘铢被俘送京师以后的开宝四年六月，当属可信。

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管理机关，其职责，《宋史》说是：“提举市舶司，掌蕃货、通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⑥由于“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⑦宋政府特别注意设法“来远人，通远物”，招徕外商贸易。例如“（太宗）雍熙四年五月，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⑧又“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十六日诏广州近蕃舶罕至，今本州与转运司，招诱安存之”。^⑨对于获利大的香药贸易，宋政府尤其重视招徕，如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88年）七月一日诏云：“广南东路提举市舶官，今后遵守祖宗旧制，将中国有用之物，如乳香药物及民间常使香药，并多数博买。内乳香一色，客算尤广，所差官自当体国，招诱博买”。^⑩

随着宋代对外贸易的扩大，广州的蕃商越来越多，有的蕃商长期居住下来，与华人杂处，“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⑪“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⑫当时便有“土生蕃客”^⑬之称，和“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⑭之事。宋政府与唐朝一样在广州划定一个地区给外商居住，称为“蕃坊”，“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⑮蕃坊也有称作“蕃巷”的。^⑯蕃坊中“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⑰蕃长的办事机关称为“蕃长司”。^⑱“蕃长”是在蕃人中挑选，由中国政府任命，授予官衔。蕃长所用的“巾袍履笏如华人”，其职责是：“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⑲协助市舶司招引外商来华贸易。

蕃坊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避免外商与华人杂处，发生矛盾，也为了限制外商多买田宅、兼并土地。宋仁宗景祐二年（1085年）“十月九日，前广南东路转运使郑载言：广州每年多有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今后禁止广州不得卖与物业”，^⑳景祐三年（1086年），宋朝政府还专为此下令：“广州海南番客毋得多市田宅，与华人杂处”。^㉑为了专门培养外商子弟和外国学生，宋政府在广州亦有“蕃学”。宋徽宗“大观政和之间，天下

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南请遣蕃学（涉园张氏抄本云：‘广南请建蕃学’）”，^②有了专门为外国子弟设立的“蕃学”，“将见诸蕃之遣子弟，仰承乐育者，相望于五服之南矣”。^③此外，还有所谓“蕃市”，^④是专门为外商设置的贸易市场。

为了增进海外贸易，宋政府对外商给予各种优待，例如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八月，大食国王托人在广州“买钟，除纳外，少钱千三百余贯”，宋政府认为“宜示优恩，特免追收”，^⑤又神宗熙宁六年（1078年）十二月十六日，大食“来贡乳香等，诏香依广州价回赐钱二千九百贯，别赐银二千两”。^⑥每当外商来往之时，市舶司例当设宴慰劳，谓之“犒设”。“蕃舶初来有下碇税，有阅货宴，所饷犀象香琲，下及仆隶”。^⑦又《宋会要辑稿》记，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二十一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筵？）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旧来或遇发船众多，及进贡之国并至，量增添几数，亦不满二百余贯，费用不多，所悦者众。今准建炎二年七月敕，备（据？）坐前提举两浙市舶吴说札子，每年宴犒，诸州所费不下三千余贯，委实枉费。缘吴说即不曾取会本路设蕃所费数目，例蒙指挥寝罢。窃虑无以招怀远人，有违祖宗故事，欲乞依旧犒设，从之。”^⑧外国船舶通常在每年十月归国，这时候，市舶司必设宴送行，绍兴十四年（1144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璠言：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司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⑨另外《岭外代答》中还说：“岁十月，提举（市舶）司大（犒）设蕃商而遣之。”^⑩结果是：“尝因犒设，蕃人大集府中。”^⑪

宋政府对那些招诱外商来华贸易，增加了政府收入的官吏，授予官职或其他奖励，凡招致蕃货有功的商人，诸市舶纲首，招诱舶舟，抽解至一定数额后，即可补官，官职的高低则依他所招诱的舶舟和抽解货物价值的多寡而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⑫官吏招徕了外商，政府还赐慰劳，表示欢迎。“马亮……以古谏议大夫知广州，……海舶久不至，使招徕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朝廷遣中使赐宴以劳之。”^⑬

为了招徕外商，广州官吏，特地开凿了内河，以便外船停泊。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七月壬辰，“广州言，右太中大夫邵煜卒。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煜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及被疾，吏民蕃贾集僧寺，设会以祷之。其卒也，多陨泣者。”^⑭《宋史》作邵晔。邵煜应是邵晔，字日华。《玉壶清话》也说：“邵晔知广州，凿内濠以舶舟楫不为飓风所害。相次陈世卿代之。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三苦。’”^⑮

外商触犯了法令，政府有时也给予宽容处理。“宋代奖励互市，故侨蕃甚蒙优遇，纵有非法行为，每置不问。”^⑯例如“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

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④有的市舶使还有意枉法纵容外商，如“王涣之……寻知福州，未至，复徙广州。番客杀奴，市舶使据旧比，止送其长杖笞。涣之不可，论如法。”^⑤

外商违反规例，主管官给予处分，有的上司反而维护外商，认为处理不当，如“苏缄……调广州南海主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货。商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缄以送往。商樊氏辄升阶就席，缄诘而杖之。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⑥宋朝政府对于广州的外商并不是毫无约束的，曾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蕃商 奏集，遣内侍赵敦信驰驿抚问犒设之。即诏知州马亮等定蕃商犯罪决罚条，亮等请应大舶主及因进奉曾受朝命者（指已取得宋官衔者——引者注），有罪责保奏裁，自余悉论如律，从之。”^⑦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宋朝还规定：“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⑧徒以下小罪，即“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这是说，徒以下小罪，由广州官府核实，送蕃长处理。徒以上罪，则完全由广州官府决断。蕃长虽是外商，但是由宋官府选定委派的，实际是宋政府的下级官吏，代表宋朝按中国的法律，结合外商的生活习惯，通融处理。这与近代帝国主义者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治外法权，并不一样；不能象有的人所说宋代外商已享有“治外法权”的待遇。《萍洲可谈》有这样一段记载：“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撻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蕃人不衣袷袴，喜坐地，以杖臀为苦，反不畏杖脊。”^⑨对于这些通融做法，有的官员也认为应当取消，要完全按中国的法令行事，例如张显之任广南东路转运使时，便主张“夷人有犯，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惨酷，请一以汉法从事。”^⑩法权显然掌握在宋朝政府手中。

三

外商在广州的贸易活动对宋代的影响很大，主要有：第一，加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宋代外商在广州进口的货物，以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玕、玳瑁、玛瑙等为最大宗。出口物资以金、银、铜钱、铅、锡、匹帛、瓷器等为最大宗。当时中国不少先进的手工业品及制作技术，不断传至海外，亚非各国地区近年来考古发现不少宋代瓷器，例如新加坡发掘了许多中国陶瓷碎片，其中不少确定是宋代的产品。同时，新加坡也发掘出许多宋代初期的钱币，说明当时单马锡（即今新加坡）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和通商贸易关系。非洲的埃及，宋代称为勿斯里国。在埃及开罗古城废墟曾发掘出大量古代中国瓷器，其中以宋代瓷器最多。又南非洲的索马里，宋朝称中里（“中”疑为“申”之误），十九世纪时发掘出不少宋代铜钱。看来当时宋代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对海外诸国都有积极的影响。

中外往来日盛，东南亚一些国家使用了中国文字，如三佛齐（今苏门答腊），除“中国文字用番书。……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则用焉。”^⑧番书，《宋史》卷489《三佛齐传》改作梵书，证以南海出土碑文，三佛齐所用文字，或为梵文，这就是三佛齐本国文字。三佛齐来宋朝上章表办理公事，则用中国文字书写，如神宗元丰年间，“南蕃纲首持三佛齐詹卑国主及管勾国事国主之女唐字书”^⑨来广州。

广州还建有各种宗教寺院或有宗教特色和风格的建筑物，如怀圣寺和光塔，这是伊斯兰教的建筑。怀圣寺和光塔建于唐代，在宋代，广州的阿拉伯商人经常在怀圣寺和光塔进行宗教活动。南宋时，广州一蒲姓外国富商，其住宅建筑“层栖杰观，晃荡繇亘，不能悉举”，这蒲姓外商住宅后面“有窳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壁，为大址，象而增之，外圆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窳，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窳，啁嘶号噪，以祈南风。”^⑩这些建筑物与中国的建筑不同，有他们本国或本民族的特色，建筑风格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⑪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说法。宋代东南地区几个重要对外贸易的口岸中，尤以广州为最繁荣，外商贸易最盛。徽宗“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⑫史载，宋太宗时（977—997年），市舶利入三十万缗，英宗治平时（1064—1067年）六十三万缗，到了南宋初年达到二百万缗，可见当时对外贸易岁入逐年有所增长。南宋时期，统治地区缩小，财政收入减少，市舶收入在政府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大。《宋会要辑稿》载南宋高宗绍兴七年闰十月三日，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⑬南宋初年，宋朝政府财政收入不满一千万缗，^⑭市舶收入达一百五十万缗左右，占了当时宋朝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宋高宗绍兴末年，宋朝总财政收入约四千五百万缗，^⑮市舶收入也还占百分之四点四左右。由此可见，市舶收入是有宋一代的一项重要收入，支持了整个宋王朝的财政。

第三，促进了中外的互通婚姻。外商居留广州时间长久，与中国人互通婚姻乃是自然之事。《宋会要辑稿》记：知广州“连南夫奏至：其一项：市舶司全藉蕃商来往货易。而大商蒲亚里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上今委南夫劝诱亚里归国，往来干运蕃货，故圣谕及之。”^⑯蒲亚里是大食商人，南宋初已在广州，娶了妻留居不归，皇帝竟要委派广州知州连南夫劝他归国，干运蕃货。这是官僚家属与外商通婚。赵宋皇族宗室也有同外商通婚的，《萍洲可谈》说：“元祐间，广州番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院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⑰宋政府这种规定，是为了限制宗室与外商通婚。广州外商众多，他们既能与官僚、宗室子女通婚，与普通百姓通婚姻则更属寻常了。“蛮獠杂居，婚娶互通，”^⑱从唐至宋已经成为常事，政府的限制，收效是不大的。

第四，助长了统治阶级的挥霍和腐化。宋代广州外商进口的货物，很多是贵族官僚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品，以珠玉、象牙、犀角、玳瑁、香药之类高级奢侈品为最主要。这些奢侈品进口的数量越多，越能证明宋代剥削阶级的腐化。例如进口的香药，其中一些可以用来医病或作他用，但大部分是奢侈品。焚香、熏香成为宋代皇室、贵族、官僚和地主的生活享受，他们焚香成癖。“梅学士询在真宗时已为名臣。至庆历中，为翰林侍读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将视事，为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座浓香”；^④又“赵清献公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辄数月香不灭。衣未尝置于笼，为一大焙，方五、六尺，设熏炉其下，常不绝烟。每解衣投其间。”^⑤梅询在真宗时被称为名臣，赵清献公即赵忭，神宗时称作贤吏，所谓名臣、贤吏尚且如此，其他的贵族官僚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奢侈品的大量进口，更加助长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奢靡腐化、挥霍享乐。所谓“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的富贵者，也就是那些“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⑥的土地兼并者。而且，广州的外商经营买卖，获利很大，家资富有，如“蕃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货数百万缗。”^⑦这些外国富商与官僚、地主互相勾结，买贱卖贵，甚至剥削或欺压平民，购置物业，这就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宋朝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广州外商购置物业，也就是防止他们兼并土地。

第五，对人民生活习惯的影响。外商的长居广州，使我国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了不少的变化。例如广州富人买卖奴隶和畜养昆仑奴，就是受了外商的影响。“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髻而黄，……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⑧另外还有一些外国风俗也随着外商传入来了，如斗鸡，“芥肩金距之技，见于传而未之睹也。余还自广西，道番禺，乃得见之，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鸡之产番禺者，特鸷劲善斗，其人饲养，亦甚有法，斗打之际，各有术数，注以黄金，观如堵墙也。……番人之斗鸡，又乃甚焉。”^⑨又北宋末徽宗政和年间，“广东之民，多用白巾，习夷风。”^⑩这些都是受了外国风俗习惯影响的例子。

第六，加速了铜钱的外流。宋代广州外商的贸易，加速了铜钱的外流，当时的国计民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诸艘舶船，旧制惟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为买纳之处，往还搜检，条制甚严，尚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日广南、福建、两浙、山东，咨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命，其极不可言矣。”^⑪到了南宋，铜钱流出海外更多，“南渡三路舶司收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赂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⑫清代顾炎武也说：“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然

金银铜锡钱币亦用是漏泄外境，而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其弊卒不可言。”^①宋代的“钱荒”很早就出现了，原因很多。由于对外贸易，铜钱大量流出海外，也是造成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当然不能说宋代的钱荒是因为外商在广州贸易的结果，但由于中国出产了大量的铜，而与中国贸易往来最密的南洋诸国又最缺铜钱，因此宋代当时是以铜钱当作商品出口的。其次，在对外贸易中，为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大批奢侈品的进口，也促使了铜钱的大量出口。当时便有不少官员谈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运夷，为可惜。”^②王居安也说：“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镗，有损无益，宜遏绝禁止。”^③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说得更具体：“番舶巨艘，形若山狱，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④铜钱大量外流，国内流通的钱币便愈来愈少，货币紧缩，造成“钱荒”，致使物价下跌。张方平在《乐全集》中说：“天下谓之钱荒，……而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夷，内则咨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常，钱不可得，谷帛益贱。”^⑤因钱荒影响农产品价值下跌，直接受害的是广大农民，北宋吕南公在《灌园集》中有诗记当时的情况：“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若闻丰年乐，今识丰年苦。东家米粒白如银，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⑥李觏也说：“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轻则货或滞。”^⑦可见，铜钱外溢的结果，使谷贱伤农，百货滞销，商业凋蔽。

总的来看，外商在广州的贸易活动，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至于消极的影响，如贵族、官僚、地主生活的奢侈腐化的加深，对农民的剥削的加重，土地兼并的加剧和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通货膨胀等，虽然与外商的贸易活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的封建官僚专制主义制度所造成，与外商的正常贸易活动并无必然的联系。

①、②①、②⑤、②⑦、②⑨、④①、④①、④②、④③、④④、

④⑤朱或：《萍洲可谈》卷2。

④⑥王明清：《玉照新志》卷2，引李元叔：《广汴都赋》。

④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戊子”。

④⑧、④⑨《宋史》卷184，《食货志·互市舶法》。

④⑩洪迈：《帅吴堂记》，《盘洲文集》。

④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5，《福建》5。

④⑫、④⑬、④⑭《宋史》卷184，《食货志》。

④⑮《宋史》卷258，《潘美传》，又见《宋史》卷259，《尹崇珂传》。

④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开宝四年六月壬申”。

④⑰《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

④⑱《宋史》卷259，《尹崇珂传》。

④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开宝四年四月壬辰”。

④⑳《宋史》卷2，《太祖本纪》，又参见《潘美传》。

④㉑、④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开宝四年四月壬辰五月丁酉。

④㉓《宋史》卷167，“职官志”。

④㉔、④㉕、④㉖、④㉗、④㉘、④㉙、④㉚、④㉛《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4、2、4、17、8、9、14、24。

④㉜、④㉝、④㉞岳珂：《程史》卷11，《番禺海獠》。

④㉟洪迈：《夷坚丙志》卷14，《广州女》。

④㊱《宋史》卷490，《大食传》，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4，“熙宁五年六月己巳”。

④㊲、④㊳《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21、68。

- 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仁宗景祐三年四月辛亥”。
- ㉑蔡偁:《铁围山丛谈》卷2。
- ㉒《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12。
- 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八月己酉”。
- ㉔、㉕《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1、92。
- ㉖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 ㉗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航海外夷》。
- ㉘《宋史》卷185,《食货志》。
- ㉙《宋史》卷298,《马亮传》。
- 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壬辰”,《宋史》卷426,《邵晔传》所记略同。邵煜即邵晔。《长编》浙江刻本避清圣祖讳改晔为煜。如清圣祖名玄烨,避讳以元煜字代,又乾隆刊本《宋史》晔字作晔,缺笔可证。
- ㉛释文莹:《玉壶清话》卷3。
- ㉜、㉝桑原鹭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第二章。
- ㉞《宋史》卷347,《王涣之传》。
- ㉟《宋史》卷446,《苏斌传》。
- 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甲子”。
- ㊲《宋史》卷303,《张昞之传》。
- ㊳赵汝适:《诸蕃志》上,“三佛齐国”。
- 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0,“元丰五年十月甲子”。
- ㊵、㊶《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
- ㊷王应麟:《玉海》卷186,《祖宗岁赋》。
- ㊸《旧唐书》卷177,《卢钧传》。
- ㊹欧阳修:《归田录》卷2。
- 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5。
- ㊻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51,《备对札子》三。
- ㊼苏辙:《龙川略志》卷5,《辨人告户绝事》。
- ㊽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斗鸡》。
- 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熙宁九年秋张方平《论钱禁》。”
- 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入贡互市》。
- ①《宋史》卷405,《王居安传》。
- ②《宋史》卷180,《食货志》。
- ③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
- ④吕南公:《灌园集》卷4,《山中即事寄上知县宣德》。
- ⑤李觏:《李觏集》卷16,《富国策》第八。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 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梁碧莹

1784年2月22日，一艘载重360吨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启航，渡过了大西洋，绕过好望角，通过印度洋，向着中国广州破浪前进。它于8月23日抵达澳门，8月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成功地完成了首次从纽约到广州的航行。这次历史性的航行，开拓了中美之间的联系。两国开始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和文化关系。

“中国皇后”号商船的首航，以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为背景。众所周知，1775年——1783年北美英属十三个殖民地人民为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一场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1783年9月，英美签订《巴黎和约》，北美英属殖民地终于脱离英国的桎梏正式独立。五个月以后，“中国皇后”号便首航中国。

“中国皇后”号远航中国广州决非偶然之举。

刚赢得独立的美国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上的重重困难。由于战争的破坏，国库空虚、财政紧缺、通货膨胀和工商业凋敝。到1783年为止，美国还举借外债近800万美元，内债3000余万美元。其时，国外形势也不利于美国。首先，美国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却遭到英国的严重威胁。英国取消美国过去在英帝国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不再向美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免税或减税的廉价商品，还颁布了凡美国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付以高额关税的法令。与此同时，英国又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市场，而西印度群岛当时正是美人的主要海外贸易地，英国的禁令对美国经济生活无疑是一大打击。^①其次，西班牙在北美也有一定数量的殖民地，西、美两国在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上存在矛盾。1784年，西班牙封锁了密西西比河口，严禁美国船只通行，造成对美国的威胁。^②再次，曾与美国并肩作战过的法国，曾答应在独立战争后开放海港，允许美国船只自由出入。可是战后，法国政府只勉强地开放了西印度群岛的几个海港，允许载货量60吨以下的美国船只出入。

在重重困难下，争得政治独立的美国开始了经济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他们寻求新的贸易途径。早在1783年11月，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罗伯特·摩里斯(Robert Morris)就写信给美国邦联政府外交部长约翰·杰伊(John Jay)说：“我要派一些船到中国去，以鼓励其他人大胆寻求贸易的发展”。^③

美国人把贸易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除了旨在摆脱当时的经济困难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是茶叶之乡，早在古代，中国茶就饮誉四海。荷兰人首先把中国茶叶输入北美。最早输美的茶叶是红茶和武夷茶。至18世纪初，波士顿的药店始有出售绿茶的广告，这是绿茶在美洲出售的最早纪录。随着英属十三个殖民地的建立，茶叶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美洲。华茶的输入，使北美人民的生活起了变化，茶叶逐渐成为他们的普遍饮料，因而对茶叶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据统计，从1760年到176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茶叶消费量平均每年为120万磅。随着茶叶消费量的提高，质优而精致的中国瓷器，尤其是各种雅致的茶具也大批运进北美。过去，茶和其他中国传统商品主要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转运而来。独立战争胜利后，北美商人要求直接经营这方面的贸易，这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北美造船业比较发达，拥有一批具有航海知识的海上人员。这些因素使美国向中国发展贸易成为可能。美国有着犬牙交错的海岸与河流，加上丛林密布，盛产造船所需要的橡木和松林。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北美造船业的发展。波士顿成了当时造船业的中心。177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建造的船只每年介于300与400艘之间，1774年，船舶载货总吨数已达21万吨。英国船约有三分之一是在北美殖民地建造的。^④独立战争中，美国政府对对抗英国海军封锁，准许美人持“私掠许可证”在海上劫掠敌船，许多海上冒险家因此致富。独立战争后，沿海的造船业更为发达。海上贸易的发展吸引着许多美国人对远航的兴趣，不少人还未到成年就随船出洋。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航海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富有冒险精神的航海人员和商人。

有一位人物对美中直接贸易起过特殊的作用，这就是雷雅德(John Ledyard)。中美两国以汪洋相隔，“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以前，土生的美国人到过中国的屈指可数。史载仅有两人，即雷雅德和戈尔(John Gore)。史家对戈尔没作详细的介绍，而特为雷雅德作了一本传记。雷雅德是美国康涅狄格州人，1772年曾在大得茅斯学院攻读神学，后来退学参加英国海军。1776年7月自伦敦参加英国探险家库克(Capt Cook)的最后一次赴太平洋的远航(戈尔和他一起参加这次航行)。1782年雷雅德返美并到各地游说。他告诉商人们，他如何亲眼看见在美“西北海岸”以六便士买的一张毛皮在广州居然可以卖一百美元；又如何看见中国茶叶、生丝以便宜价格出口，给贸易商人带来巨大好处。他竭力鼓吹美国人从事“西北海岸”与广州间的贸易，以海獭皮去换取中国的茶与丝。他的游说和他发表的《库克船长最后一次太平洋航行日志》(A Journal of Captain Cook's Last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在财欲极盛的商人中有很大吸引力。于是，1784年，独立战争时期的财政资助者、费城富商摩里斯便派出了“中国皇后”号驶向中国的目

的地。

二

“中国皇后”号是由摩里斯和以丹涅尔·巴驾公司 (Daniel Parker & Co.) 为首的一批纽约商人共同装备派遣的。这是由一条战时私掠船改装而成的木制帆船。整个投资, 包括船的成本费、装备和出航开支, 总共12万美元。全船一行43人。船长约翰·格林 (John Green), 海军出身, 独立战争时期曾任海军上尉。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但富有航海经验。货物管理员是29岁的山茂召 (Samuel Shaw, 又称山姆·肖)。他受过教育, 熟悉会计业务, 精明干练。独立战争期间, 由于军功卓著, 还受过华盛顿的嘉奖。随船出发的还有副船长、医生、水手、木匠和两名小船员, 其中一名是格林船长的孩子。

船长选择华盛顿生日作为启航的日子。1784年2月22日, “中国皇后”号在欢呼和礼炮声中从纽约启航了。山茂召是持着国会颁发的“航海护照”出航的。船离开纽约后, 途经佛得角群岛, 再往南航行, 绕过好望角, 然后沿东北方向跨过印度洋, 离纽约后五个月, 他们望见爪哇岛。7月18日停泊在巽他海峡。在那里碰上了两艘向广州驶去的法国船。法国人热情欢迎他们, 并邀请一起同往广州。8月28日, “中国皇后”号终于到达了黄埔港, 胜利地完成了纽约——广州的航行, 历程188天。该船自豪地鸣炮18响 (代表当时美国十三州之数) 向其它船只致敬, 停泊在那里的其它国家的船只也鸣炮回礼。

美国商人在广州受到中国商人的友好接待。山茂召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 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间的区别, 视我们为新人 (new people)。当我们将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 并说明我们的疆域扩张和人口增长的情况时, 他们对我国拥有如此大的、可供他们帝国销售的市场, 感到十分高兴。”^⑥ “中国皇后”号所载的货物计有: 棉花361担, (一担等于1381/8磅, 下同), 铅476担, 胡椒26担, 羽纱1, 270匹, 皮货2, 600件, 人参473担。^⑦ 这些船货通过中国行商顺利地全部销售出去。同时, 又通过行商办齐了回程的货物, 计有: 红茶2, 460担, 绿茶562担, 棉布864匹, 磁器962担, 丝织品490匹, 肉桂21担。^⑧ 船上人员每人也购置了一定数量的中国物品, 拿回馈赠或转卖。山茂召在广州还特地为美国军官组织辛辛那提协会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个爱国组织) 订购了一批由该会自己设计的图案, 并印有辛辛那提协会标记的瓷器。^⑨ “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获纯利30, 727美元, 约为投资额的25%。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期间, 受到了那些盛赞美国革命战争的欧洲国家商人的关心。各国商人前来祝贺, 互相进行友好的访问。美商与法商的关系尤为密切。法国商人不仅从人力、物力帮助美国船安全碇泊在黄埔港, 而且还腾出部分地方作为美国人的暂时住处。山茂召的日记里处处流露出对法国贸易商人的感激之情。丹麦、荷兰等国的商人

美国商人也非常热情。相比之下，英国人就冷漠多了，这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美国不应脱离英国而独立；二是出于商业的利益，他们不愿意在广州又多一个商业的竞争者。

美国商人在广州进行了三个月的商务活动后，于1784年12月28日从黄埔港启程回国。离港后与荷兰船共同沿着中国海前进。1785年5月11日回到了纽约。往返历时十五个月。

三

一艘小小的木帆船打通了太平洋两岸中美两国的通途，其意义和影响颇为深远。

此次航行成功，轰动了美国社会，纽约报纸为此发表了长篇报道，其它商业城市的报纸也加以转载。在纽约街头上贴着推销中国货的大型广告：“整箱装、半箱装和四分之一箱装的上等新红茶；各种瓷器；各种不同质地、黑色和其它颜色、适合做夏季男衬衣的纺织品，波斯绸和波纹绸；南京紫花布；绣金像和有珠扣的精美缎鞋；最优质羊羔皮；象牙雕刻和漆器；茶叶罐；各种漆茶盘、托盘和瓶架；丝绸手帕；束发缎带；桂皮和肉桂芽；黑胡椒；二百箱上等糖；等等。”货到之后，美国人争相购买。^⑩乔治·华盛顿于1786年也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一批中国瓷器。至今美国乃特伦顿市新泽西州博物馆还珍藏着中国景德镇制造的瓷盘，上面绘有“中国皇后”号。

此次航行成功，使美国大西洋沿岸的商人为之振奋，也使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们为之陶醉。在优厚利润的吸引下，几十吨、一百吨、三百吨的木制帆船，举帆远航，在通往广州的航线上络绎于途，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据统计，在1786—1888年的48年中，美国来华的船只就有1,104艘，几乎达到英国来华总船数的44%，而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4倍。以此为开端，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对华贸易已赶上荷兰、丹麦、法国等国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对华贸易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英国。

此次航行成功，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中国皇后”号在华期间，两国商人频繁接触，友好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山茂召回国后，给约翰·杰伊一份详细的报告，并上交了广州官吏送给他的作为友谊纪念的两匹绸缎。报告中谈到：“我们同地球最东部成功地通航了，对于每一个热爱他的国家的人和那些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密切相关的人们来说，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⑪杰伊把这份报告转交给国会，国会对“中国皇后”号首航的成功表示满意，并给予全体船员以“崇高的荣誉”。根据杰伊的建议，国会委任山茂召为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主要负责商务工作。

由于美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成功，早期中美贸易发展很快。广州成了美国沿海商人发迹的重要场所。在美国第一代富豪中，因对华贸易致富而显赫一时的大有人在。如罗伯特·摩里斯、斯拉芬·吉拉德、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伊莱亚斯·德比、约翰·

顾盛等等。摩里斯经营中国贸易，后来成为“金融巨子”。毛皮富商阿斯特的发迹也是从经营中国贸易开始的。1800年，他在以毛皮、人参换取中国丝茶的贸易中，一次盈利55,000美元。^⑫到1847年，阿斯特的财富打破了2,000万美元的记录。^⑬

早期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影响，还在于美国商人把对华贸易所赢得的资金，转而从事农业、工业以及其它生产事业上。如阿斯特后来把大批资金转而购买地产，投资银行。他的后裔大都是银行家、房地产商或旅馆的大老板，现今纽约最出名的华道夫——阿斯托里亚大饭店也是阿斯特家族的产业。斯蒂芬·吉拉德也把他对华贸易中积累的资财用来投资国内的银行、铁路和土地，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实力雄厚的银行家、企业家。

① S.E.Moriso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 Boston, 1941, P31—32.

② S.F.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38, P34.

③ H.P.Johnston, 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 Vol. III, P97.

④ 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28。

⑤、⑥、⑨、⑩ J.Quincy,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1847, Boston P337--338, 188, 198, 340—341.

⑦、⑧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Vol. II, P95.

⑪ 奥斯卡·阿姆斯特朗,《二百年贸易的开端》,《交流》1983年第二期。

⑫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下册,页98。

⑬ 本·巴鲁克·塞利格曼,《美国企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110。

我省逻辑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市召开

省逻辑研究会于今年一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在中山市党校举行一九八四年年会。来自全省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北京、黑龙江、广西的同行共五十人参加了会议。

讨论会围绕如何推进逻辑的理论研究和逻辑教学的改革，以适应“四化”的要求，更好地为“四化”服务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有的同志认为，逻辑教学改革的核心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赋予逻辑教学新的动力；改革的起点是缩短学时，精简教材；改革的路子是根据逻辑科学的特点，把握教学的特有规律。至于有效的教学方法，主要应放在讲课时对知识的实质和规律的阐述上，少而精地讲清知识的实质和规律，并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生动形象，通过恰当的例子，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对较难懂的理论，要讲深、讲透，力求通俗化，以增强学生的求知和提高教学效果。（亦 黄）

铁钱与北宋商税统计

郭正忠

宋代全国各地商税统计的帐籍，是世界商业史和城镇经济史上罕见的珍贵资料。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就宋代商税统计——特别是《宋会要》、《文献通考》有关十一世纪许多地区的商税统计，展开了认真的研究。日本加藤繁先生和我国杨德泉、左健先生的专论，尤其引人注目。

加藤繁先生三十年代发表的《宋代商税考》一文，①讨论了两宋的商税制度，并以《宋会要》、《文献通考》为据，统计了北宋两个时期各路、州商税的岁收数额。可惜，他的统计时有疏误，以铁钱计额的川峡四路商税，又谨慎地排除于总计之外。

杨德泉、左健先生六十年代的专论《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一文，②主要针对《文献通考》对北宋一般城市和四川商税统计都失于偏高的错误，并在重新统计、折计的基础上，划分了商业都市的等级，显示了县镇小城商税发展的面貌。其学术价值，无疑不可低估。但是，他们关于四川商税的折计又失于偏低（四川商业都市的地位因而受到影响）——主要是依据了史籍中现成的、然而又是错误的铜铁钱比价，而这一比价，迄今正为一般学术论著所普遍采用。

这里，试对北宋中期四川铜铁钱比价、以及《宋会要》商税帐目问题，进行讨论、综计和解释，以就教于专家和学者。

一、北宋商税额帐中的怪异现象

《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中保留的北宋商税大帐，包括了四京、二十三路三百一十三个府、州、军、监一千八、九百个务场的两期商税岁额。其第二期帐，为熙宁十年（1077年）的统计。第一期“旧”帐，本文考订为仁宗后期的统计。这两期帐籍，虽详载各州、县、镇务场的商税额，却缺乏各州、军和路一级商税总额

的综计。加藤繁先生当年撰《宋代商税考》，开始了这种综计工作。

上述《宋会要》商税额帐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川峡四路的商税，一般高于其他地区的商税。神宗以前的“旧额”商税，尤其如此。

熙宁前川峡四路每个税务一年平均征收的商税达24000贯以上，其余各路，却仅3100余贯。前者较后者高出6.7倍。其成都府路商税总额，则超过河东路9.8倍，超过广东路2.9倍；即令与淮西、两浙路相比，也超过3.9倍、4.1倍。成都、兴元二府商税，都超过东京路商税院的400,000贯岁额。这显然是一种假象。

从《宋会要》商税帐目的统计中，还可以发现另一怪异现象，那就是熙宁十年与以前旧额商税相比，川峡地区呈大幅度下降趋势。而其他各路商税——除淮西、河北、秦凤、京西、京东两路稍见减少外，四京十三路均呈增长之势。川峡四路商税旧额总数，竟比熙宁十年亏减260%，梓州路亏减370%，成都府路亏减239%。

对于这两种怪异现象，马端临曾有一番解释：

“按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虽夔、戎间小垒，其数亦倍蓰于内地之壮郡。然《会要》言，四蜀所纳皆铁钱，十才及铜钱之一，则数目虽多，而所取亦未为甚重，而熙宁十年以后再定之额，他郡皆增于前，而四蜀独减于旧，岂亦以元额偏重之故欤。”（《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

马端临的意见，归纳起来，无非以下三点：一是宋代征收的商税中，“四蜀所纳皆铁钱”，与其他地区的铜钱不同。二是铜铁钱之间的比价，一般或始终为1:10。三是四蜀熙宁十年商税之所以减少，可能是官府有意纠正“元额偏重”之故。

关于马端临的这番解释，中外学者间历来绝无异词。加藤繁先生亦称赞“这个说明是很妥当

的”。然而，事实上，除了“四蜀所纳皆铁钱”这一点有《会要》为据之外，马端临的另外两点说法，都不可信。

二、北宋四川铜铁钱的比价

北宋四川的币制，是以铁钱为基础的综合货币制度。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以后，当地官府向居民征敛各种租赋，均收铁钱。而铜钱与铁钱兑换的比价，从来就不是一个常数，也不可能是一个常数。这种比价，不但随铁钱型制的改变而变，并且，也因不同时期和地区物价的变动而异。

大体来说，北宋中期以前的川峡铁钱币值，经历了一段近似“W”字形的波折。宋太祖时期，铁钱币值尚高——大约两个半或更少的铁钱，便可换一文铜钱。宋太宗时期，铁钱一度贬值，——铜铁钱比价先降为1:4，又降为1:10，或者更低；但不久又回升为1:5以上。真宗时期，连续铸大铁钱，小铁钱币值，只当1/10铜钱。仁宗至神宗时期，大铁钱贬值，小铁钱币值重复回升起来。

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陕西、河东路铜铁钱兑换比率为1:3。大铁钱与小铁钱的折兑率，也由过去的1:10降为1:3，甚至1:2。该两路——特别是陕西路铁钱，不断流入川界。这时川峡地区——至少川北铜铁钱的兑换比率，可能接近1:3。

神宗时期，由于蜀中铸钱监连年减产和停产，铁钱减少，物价下跌。铜铁钱比价，熙宁间为1:2，元丰初升为1:1.5或2:3。

熙宁八年（1075年），成都知府蔡延庆说：“川峡计赃，以铁钱二当铜钱一”。③元丰二年（1079年）底，成都府路和利州路铃辖司说：“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救估赃，两铁钱当铜钱之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盗贼浸多。法寺乞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法寺的请求，得到神宗批准。④

川峡绢价，多以铁钱计。而罪犯惩罚等第，按国家刑律规定一般以绢的铜钱“时价”计算，川峡不得例外。川峡每匹绢价从2600文降至1300文，表明市场上铁钱的币值，升高了一倍。熙宁末吕陶也指出，当时“川中见钱绝少，物价减半”。铜铁钱比价从1:3升为1:1.5，正是铁钱币值升

高一倍的反映。

《宋史·食货志》称：“熙宁间铜铁钱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这主要指陕西路的情况。但陕西邻近川界，其“铁钱行于兴元府等界”，或“流入川界”乃是常事。⑤可见元丰三年（1080年）以前，利州路兴元府等处铜铁钱的比价，已经升为1:1.5。我们说熙宁间整个四蜀铜铁钱比价为1:2，也只是大略而言。对某些川北地区来说，这种说法或许还嫌偏低了些。

马端临编《文献通考·钱币考》时，曾有一次提到宋真宗年间四川铜铁钱比价：“小铁钱十当铜钱之一”。⑥那时，马端临并没有错。可是，当他编《征榷考》载录熙宁十年前全国商税岁额之后，以“按”语形式解释——“《会要》言，四蜀所纳皆铁钱，十才及铜钱之一”时，错误便发生了。

马端临所征引的《宋会要·商税》帐籍，只标出如下一句：“凡成都府、利、夔、梓四路，并铁钱”。此外，绝无“十才及铜钱之一”的说明。⑦马端临的失误，就在于他把宋初一时的铜铁钱比价，夸张成为宋代各个时期的铜铁钱比价，并与“《会要》言”三字联系在一起，从而制造了史籍中惊人的混乱。

且看马端临这一失误，在宋代金融史研究中产生了何等深广的影响：

清代学者毕沅等人编《续资治通鉴》，叙至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钱法时称：“自（宋）太祖以来，闽、蜀、陕西多用铁钱，每十文当铜钱一文”。⑧束世澄先生1956年的一篇专论，认为熙宁时“用铁钱之处，十才抵一”铜钱。⑨前引杨、左1968年文，统计川峡熙宁十年前旧额与熙宁十年商税，一律以“铁钱的币值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的比率，即用“比原数缩小十分之一”的办法折计。（台湾）宋晞先生统计熙宁十年商税，亦曾主张将“四川铁钱以十分之一计入。”⑩吴慧先生近年所作同类统计，也“以铁钱十文折铜钱一文计算。”⑪《中国史稿》第五册，亦称川峡四路“铜铁钱的比值，通常是十比一。”⑫等等。所有这些讹误，大抵均蹈袭马氏之失而来。

三、熙宁十年商税统计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外学者关于熙宁十年商税的统计，迄今仍十分混乱。面对同一份《宋会要》商税帐籍，有些人以1:10折计四川铁钱，有些人索性将铜、铁钱额直接相加——日本学者梅

原郁先生就是如此。⑬熙宁间川峡铜铁钱比价，十年川峡商税，并将其与全国各路商税放在一起，既然是1:2左右，（川北或许略高于1:2），那么，现在就按这一比率，折计《宋会要》所载熙宁

熙宁十年川峡四路商税折计表

路州名		熙宁十年 税务数	熙宁十年商税岁额（贯·文）		
			折计铜钱额	铁钱岁额	加藤统计额
成都府路	成都府	10	85,817.779	171,635.559	171,631
	眉州	2	19,417.809	38,835.618	38,834
	蜀州	10	37,311.789	74,623.011	74,682(?)
	彭州	11	48,162.950	96,325.900	86,321(?)
	绵州	9	34,738.748	69,477.495	69,473
	汉州	4	39,308.702	78,617.403	78,615
	嘉州	3	19,942.981	39,885.961	39,884
	邛州	9	32,201.548	64,403.096	64,398
	黎州	1	1,575.098	3,150.196	3,150
	雅州	6	18,013.949	36,027.897	36,025
	茂州	1	73.885	147.770	147
	简州	3	16,607.748	33,215.496	33,213
	威州			(不立额)	
	陵井监	2	9,734.141	19,468.282	19,467
	永康军	0	0	0	
15州军监合计		71	362,906.842	725,813.684	715,840
梓州路	梓州	10	32,138.850	64,277.700	64,274
	遂州	2	25,073.698	50,147.396	10,147(?)
	果州	1	16,239.394	32,478.789	32,478
	资州	1	10,694.882	21,389.764	21,389
	普州	3	9,178.446	18,356.891	18,356
	昌州	3	5,872.760	11,745.519	11,736(?)
	戎州	3	7,105.060	14,210.120	14,210
	泸州	3	10,815.920	21,631.840	21,631
	合州	1	18,798.700	37,597.400	37,597
	荣州	4	4,385.700	8,771.400	8,769
	渠州	1	7,781.516	15,563.033	15,563
	怀安军	3	12,068.979	24,137.958	24,137
	广安军	3	9,129.140	18,258.279	18,256
	富顺监	1	4,894.270	9,788.541	9,788
14州军监合计		39	174,177.315	348,354.630	308,827

利 州 路	兴元府	5	48,721.095	87,442.189	87,440
	利州	4	24,470.079	48,940.159	48,938
	洋州	4	18,412.321	26,824.642	26,822
	阆州	7	13,116.184	26,232.268	26,229
	剑州	7	26,523.115	53,046.230	53,043
	巴州	6	7,488.372	14,976.745	14,973
	文州	4	7,554.784	15,109.567	15,107
	兴州	2	17,736.906	35,473.812	35,473
	蓬州	4	3,405.959	6,811.919	6,809
	沔州	2	9,967.173	19,934.347	19,934
	三泉县	3	14,300.234	28,600.468	28,600
	集州	0	0	0	
	壁州	0	0	0	
13府州合计		48	181,696.173	363,392.346	363,375(?)
夔 州 路	夔州	2	17,721.769	35,443.537	35,442
	黔州	5	6,462.179	12,924.358	12,922
	达州	5	10,694.216	21,388.432	21,385
	施州	7	3,147.551	6,295.102	6,292
	忠州	5	9,493.144	18,986.288	18,982
	万州	2	8,537.800	17,075.960	17,075
	开州	2	3,684.782	7,369.564	7,368
	涪州	5	17,443.718	34,887.435	34,885
	渝州	3	19,581.345	39,162.690	39,161
	云安军	2	9,268.609	18,537.219	18,537
	梁山军	1	1,258.898	2,517.797	2,517
	南平军	3	1,724.460	3,448.920	3,447
	大宁监	1	6,469.921	12,939.843	12,939
13州军监合计		43	115,488.072	230,977.145	240,952(?)

熙宁十年商税统计表

路分	府州	熙宁十年商税折计(贯·文)			附：各家统计熙宁十年商税数(贯)			
		军监数	务场数	折计铜钱额	铁钱岁额	加藤统计岁额	梅原都	宋晞
成都府路	15	71	362,906.842	725,813.684	715,840(?)			
梓州路	14	39	174,177.315	348,354.630	308,327(?)			
利州路	13	48	181,696.173	363,392.346	363,375(?)			
夔州路	13	43	115,488.072	230,977.145	240,952(?)			
川峡四路合计	55	201	834,268.902	1,668,537.805	(1,623,494)			
川外四京十九路	258	1792	6,918,159		6,418,153		6,918,159	682万
全国四京二十三路合计	313	1993	7,752,427			856万	(7,081,008) 8,746,652	698万 (844万)

表中所列熙宁十年川峡商税总额，以834,268贯902文为准，与其余各路商税合计，当时全国商税总额，约为775万余贯。至于北宋熙宁十年全国商税的总额，加藤繁未计。束世澄与梅原郁所计，为铜铁钱混合相加，前者作“近一千万贯”——992万贯（实为熙宁前铜铁钱混合旧额），后者作855万贯。加藤繁先生统计川峡商税，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因略去贯以下尾数，计数偏低；二是计算中时有疏误。后者以(?)标出。至于前人有关熙宁十年商税总额的统计数字，或以1:10折计蜀额，或以铜铁钱岁额相加，均欠妥当。

《宋会要》商税帐籍中各州、县城和一些镇市的商税岁额，是研究宋代城镇经济的重要依据。这类研究中歧议纷纭的各派意见，往往以商税统计上的差异为基础。马端临划分城市商税等级，过分夸大了四蜀城市商税岁额。批评马端临的学者重新划分城市等级，又将四川城市商税估计过低。本文既已按照熙宁间铜铁钱1:2的比价折计川峡商税，这样商税岁额较高的城镇，三万贯以上的有成都府城，铁钱岁额67,508贯59文，折铜钱33,754贯29文；一万至三万贯的有24城：梓州城、兴元府城、绵州城、遂州城、利州城、眉州城、合州城、邛州城、兴州城、嘉州城、果州城、渝州城、彭州城、简州城、三泉县城、涪州城、彭州导江县城、阆州城、成都府广都县城、洋州城、资州城、怀安军城、夔州城、泸州城；五千至一万贯的有29处：达州州城、雅州名山茶场、剑州州城、梓潼县城、蜀州州城、普州州城、云安军城、广安军城、万州州城、成都府新都县城、陵井盐城、渠州州城、成都府郫县城、新繁县城、双流县城、利州西县城、澧州州城、夔州巫山县城、戎州州城、雅州州城、大宁监城、汉州德阳县城、蜀州青城、新津县城、永康县城、彭州永昌、昌州州城、彭州濠阳镇、黔州州城。如果将这些商税较高的城市估计在内，来补充杨德泉、左健先生的论文，那么，北宋熙宁间商税岁额三至五万贯的“三等都市”，便不止20处，而是12处；商税岁额一至三万贯的“四等都市”，也不止76处，而是100处；商税岁额五千至一万贯的城镇，则应由178处，改为200处。

四、关于“旧”额商 税的尝试性考析

《宋会要》所载熙宁十年以前“旧”额商税帐

目，有几点尚待研究和整理：一是该帐究系何时之统计；二是该帐中川峡岁额应怎样折计为铜钱；三是该帐中川峡岁额大大高于熙宁十年之数，应如何解释。下面试分别论述。

1. 《宋会要》“旧”额商税帐的时间

《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所载商税“旧”帐，与熙宁十年帐并出而未标明具体时间。历来学者引用此帐，只笼统而含糊地称之为“熙宁十年前额”，或“旧统计”额。今考此帐，既不属于神宗熙宁头九年（1068—1076年），亦不属于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期，它大约是仁宗后期至和末、嘉祐初（1056—1059年）的帐。其根据有四：

甲、德州德平县，熙宁六年时被降为镇；博州明灵砦，熙宁二年时被割隶北京清平县。^⑭而“旧”帐中的德平、明灵，均为更改前建置与隶属。^⑮——可知该帐乃熙宁二、六年前事。

乙、夔州路黔州信宁县，嘉祐七年降为镇；^⑯广西路桂州恭化县，嘉祐六年降为镇。^⑰此二处，在“旧”帐中均为县。^⑱——可知该帐乃嘉祐六、七年前事。

丙、西京颍阳县，庆历三年降为镇，四年复为县，熙宁二年又降为镇；北京清平，至和三年由镇复升为县。^⑲而“旧”帐中，此二处均为县。——可知该帐乃庆历四年、至和三年后事，或至和三年事。

丁、《宋会要》另一处，载有各路、州“在城”及诸县、镇“盐额”大帐。其帐文格式，与旧额商税帐同。盐帐结尾处，曾有数语说明：“以上，《国朝会要》。治平以前诸路盐额，已载前《会要》”。^⑳很有可能，此商税旧额大帐，与“盐额”大帐为同期——“治平以前诸路”之统计，大约是仁宗嘉祐头几年（1056—1059年）的统计。

2. 嘉祐川峡“旧”额商税的综计

《宋会要》商税旧帐的统计时间，本文虽大致考订为嘉祐前期，但嘉祐间川峡铜铁钱的比价，史籍中却罕有记载。关于这笔旧帐的折计，一时尚难以解决。本文前面，曾根据与川峡毗邻、并不断流入川界的陕西铜铁钱比价，另参考其他情况，估计川峡嘉祐间铜铁钱比价为1:3左右。这里，姑依此率折计，将嘉祐川峡四路商税总额臚列如次，并与其余各路商税综计：

嘉祐年间商税统计表

路 分	府州军 监数	嘉祐商税岁额折计(贯)			〔附录〕 加藤统计岁额(贯)
		务场数	铁钱岁额	折铜钱岁额	
成都府路	15	97	2,463,468	821,156	2,463,468
梓州路	14	64	1,637,900	545,967	1,637,900
利州路	13	48	1,240,928	413,642	1,240,928
夔州路	13	37	658,428	219,476	668,428(?)
四路合计	55	246	6,000,724	2,000,241	(5,995,754)
川外四京十九路	258	1591		5,083,680	5,083,680
全国四京二十三路合计	313	1837		7,083,921	

顺便指出，仁宗时人龚鼎臣，曾引当时三司商税档案说：“自嘉祐三年后来，只收得七百万贯”。^④上表统计嘉祐旧帐商税总额，恰与此数相合。

3. 熙宁十年川峡商税比嘉祐锐减的现象与实质

从《宋会要》商税旧帐直接统计的嘉祐川峡商税总额为600万余贯。同类直接统计的熙宁川峡商税总额为166万余贯（宋晞先生似以加藤繁误计之数合计，为162万余贯）。从数字现象上看，后者比前者竟减少两倍半以上。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至少不同时期铜铁钱的比价差异，是原因之一。如果将不同比价估计在内，嘉祐间川峡商税约200万贯（铜钱），熙宁末川峡商税，约为80余万贯（铜钱），后者比前者亏减1.39倍。

北宋全国商税岁额收入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与时俱增的”。^⑤这种商税岁收，大致以仁宗庆历时期最高，仁宗后期显著下降，英宗时期略有回升，神宗时期又略为下降。而神宗时商税总额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四川商税锐减，抵销了东南诸路商税的增长所至。

熙宁间四蜀商税岁额，为什么会出现成倍的亏减呢？前引马端临认为，神宗可能有意蠲减川峡原来的重额。这一判断，不仅缺乏史料依据，而且不符合神宗时期各地征税的总趋势与总精神。熙丰之间的各类征敛，“诸路大率务于增额”。如“江淮增煮海之息，闽蜀倍摘山之赢，青徐竭冶铸之利，以及其他希风旨效，计数无名之取、额外之求，盖不可胜数”；焉肯将百余万贯商税巨利

轻易抛弃！

笔者分析，熙宁间川峡商税的大幅度亏减，可能与当时茶法的变化有关。从茶货流通中征收的住税和过税，是宋代商税的主要源泉之一。所谓“邦国之本，财赋攸先，山泽之饶，茶茱居最”，不为虚妄。治平间商税比皇祐中增额60余万贯，其中“茶税钱居四十九万八千六百”——占83%；其余增税，亦多源于与茶货有关的贸易。可以说，正是“嘉祐以弛茶禁、所历州县收算钱”的政策，^⑥带来了英宗时期商税岁收的上升。

四川茶法的特点，是宋初以来一直通商；而神宗熙宁七年四月以后，却由通商改为榷禁——官府直接向园户征购茶产出售，“重法拘制”，“不许民间私衷买卖”。^⑦这一政策的遽变，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当地的商税收入。

吕陶说：蜀茶“未禁以前，陕西客旅将解盐并药物等入川买茶。所过州县，俱有一重税钱。及至将茶出川，沿路又纳过税。以此，税课大段增羨。自茶法榷行以后，商旅更不兴贩，所收税钱绝少。”以兴元府为例，熙宁七年未榷茶前，住税岁收47,000贯；榷茶之后，“次年所收才及一二。”全川“失陷商税，亦数十万（贯）”。

蜀茶在川峡及其邻近地区——如秦凤路等地商业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榷茶的影响，还不仅限于蜀茶贸易本身；与贩卖蜀茶相联系的盐、锦帛、纱罗、药材、瓷器、牲畜等各种贸易，也都会直接、间接受到打击。秦凤路的商税岁收，熙宁十年亦低于嘉祐时期——其原因，也可以由此得到某些解释。

不过，禁榷蜀茶对正常商业的干扰，仍以川峡地区最为严重。惟其如此，苏轼兄弟及一大批名士，才冒新法之大不韪，不惮其烦地连章弹劾榷茶政策。在他们所共同举劾的榷茶之害中，“失陷商税”乃是主要的一条。

- ①加藤繁：《宋代商税考》，最初发表于昭和九年（1934年）十月《史林》第19卷第4期，后收入他的论文集——《中国经济史考证》下卷。本文所引，为该书吴杰译本第二卷。
- ②杨德泉、左健：《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载《扬州师院学报》1963年第17期。
- ③、④、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1、301、89。
- ⑤、⑭、⑳《宋史》卷180、86、186。
- ⑥《文献通考》卷9。

- ⑦、⑱《宋会要·食货》16之15、9。
- ⑨《论北宋资本主义关系底产生》，载《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第3期。
- ⑩、㉑宋晞：《北宋商税在国计中的地位与监税官》，《宋史研究集》第5辑，1970年台北版第230—231页。
- ⑪吴慧：《从商税看北宋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 ⑫《中国史稿》第五册，1983年版第394页。
- ⑬梅原郁：《宋代商税制度补说》，《东洋史研究》（1960年）第18卷第4号，第516页。
- ⑮《宋会要·食货》15之10、11。
- ⑯、⑰、⑲《宋会要·方域》12之16、17、11至18。
- ⑳《宋会要·食货》23之8。
- ㉑《东原录》。
- ㉒《净德集》卷3。

· 读者 · 编者 ·

不要一稿多投

《学术研究》编辑部：

贵刊1984年第6期上刊登的《开放金融市场议》一文系一稿多投。除贵刊外，我至少已在《财贸经济参考资料》1984年12期，《经济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财经科学》1985年第1期，《经济管理研究》1985年第1期，《上海金融研究》1984年12期，《新疆金融研究》1984年第12期上见到，内容完全一样。如此一稿七投的做法，有损文德，不仅浪费了编者的精力和时间，也是对读者的愚弄。希望贵刊能予公开批评，以杜绝今后再出现此类现象。

山东读者 韩 映

1985.3.1.

我们赞同韩映同志的意见，吁请作者不要一稿多投，以免造成社会浪费和不好的影响。

——编者

晚年的丘逢甲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徐博东

晚年的丘逢甲属于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这是不久前结束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热烈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衡量丘逢甲晚年究系何派，并不在于他是否在组织上加入过同盟会，也不在于其他别的，关键要看他：（一）是赞成还是反对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二）是赞成还是反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

根据上述两条标准，笔者认为，丘逢甲晚年的的确确已经完成了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大转变。他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派，而不是维新派和立宪派。

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者一样，丘逢甲对清王朝的认识以及对革命的态度也有一个由浅入深、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的确，在内渡大陆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丘逢甲对光绪皇帝抱有莫大的期许，希望他能发愤为雄、任用贤能，通过政治改良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收复台湾故土。正是抱着这种良好愿望，他在潮汕地区积极从事新式教育，用实际行动赞助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六君子”的殉难，给了丘逢甲以巨大的思想震撼，从此对维新保皇还是排满革命这两种不同的救国方案，在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1900年春夏，他奉粤东省局的派遣赴南洋各地调查侨情，得以和流亡海外的康、孙两派接触。丘逢甲虽与康党来往密切，在香港与他们会晤后还一起合摄了持刀并立小照，表示赞同康梁的勤王运动。但他在和唐才常私下纵谈时局时，却对两派作了如下评述：“清廷猜忌汉人素深，南海遽进以维新变法，既不知量，何况又思保皇？孙某所倡排满革命，名义甚正，然欲用会党防营以革命，亦不足恃，……以后革命其必先练十万学生军乎！”（曾养甫：《丘逢甲事略》）这次谈话表明，戊戌后的丘逢甲对康梁的维新保皇事业已颇表怀疑，思想已渐有同情革命的倾向。

丘逢甲是在同情而不是在仇视排满革命的基础上从事“教育救国”活动的。他对于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和对学生公开发表的革命言论均加默许甚至赞赏，这一点又使他与一般改良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1908年，中国知识界兴起了革命思潮，以章太炎、蔡元培等为首的上海爱国学社鼓吹种族革命，“岭东同文学堂”的学生争相起应，革命文字见诸国文课卷，对此，丘逢甲不仅不加干涉，还说：“此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同上）正因为如此，他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大都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孙中山领导

的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而这些革命青年学生又反转过来以他们的革命思想给丘逢甲以感染和启迪，促使他日渐摆脱康梁改良派的影响而向革命派方面靠拢。1904年，丘逢甲写了一首题为《赠谢生逸桥》的古诗，反映了他思想转变的端倪。诗曰：“人言谢生颠，吾未敢从众。与言世界事，谈言动微中。即令能颠亦复奇，终胜老生了无用。”（《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九）正是从这些“惊世骇俗”的革命青年身上，丘逢甲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新时代的曙光，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故自此渐倾向排满革命。

1905年夏，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次年初，谢逸桥以同盟会岭东主盟人的身份由日本返回家乡联络革命，行装甫卸，即与丘逢甲等联系，丘虽未加盟，但对谢所云同盟会反清革命宗旨却均表赞同。（温翀元：《同盟会在梅州的活动和梅城光复经过》）同年冬，他在与嘉应务本学堂监督黄某谈论时局时明确指出：“至保皇党之说，非不稳健，但时机已过，人心已去清室，康有为等无能为矣。”并断言：“清定不出十载必亡！但非革命军攻陷北京，而为各省独立使之自倒。”（丘琮：《岵怀录》）很明显，在革命还是保皇的大论战当中，丘逢甲的立场和态度已十分鲜明，这表明了他已初步转向革命。

丘逢甲政治立场的初步转变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上。据丘琮回忆说：“保皇党与同盟会的干部和我父亲都有往来。不过，戊戌前后和保皇党人接触较多，而戊申前后则与同盟会发生深切关系了。”（丘念台：《我的奋斗史》）

大量史料亦可证实丘琮之所云：当时，丘逢甲利用其社会地位和职务上的方便，安插重用了不少革命党人。例如，1906年他以两广学务公所参议的身份，委派罗福星前往南洋，表面上视察侨教，“实则推展革命”；（据《罗福星自白书》）又推荐林修明到广东警官学堂任事，使其与同盟会南方统筹部取得联系；他在兼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期间，又延揽朱执信、邹鲁到堂任教，支持他们在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使两广方言学堂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据点；（邹鲁：《回顾录》）1909年，丘逢甲当选为广东咨议局副议长，他又安排古应芬和邹鲁到咨议局秘书处任事，并在咨议局内积极协助革命党人陈炯明、邹鲁等禁赌风、兴女学、除弊政，使广东咨议局成了革命党人的又一秘密活动据点。

此外，丘逢甲和同盟会的岭东机关报——汕头《中华新报》的革命党人如叶楚伦、梁千仞等，以及和广东新军中的革命将领如赵声、倪映典、黄仕龙、饶景华等，也有十分密切的交往。据载，丘逢甲当时所作诗文，均投寄《中华新报》披载。“每寒、暑假由省里过汕，必至该报社与叶、梁等人诗酒唱和。”（曾养甫：《丘逢甲事略》）至今我们在《岭云海日楼诗钞》中仍可看到当时唱和的诗篇若干首。庚戌广州新军起义，事前党人商定：起义成功后推举丘逢甲为临时民政长官。（据张醒村：《庚戌新军起义前后的回忆》）丘逢甲与革命派的关系之深，可见一斑。

丘逢甲还利用自己的声望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多次保护过遇险的革命党人，从而使他的政治立场表露得十分明显。例如，1907年同盟会在潮州发动黄冈起义失败，广东当局企图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丘逢甲从中斡旋，以“防止株连，避免事态扩展”为由，极力劝

阻，1908年，梅县松口发生学潮，两广总督张人骏妄图借机镇压松口革命党人，奏请停办全梅学校。丘逢甲得讯，亲赴张人骏住所，“以华侨利害说之，一言而解”；1909年，嘉应州牧邹某拘捕一批革命党人，逢甲又“致过家门而不入，席不暇暖，即出省垣奔走”，设法营救。（以上史料均见丘琮《峒怀录》）此外，庚戌广州新军起义和辛亥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丘逢甲都曾挺身而出，不顾身家性命保护过邹鲁、陈炯明、姚雨平等一大批革命志士。（详见邹鲁《回顾录》和朱浩怀《姚雨平革命史》）

正是通过上述革命实践与革命党人的广泛接触交往，丘逢甲进一步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逐步转变成为一个思想更加成熟、行动更为坚定的革命者。翻开《岭云海日楼诗钞》，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丘逢甲的诗风已发生重大变化：他讴歌革命；他激励革命青年；他预言清廷气数已尽，革命必定成功。1910年，当民主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清王朝行将崩溃的时候，丘逢甲兴奋地说：“是吾志也，吾欲行民主于台湾，不幸而不成，今倘能成于内地，余能及身见之，九死无所恨也！”（江瓌：《丘仓海传》）明确表示了他对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和赞许。

同时也正因为如此，丘逢甲才遭到当局的疑忌，派员明访暗查，甚至公然以革命党魁名目列诸公牍、登诸报章。新任广州将军凤山还密奏粤省革命大绅以丘为首，准备就职后捉拿严办。但丘逢甲泰然自若。武昌首义成功，他欣喜若狂，赋诗讴歌。还积极配合革命党人，策动张鸣岐和李准倒向革命，并首肯作主，促成广东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尔后又日夜操劳，为筹建广东北伐军和调解广东军政府内部以及光复各县土客籍之间的矛盾而积极奔走，从而为广东光复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

此外，丘逢甲在出席南京会议组建临时中央政府期间，奔波于“上海广、肇、潮、嘉各帮殷商”之间，努力为临时政府筹措经费，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同时还对广东北伐军出征江北“调护备至，为之请炮械、请增援，为之向前途各军接洽”等等，为武装征讨清廷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后勤联络工作。（丘琮：《峒怀录》）他冒雪拜谒明孝陵，赋诗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胜利的无比兴奋之情。及至他扶病南归，途经厦门，还致电闽督孙道仁，请其速行召开省议会。电文曰：“革命扫除满清秕政，若一切仍旧，安用铁血为？”“民国新造，断非一、二人专制可以成功。”（丘复：《墓志铭》）这份电文再次表明：丘逢甲投身革命并非单纯从排满的狭隘民族意识出发，而是为铲除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建立崭新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

综观丘逢甲晚年的全部表现，不难发现：他主张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他赞成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并为此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毋庸置疑，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非维新派和立宪派。

晚年的丘逢甲是维新派和立宪派

郭汉民

辛亥革命时期的丘逢甲究竟属于什么派？有的同志说他思想上赞扬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组织上加入了同盟会，行动上又掩护过一些革命党人，是一个革命派。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诚然，丘逢甲返回大陆之后，一直致力于兴办近代教育，造就爱国救亡的青年志士，他的学生确有不少成为革命党人，参与了革命派所发动的起义。他主持谘议局期间，曾厉行禁赌，兴利除弊，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引用和掩护了一些有师生情谊的革命党人。武昌首义，各省响应，他也参加策划广东独立，担任军政府教育部长并作为广东代表赴南京参加筹建中央政府会议。他对辛亥革命的这些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说他加入了同盟会，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根据；说他曾会见并赞扬过孙中山，也提供不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可资考证。相反，他担任广东谘议局副议长，置身于立宪活动，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如果我们细心读一下他的《岭云海日楼诗钞》，研究一下他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他的社会交往和对当代人物的臧否，就不难发现，他不是革命派，而是地地道道的维新派和立宪派。

丘逢甲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和腐朽统治是十分不满的。但是，他不象当时的革命派那样，主张从根本上推翻这个政府，而是对它抱有幻想，希望它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能发愤为雄，改弦更张，励精图治，逐步加以改良，以实现富国强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甲午主张抗战、戊戌领导变法的光绪皇帝身上，反对慈禧垂帘，支持保皇勤王。他写道：“不须复古但尊王，一旅终兴夏少康……马上黄尘犹眯目，早教帘撤圣神皇。”^①他在《题太白醉酒图》诗中，认为李白之所以醉酒，是有感于天宝年间万事皆非。外有安禄山，内有杨贵妃。“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谁识先生非酒客，当时慷慨为勤王。”^②这种看法是否符合李白当时的思想实际姑且不论，如此借古喻今，却鲜明地体现了他自己保皇勤王的政治立场。虽然丘逢甲没有参加康有为的保皇会，但与全力支持康有为的南洋保皇会会长、新加坡侨商领袖丘菽园过从甚密；尽管丘逢甲没有列名主张保皇自立的中国国会，但对国会会长、著名的维新志士容闳博士非常仰慕，极加推崇，把他尊称为广东的“奇人”，亚洲的“先达”，中国的“爹亚”。1900年，容闳为寻求自主勤王的外交支持，游历欧美途经新加坡时，丘逢甲欣然与之会

晤。对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丘逢甲同当时所有的维新派（包括革命派）人士一样，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义和团“枉崇圣母无生法，难遣神兵御列强。”靠“白莲万朵开魔风”，无法战胜外国的“炮雨枪云铁飞舰”。^③因此，他赞成与帝国主义议和，欢迎清政府下诏变法，推行新政，称颂为“至尊薪胆劳明诏”。^④认为这样做，虽然迟了一些，但总比没有好，政府能卧薪尝胆，中国还有复苏的希望。1901年春，丘逢甲做了六首感春诗，其中二首云：“歌残伤水秋雁飞，北望胡尘泪满衣。愁对春风吟水调，六龙西幸不曾归。”“桃花春水涨前滩，待渡无舟欲济难。落日孤云心万里，望仙桥畔望长安。”^⑤其对于光绪的同情和回恋的期待，跃然纸上。

二十世纪初年，反清革命思潮勃然兴起，革命团体纷纷出现，会党和农民群众抗捐抗税和反洋教的自发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其中大多数都发生在丘逢甲的家乡——广东。例如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908年3、4月间的马笃山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丘逢甲的学生有的曾参加过起义，丘本人也曾掩护过参与起义的某些革命党人，但他本人不仅没有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而且对于这些武装起义和组织起义的革命党人是极不赞成的。有的文章根据丘逢甲有“纵横海外灌海内，已似洪流不可绝”的诗句，就说他“作诗赞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⑥并不符合丘逢甲的思想实际，上述诗句出自《戊申广州五月五日作》，该诗借写端午龙舟竞赛，“咏当时破坏、民乱、兵变、外侮诸情。”^⑦综观全诗，丝毫看不到他对革命运动的赞扬。相反，正集中反映了他对革命的恐惧，对革命党人的不满和对东西列国庇护革命党人，“乘内乱肆厥毒”的无限忧虑。他还警告赛龙舟的人们：“嗟尔健儿好身手，慎勿思起为梟桀。”显而易见，如何对待民众的暴动和新军士兵的反抗，如何对待此伏彼起的革命斗争，丘逢甲的态度与当时的革命派是大相径庭的。他敌视“民变”，恐惧“兵变”，反对革命党，害怕革命引起内乱，内乱招致外侮，图谋消弭革命，改良内治，抵御外侮，却十分典型地体现着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态度。

社会交往还可以为丘逢甲的政治立场提供佐证。定居大陆之后，他来往于官僚士大夫之中，与开明官僚和维新派人士尤相过从。打开他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就可以发现，其赠诗、唱和、心仪、言欢者，大都是这一类人物。前面提到过的丘菽园和容闳都是著名的维新人士。此外还可以举出许多。如黄遵宪、温仲和、张通典、汤寿潜等都是持立宪维新甚至是维新立宪派的人物。丘逢甲在广东兴办教育、运动立宪，曾先后得到粤督岑春煊、张鸣岐和布政使王人文等开明官僚的支持，因而与他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称颂岑为“南天一柱靖边尘，武纬文经百政新”，当岑移督云贵时，丘希望他有朝一日重返广东，“此邦宰相回翔地，愿祝重来啖荔枝。”^⑧他赞扬张鸣岐是“雄才”，张出任广西臬司后，他十分怀念。“一别一年久，相思日几回？”^⑨他称誉王人文为“俊杰”，当王将调去四川时，丘曾四度叠韵赋诗相送。在王临行前一日，他表示要“同扶日月尊皇极，再拓河山画禹州。”^⑩1909年晚清颇有作为的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病死，丘逢甲沉

痛地写道：“伤心元老骑箕去，（时张文襄告薨一原注）极目层霄把剑看。零落七星秋满地，天涯扶醉且凭栏。”^⑩相反，翻遍《岭云海日楼诗钞》，却很难发现辛亥革命前他与著名革命党人相交往的事例。这并不奇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丘逢甲的社会交往和对当代人物的臧否，正表明他不是革命派，而是维新派和立宪派。而身为谘议局副议长，更可以说是地方立宪派的头面人物。

承认丘逢甲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这不仅仅因为他领导过抗日保台的斗争，也不仅因为他掩护过一些革命党人，而且因为他热诚爱国，追求进步，大体上能顺应时代潮流，不失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志士和优秀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原来主张改良，未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但应该承认，爱国与进步却是他的主要思想倾向。

①、③、④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七。

②、⑤ 同上书，卷八。

⑥ 张九洲、彭乃坤、戴鹏：《爱国志士丘逢甲》，《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

⑦、⑩ 同①书，卷十一。

⑧、⑨ 同①书，卷十。

⑪ 同①书，卷十二。





罗浮山上的科学家葛洪

谈 史

葛洪，字稚川，晋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先祖于西汉时为强宗大族，累世出高官。葛洪生于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十三岁时丧父，家道已相当破落贫穷。从此他只能在耕稼之余，靠自己打柴来买纸笔抄书学习。其为人“不辨自矜饰”，“守常不随世变”，大智若愚，时人皆称之为“抱朴之士”，故洪以“抱朴子”自号。其所学，以儒、道两家为主，旁及诸子百家。因得从祖葛玄之弟子郑隐秘传，又得岳父鲍靓内授，故能兼通炼丹及医药之方术。曾应故人广州刺史嵇含之请南下，任含之参军。含遇害后，返故乡，长期潜心学术著作。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葛洪年已半百，欲炼丹以求长生，闻交阯出丹，遂固辞不就朝廷所委之史职，求为句漏县（今属广西）令。至广州，为刺史邓岳（岳或作岱）所挽留，遂隐居罗浮山。在山中边炼丹求仙，边采药行医及著述，写成医书《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洪后坐睡而逝，年六十一岁（一说八十一岁）。

葛洪在我国化学发展史上很有地位。他炼丹所用的主要原料是丹砂、雄黄、雌黄、硫黄、硝石、云母等。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他意外地发现了汞、硫、金、银、铅等元素的化学变化规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抱朴子·金丹篇》）。这实际是发现了硫化汞的化学反应可逆性。因此，正如伊博恩氏说：“炼丹术即现在化学的先驱，无疑是起源于中国。”李约瑟也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葛洪的炼丹术实际包含化学制药的萌芽，如“红

升丹”、“白降丹”等至今还为医家应用。

在医学方面，他大胆地对前世医家张仲景、华佗等以及医学古典《黄帝内经》的一些看法提出异议。认为他们的著作篇幅浩繁，兼所用多珍贵之药，不合贫家野居之用。因此，他搜罗民间简、便、验、廉的药方疗法，写成《肘后备急方》，该书之方“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见《肘后备急方》原序）。后人公认葛洪“此制利世实多”（见元朝段成己《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

由于葛洪既有群众观点，又敢于反对“是远贱近，是古非今”的旧传统，故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瘟疫学的认识。葛洪在分析急性热病的病因时，明确提出瘟疫、时行、伤寒三种，指出瘟疫与时行、伤寒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不是由于天气变化异常所致，而是由“病气兼挟鬼毒相注”引起。这“病气”和“鬼毒”的概念，是指各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如他称天花为“恶毒之气”，结核病为“尸注”、“鬼注”。尽管条件所限，他只能具体地描述其病状，而不能找出其中致病的细菌或病毒，但是他却比日本人桥本伯寿早一千多年描述了沙虱（恙螨）病的症状和原因。他说：“其（指沙虱）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便入其皮里……可以针挑取之，色赤如丹”，“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日烈草燥时差稀耳”。他还指出：“初得之皮上色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可说是了不起的发现。葛洪在这方面的

贡献,对以后瘟病学的出现和发展,有重大作用。

(二) 流行病学、寄生虫病学的先驱。他不仅对沙虱病的昆虫媒介“红恙螨”作了科学的记载,还把沙虱与疥虫作比较。他对疥虫的描述,较其他国家领先了八百多年。

他又是血吸虫病的最早描述者,《肘后备急方》说:“江南有射工毒虫”,“东间诸山县,无不病溪毒”。其对有关症状的描述,与现代医学对血吸虫病的症状的描述很接近。

他对疟疾的治疗更有卓越贡献。《肘后备急方》提到六种疟:疟疾、老疟、瘟疟、瘴疟、劳疟、疟兼痢。治疟的常用药有常山、豆豉、蒜、皂荚、鳖甲等,最宝贵的是他提出了青蒿抗疟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这不仅为古人提供了有效的抗疟方法,而且还为近代药理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线索。

(三) 对临床医学的贡献。如他指出:“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痛,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他虽然还不认识脚气病与维生素B₁缺乏的关系,但却提出了用含有丰富维生素B₁的药物,如大豆、牛乳、蜀椒、松节、松叶等治疗,比国外类似发现要早一千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葛洪之妻鲍姑也是名医,她尤擅以艾灸法治瘤和疣。她和葛洪一样在岭南留下了“仙踪”遗迹,留下了美好的神话。






“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解





张桂光


《周礼·春官·司尊彝》“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注》引郑司农云:“舟,尊下台,若今时承盘”。何以称承盘为“舟”呢?未见进一步的说明。

我认为这个“舟”字当为“盘”字之误,“皆有舟”实应作“皆有盘”。

李孝定先生曾经指出,“皆有舟”当作“皆有凡”,谓“凡”字“契文象承盘之形”“凡与舟异物而二者古文仅毫厘之别,后世多相混,进而凡亦舟矣。”(见《甲骨文字集释》卷八“盘”字条下和卷十三“凡”字条下)。李先生指出“舟”为字误,这是正确的,但认“舟”为“凡”,则似欠审慎。

在甲骨文中,不仅凡与舟应加区别,而且凡与盘也是不能混同的。盘形作,是竖放的圈足浅腹盘的象形,一边短而直(足底),一边长而弯(盘面);凡形作,是高脚深腹盘的象形,两边等长而作异向微弯;舟形作,是舟船的象形,两边等长而作同向微弯。三者的确形近,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细微,却是确实存在的。李孝定先生未能准确抓住它们之间的“毫厘之别”把它们逐一区别开来,在如何确切读破这个舟字的问题上,就只能功亏一篑了。

商周时代,形近的字或偏旁的混用是经常发生的。盘、凡、舟三者在甲骨文中虽大体分用,但已偶有讹混,西周以后发生误认、讹变等现象就更不足为奇了。从在金文中变作 (史颂盘)、在金文中变作 (追簋)看,盘、凡二者都有误为舟的可能,但从器制的功用看,作承盘的当然以圈足浅腹的盘比高脚深腹的凡更合适,因此,我认为“皆有舟”的“舟”不应读作“凡”,而应订正为“盘”。

诚然,盘与凡类属相同,可以按大类合而为一,而实际上“凡”字亦早为“最括也”的借义所专,它的原义也早同化到“盘”字中去了,但它们的关系是盘,凡自可称为盘,盘却是不可称为凡的。

艺术“商品化”与戏曲的形成

冯建民

一、艺术“商品化”的出现

在今天的社会中，人们到剧院中看一场电影、歌舞，听一场音乐会，则必须诉诸经济手段——花钱买票。现在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谁也不会引以为怪。但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怎样发生的，而这一情形的发生又在整个艺术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的问题，便很少人去追溯了。

对于上述情形，笔者叫它作艺术“商品化”。之所以不直截叫它“商品”，而用了“化”这个词，只是说明艺术在这种情形下，大体已具有了“商品”的一般性质，例如商品的两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艺术家创作艺术品，这艺术品中便包含着艺术家的劳动，因而便具有了“价值”的意义；而艺术品又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求，同时便也具有了“使用价值”。再如艺术的发展也遵循商品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自给形式”，到“简单交换形式”，再到“高级交换形式”等等（这一问题下面还要谈到）。当然，艺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还有自己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异之处，如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精神产品只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物质产品满足人们实用的目的，而精神产品只满足人们的“无目的的目的”（康德语）。因而，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艺术在这种情形下，确已具有了“商品”性质；而从整个艺术发展的过程看，确也曾经历过“商品化”这一转折，只不过艺术“商品化”是必须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方能发生的一种交换形式罢了。

在中国，艺术“商品化”这一事实，在唐、五代时发生了萌芽，而到了宋代则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宋代以前，各种伎艺的表演，大略可分为宫庭供奉和民间演出两大范畴。

宫庭供奉，据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从夏桀、至迟在西周已经有了专职的优人和乐人。《礼记·乐记》载：“及优保僇（儒），獫狝子女”；稍后，比较有名的秦有优施，楚有优孟，各代也都有数量不等的乐人。这些人长期供职于内廷，有一定的职位和俸金，他们的表演，一方面是服务于官方祭祀的礼仪，一方面则供贵族、官僚的宴飨和嬉乐。一般贵族、官僚所蓄家伎，也基本属于这个范畴。五代史有《伶官传》，南唐书有《谈谐传》，再后有《优语录》，就多是记述这类人事迹的。这些人虽可算作“专业艺人”，而且他们也以自身的伎艺换取生活资料，但一来他们只局限于宫庭或贵族之家，没有直接参加到整

个社会经济中来；二来他们都是统治者的私属和玩乐工具，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表演，绝不含有“交换”的意义。《唐语林》载唐宣宗谓优人曰：“我养汝辈，供戏乐耳！”一针见血，道出了官庭中一般艺人所处的地位。

民间演出，则大抵是逢年过节、赛神祭社之日，用以娱神或自娱，由农民群众自演自看，既不以此货取财利，也不以此维持生计。他们不属于职业艺人，他们的演出，大抵属于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一部分。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并不含有“交换”的性质。

以上两大范畴的演出，自尚不含“商品”的意义。

直至唐、五代时，民间伎艺表演这一范畴，开始呈现出“商品化”的倾向。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便是“红绡缠头”的典故，白居易《琵琶行》中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句子，李贺《许公子郑姬歌》有“官锦千端买沉醉”的句子。这就说明当时常是以锦缎作为酬谢歌者之值。这时的变化是，一不再白看；二非正式地交付货币。此外，唐时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跑江湖式的、零星的鬻艺者，如传说唐诗人韦应物之女，曾流落长沙，以舞《柘枝》为活。既持此以为生计，便知当时已有鬻艺之人。《全唐诗》录有天宝年间诗人常非月咏《谈容娘》诗，云“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马围行处匝，人簇看场圆。”更描写了江湖艺人在路边空阔地设场表演的情形。崔令钦《教坊记》载有玄宗时伎人张四娘事：“苏五奴妻张四娘，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谣娘，有邀逐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劝其酒。五奴曰：‘但多与我钱，虽吃髓子亦醉也’！今呼鬻妻者为五奴，自苏始。”（按，崔记无“亦姿色，能弄踏谣娘”八字，此据曾慥《类说》七增补）张四娘身在教坊，也常应邀到民间作伎艺表演，这里也多少透露出一些以伎艺换取钱财的消息。

唐时也出现了“戏场”，即当时所谓“和尚教坊”。寺院演出本为借俗讲，清唱宣传佛经教义者，但其为了多邀观众，借机多敛“香火钱”，渐次也变成了“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的娱乐场（唐赵璘《因话录》四）。唐时戏场多集于寺院中，钱易《南部新书》戊云：“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保寿”（按其皆为寺名）。《洛阳伽蓝记》长秋寺、瑶光寺、禅虚寺等条，也有记述。唐时似乎也有了结伙演出的“伶党”，据《陆文学自传》记陆羽不肯背儒事佛，乃遭凌辱，困于劳役，陆“舍主者而去，卷衣诣伶党，……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证明当时民间已有了专业艺人和伎艺表演小集团。

唐时出现的这一系列事实，说明了艺术“商品化”在唐代已开始萌芽。但这仅是初级阶段，伎艺表演并没有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一定地位，而少数人零星地、暂时地流动表演，还不能造成一种专门的行业，因而也不具有典型意义。

迨至宋代，伎艺表演才以蓬蓬勃勃、不可阻遏之势，以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事物，参加到商业经济中来。

艺术“商品化”这一事实，为什么会在宋代出现？宋代工商业空前繁荣是其最根本的原因。

宋代手工业异常兴盛，从造船业、印刷业、造纸业，到火药、火器的发明和应用，都在这段时期。此外，诸如纺织、制瓷、矿冶、采盐等，都有前代所不能企及的、规模宏大的官营和私营作坊。这些作坊都雇用数量很大的匠作和工人，城市和集镇还有大批个体手工业工匠和家庭手工业者，东京有所谓“百姓绣户”和“杂作人伙”，很多地区出现了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民户，叫做“机户”。宋仁宗时，仅梓州一地，就有几千家“机户”。

大批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必须有相应的市场进行销售。城市是人口集中、交通发达、消费量大的区域，因而大批手工业产品都辏集在城市进行交换和贸易，大大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宋时的人口高度集中，北宋都城东京和南宋都城临安，都达到了百多万人口。这里是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也是皇室贵族官僚吏役和“富商大贾所聚”之处，因之，当时城市中的那种繁华奢靡是可以想见的。宋孟元老의《东京梦华录》对于东京的繁盛景象有很多极为细致精彩的记述。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也描摹了宋时城市风物：街面上店铺林立，人烟辐辏，吆买喝卖，热闹异常。货行作坊，商店铺席，茶肆酒楼，吃食小卖诸处都是。当时著名的杨楼、八仙楼、樊楼，饮客常至千余人；还有所谓“夜市”，买卖交易“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东京梦华录》马行街铺席）城内城外“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同上）南渡以后，工商经济的发展仍持续不衰，据《梦粱录》载：当时临安“自大街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既无虚空之屋。”《都城纪胜》载：“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纱引交易铺仅百余家。”商业的发展，不问从形式上，规模上都不比东京逊色，有时超过东京。

纵观两宋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构成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宋代工商经济的高度发展，经济基础的调整和变动，使得中国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不能再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不动，而必须调整自己的步伐，去适应经济的发展。

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中除皇室贵族、官僚吏役外，还聚集了大批富商大贾、小业主、手工业者、小贩、杂作人伙和城市贫民，构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市民阶层。这批人一面经营工商谋取财利，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文化生活上也提出了新的需求。新产生的市民阶层，在思想意识上，已远不同于朴质的农民阶层，他们的文化水准与生活水平促使他们不但追求物质享受，而且更强烈地希望得到精神刺激和精神奢侈品。官庭供奉的演出，都被关在深宅大院之内，供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僚享用，市民阶层无从观赏；而民间的那种逢年过节方偶一出现，或者那种零星的、跑江湖式的伎艺表演，也远不能满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广泛而急切的渴求。形势迫使伎艺的表演必须适应社会和经济变动的需要，因之，唐代就已出现的那种艺术“商品化”的倾向，便被变本加厉地发扬起来。在这种状况下，专门以鬻艺为生的人便成批地涌现出来。他们以伎艺的表演去换取钱财，维持生计，造成了一种专门的行业。民间的伎艺表演，不再是仅作为一种娱乐的手段存在，而被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纳入到社会经济的轨道上来。

当时东京诸般伎艺门类丛杂，并且出现了一些艺术造诣颇高的专业演员，如“小唱”有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嘌唱”有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杂剧”有张翠盖、张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崔上寿等；“舞旋”有张真奴等；“诸宫调”有孔三传等。其它还有“弄傀儡”、“杂技”、“讲史”、“影戏”、“小说”、“弄虫蚁”、“商谜”等项，也都各有一些著名的表演者（以上均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各种伎艺云集城市，竞相争胜，互为影响，蔚为一代奇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精神产品第一次以商品的资格加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来，并为戏曲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和必要的条件。

二、艺术“商品化”刺激下的伎艺发展

艺术“商品化”的产生，刺激艺术表演必须适应商业性质，这便使伎艺表演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新的变革。

以下从几个方面加以分述：

首先，宋代民间出现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和相对固定的演出集团。

艺术“商品化”使得专门以鬻艺为生的演员，不能再停留在那种流动的、临时的、跑江湖式的表演形式。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文艺演出势必不能再如以前的随心所欲，或者偶一搬演，他们必须适应广大市民的要求。作日常的演出，这就需要选择固定的场地，规定大致的时间，进行营业，以便观众随时临观。因而形成了宋代著名的瓦肆（游艺场，又称“戏棚”、“瓦舍”或“瓦子”）勾栏（剧场）。瓦肆勾栏的出现，显示出宋代民间伎艺的发展，臻至一个崭新的阶段。

金末元初人杜善夫的套数中有《庄家不识勾栏》，其中写一位庄家汉到城里初进勾栏的印象：“当村许下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正打街头经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穰穰人多。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么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收哈。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垒垒团坐，抬头觑是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面合儿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这段曲子既称做《庄家不识勾栏》，就证明了在瓦肆勾栏中表演伎艺，乃是一种新兴的行业。曲子中则透露出艺术“商品化”的确凿信息，“要了二百钱放过”，说明当时的交换，已进入了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交换形式。

宋时瓦肆勾栏的大致情景，从解放前中小城市的游乐场里还能见其仿佛：在集中的一块场地上，搭有为数不等的席棚，各个席棚内表演各种不同的伎艺，有如曲艺、傀儡、影戏、地方戏、评话等；另有花色繁多的杂买、小吃麇集其中，吆买喝卖，喧闹异常。观者可以自由观赏，看一点表演、吃一点小吃，均无不可。即如天津旧时的劝业场，上海的大世界，也不过就是当年瓦肆勾栏的“现代化”。

宋时的瓦肆勾栏遍及城内外，据《东京梦华录》载：东京朱雀门外有新门瓦子，旧曹门外有朱家桥瓦子，祆庙斜街有州北瓦子，梁门西去有州西瓦子等。此外更有游乐场集中的地区，如东角楼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东京梦华录》）其规模之大，甚于今天的剧场。南宋杭州，据《梦粱录》和《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统计，城内外有二十余个瓦肆，《南宋市肆记》亦云，杭州“有瓦子，勾栏，自南瓦至龙山瓦，凡二十三瓦，又谓之‘邀棚’”。瓦肆中，少者一、二勾栏，多者数十勾栏，同时表演各类伎艺。著名的有如清冷桥西熙春楼下的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的中瓦子，市西坊内三桥巷的大瓦子（又名上瓦子），南羊棚楼前的北瓦子（又名下瓦子），盐桥东蒲桥边的蒲桥瓦子（又名东瓦子）。除了以上名命为瓦肆的演出场所外，四郊僻乡还有单独表演各种伎艺的勾栏，和白天经营茶酒，夜晚作场演出的酒楼、茶肆。另外也还有一批各地流入的所谓“路歧人”在广阔的场地作临时的表演（摆地摊）。“路歧人”这个名称，即起于宋代，“路歧”二字盖用以区别有固定演出场所的、称作“散乐”的艺人。再者农村里也还有走村游乡的卖艺人，宋陆游诗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就指的这种人。可见，这时的文艺表演者已形成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

宋时的瓦肆勾栏，已不同于唐时的“和尚教坊”，它不必再“假托经论”含羞脉脉地敛聚所谓“香火钱”，而是直截以娱乐相号召，绝不隐讳赚取财利的目的。他们不是什么人的“私属”，而是自由地以自己的精神产品与观众进行平等的交换。艺术已进入了以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交换阶段，艺术“商品化”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在这种有了固定演出场所的情况下，也促使艺人们开始作相对固定的组合。宋时出现了称作“班”或“甲”的演出集团，“演戏而以‘班’名，自宋‘云韶班’起”，（王楙《知新录》）后代的“戏班”之称，当来源于斯。据《武林旧事》所载“杂剧三甲”，一甲五人至八人不等，一甲之中，根据需和和各人所长，加以分工，大致分为末泥、副末、副净、装旦、等四色。角色的分工，也正是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此外，当时艺人除本名外，也开始以艺名相号召，如宋兴，注作“燕子头”，宋昌荣，“副，欢喜头”，朱和“次贴，衙前，鱗鱼头”，司进“丝瓜儿”，高明“灯塔儿”等（《武林旧事》卷四）。后世艺人之有艺名或诨号，固亦当以此为嚆矢。

其次，伎艺界组成了同业“行会”，并出现了民间剧作集团——书会。

由于艺术被作为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事物，投入社会，为了适应商业性质，为了统一步调，互通声气，相互照应，许多同类的“班”“甲”和伎艺团体，也效法商业的行会制度，组合成为“绯衣社”，（宋时各色人等都有一定的服饰穿著，伎艺人多著绯色衣），唱赚的艺人组成“遏云社”，耍词的艺人组成“同文社”，弄影戏的艺人组成“绘革社”，相扑的艺人组成“角抵社”等等。和其它商业行会一样，伎艺界也有自己特定的“行规”，有共同供奉的“行神”（伎艺界供奉的祖师是后唐庄宗，一说是唐玄宗）。封建行会组织，是商品生产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行会组织在保存和发展技术，传授经验，促进本行

业的巩固和发展都有一定积极意义，伎艺人的“绯衣社”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艺人的成批涌现，需要大量演出脚本，因而，同时开始有了编剧和撰词人组成的“书会”。《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有“书会”一项，其中有如“李霜涯——作赚绝伦；李大官人——谭词；叶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糊猕。”又，宋元戏文《小孙屠》题目下有“古杭书会编撰”字样。可见当时各项伎艺，从编到演都有了一套完整的、适合商业性质的组织系统。同业行会和书会的出现，使得伎艺“商品化”的特征愈益明显，这是伎艺发展的又一进步。

第三，各项伎艺的竞相争胜、互相影响，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杂剧。

宋代艺术“商品化”的出现，吸引大批艺人纷纷向城市集中，诸色伎艺各呈其妍，一座瓦子内往往有数十勾栏，同时演出诸般伎艺，各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表演争取、招徕观众。各类伎艺的集中表演和竞相争胜，势必造成演出质量的不断促进和艺术上的不断沟通。在这百卉竞芳的景况下，“杂剧”则吸收了多种伎艺的特点，以其一枝独秀的姿态，怒放于宋代艺坛。“杂剧”这一名目，最先见于辽代的散乐之中，《辽史》卷五十四载：皇帝生辰乐次，“酒一行，箫筑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奏、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这时的杂剧是何种体裁、何从结构，现在已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它至多只能如宋初杂剧那样，是以滑稽讽刺为主的游艺性质，与后来的宋杂剧和金院本那种兼杂歌舞、搬演故事的形式有很大不同。这时的杂剧之“杂”，大约是仅表示其不入正乐，酒余饭后可资一餐之意。而后来的杂剧之“杂”，则演为对故事歌舞杂收并蓄的意思了。宋之前的各色伎艺，一般均包括在百戏散乐之中，所谓“百戏杂呈”，就是各色伎艺作轮流、交替的表演，不相混杂。降至唐代，产生了如《大面》、《拨头》、《踏谣娘》之类类似杂剧性质的伎艺，但它们仍包括在散乐之中，参杂在许多伎艺里面表演，未能作单独的做弄。宋时，瓦舍中杂剧已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单独表演。专为杂剧编撰的脚本也非常浩繁，《武林旧事》记有官本杂剧段数共二百八十本；元陶宗仪《辍耕录》所列院本存目六百九十种，由此可知当时杂剧之盛。

促使杂剧发生的另一原因是，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对于要花钱观赏的职业艺术集团的要求及其本身的欣赏水平也相应提高。他们逐渐不再满足于只看一些单纯的歌舞、单纯的滑稽调笑和缺少视觉形象的故事讲说，他们希望看到一种综合的艺术，需要一种能够活生生地反映世态、人生的艺术样式。艺术“商品化”使艺术表演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因此，观众的兴味和好尚，自然而然成为艺人努力创造的方向，艺术必然要走趋奉时尚的道路，而观众的好恶也成为一条衡量艺术的重要准则。形势迫使演员不能再单操一门伎艺，而必须要兼习百戏中的其它艺术形式，如杂剧演员必须兼擅音乐、歌舞、打诨、武术，还要学作人物的扮饰，故事的演述等等。杂剧的出现，使百戏散乐中的各项伎艺，第一次得到广泛的综合，也同时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初具戏剧演员特质的人才。

杂剧虽然本身在百戏中发生较迟，但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艺术表演形式。到了南宋时，“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梦粱录》伎乐条）杂

剧已成为超出其它各项伎艺之上的艺术门类。到了元、明以降，戏剧形式更已独霸艺坛，民间固定的演出场所，差不多全部被戏剧占领。其它各项伎艺，如滑稽、杂技、傀儡、影戏等，都被相继排挤出去，以跑码头、卖野药的形式来继承它们的余绪。尤以歌舞一项，甚至步到了绝灭的边缘。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云：“古歌变为胡曲，既已绝响，而舞尤失传。今优场中走三方、摆阵跌打之类，皆其遗意。”可知戏剧一项，以风靡一切之势，在整个艺术发展史上，占有何等显赫的地位。

当然，宋杂剧仍是尚未完全成熟的戏曲形式，《梦粱录》谓其“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多少还保留了初期杂剧以滑稽逗乐为主的意味，但此时杂剧已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表演形式，却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戏曲形成所需要的条件，本来大体散处在百戏散乐之中，一旦这些条件得以恰当的综合，中国戏曲便将呱呱而堕。宋代杂剧已大体具有了后世戏剧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诸如故事情节，人物扮饰，歌唱、伴奏、唸白、打诨，舞蹈化的动作，武技的穿插等等。而后，在这样丰厚的基础上，至元代产生了完全成熟的戏曲——元杂剧。

当然，戏曲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决非“商品化”一端所能笼括。故而，本文仅只大略理此一条线索，以供有识者讨论。



广东社会科学院举行首届科学讨论会

三月六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举行首届科学讨论会。大会收到包括哲学、经济、历史、人口、文学、法学、科社和社科情况、图书等学科的论文四十九篇。分别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香港现状问题研究；香港史研究；体制改革与科学方法论；图书情报的体制改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广东人口问题研究和关于文学观念更新等八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索。大会还对该院（含社联）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度的四十七项优秀科研成果和五项优质科研服务奖的获得者授奖。（黄绍汪）

以诗论诗之弊

欧阳世昌

以诗论诗是一种特殊的体裁。一方面，它是诗，所以就要受到声律、篇幅的限制和束缚，不能象散文那样曲折达意，因此就常常因文词的晦涩而引起误解，产生歧义。另一方面，它又是论，因而就离不开说道理，但这些道理并不是用三段论法来证明，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去表达，所以它又常常显得拐弯抹角，端倪难寻。这不能不说是以诗论诗的一大弊病。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由于文词简约，后人在解释时就常加穿凿，结果对其本意的理解也就难趋一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或云初唐四杰之作“比之汉、魏则劣，然其于《风》《骚》之旨则近”；（汪师翰《诗学纂闻》，转引自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或云四杰之作“劣于汉、魏之近《风》《骚》”。（浦起龙《读杜心解》）这两派意见都各拥有其人。又如“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一首，分歧意见更大。有人认为杜甫在轻贬四杰，如赵次公云：“四子之文，大率浮丽，故公以之为轻薄为文，而哂之未休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刘克庄也认为“杜子美笑王、杨、卢、骆文体轻薄。”（《后村诗话续集》）他们的意见是认为“轻薄为文”的主语是四子，而“哂未休”的主语则是杜甫。还有一派意见认为杜甫是推尊四子，持此见解的占多数人。今举其代表证之。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此表章杨、王四子也。四公之文，当时杰出，今乃轻薄其为文而哂笑之。岂知尔辈不久销死，前人则万古长垂，如江河不废乎！”洪迈《容斋四笔》云：“‘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流’指四子也。”郭绍虞案云：“谓杜甫笑王、杨、卢、骆文体轻薄者，妄也。然谓杜推尊四子，而以轻薄为文指后生嗤点之辈，则亦未当。……故‘轻薄为文’四字为讥哂四子之语。但此非出于杜，而出于时人。”（以上引文均见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郭绍虞的意思是：时人以“轻薄为文”之论讥哂四子，而杜甫认为以“轻薄为文”来哂笑四子是不恰当的，故讥哂者亦终于身名俱灭矣。郭绍虞的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它对于廓清前人的谬说起了很大作用。为什么短短几句诗竟会引起后人那么多分歧意见？我们引了上面这么多资料，目的就是想说明：由于诗歌这一文体的限制，使作者必须把自己要说的的问题浓缩在很小的篇幅内，简炼再简炼。也正是这一原因，使作者往往把诗论写得文词晦涩，读者必须推敲再三，根据作者一贯的态度主张来加以阐述。遇上作者著述少、生平不详的情况，有时真简直难以求得其本来意义。这样

一来，穿凿附会、痴人说梦之类的情况就会产生，也就使意见出现更多的分歧。

诗歌的形象思维特性，使我们对论诗之诗的理解，经常要在牝牡骊黄之外而求其意义之所归。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有云：“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著书生待鲁连。”此诗究竟是论李白还是论杜甫？诗中没有明言。由于诗中用了“银河落九天”、“憔悴饭山前”这样一些形象性语言，人们就在推测原意中纷纭其说了。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认为“此妙于借拈李诗以论杜诗，可作李、杜二家笥钥”。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都认为这是论李白的。拙见认为翁方纲之论较当：“银河落九天”，是借李白诗以喻杜甫才华横溢，“憔悴饭山前”，相传李白曾在饭颗山嘲笑杜甫作诗太苦而消瘦，而元好问却认为杜甫并未刻意雕琢，为诗而瘦，“何曾”一词即表明了这种态度。此句若说是咏李白的，则殊不可解。而且，杜甫忧国忧民之心至老不衰，这是那些乱写乱画的脱离现实的诗人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不能把杜甫作为一般的书儒看待。此诗之所以能使人们的理解不同，是因为诗中的形象引起的。本来，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不应违反的。没有形象的诗就不是好诗。然而，这在论诗之诗中却偏成为一种局限。立论之不明确，说理之不充分，加上形象之捉摸不定，使作者的原意不能鲜明地诉诸读者，直接地影响了诗论的表达。

我们再看看元好问的另一首诗：“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诗中横槊建安中的形象性描写，使游国恩等人把曹刘之曹误解为曹操（曹操有横槊赋诗之传说，苏轼的《前赤壁赋》又用了此典），认为此诗“把刘琨与曹操相比，感叹他未能实现雄心壮志”（见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其实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曹刘应指曹植和刘楨。钟嵘《诗品序》说：“曹刘殆文章之圣”；严羽《沧浪诗话》论“曹刘体”时就直说“子建、公干也”。确实，曹植之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楨之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它们都具有建安风骨。而“横槊”一语，也只是形象地说曹刘之诗充满豪气而已，如以“横槊”一语专属曹操，则是误解了。这种因诗的形象而使人们费力去寻觅、捉摸作者本义的例子，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则更多。诚然，二十四诗品之每一品，都有题目标明，但其中的某些具体诗句究竟说的什么，却往往很不明确。如《雄浑》的“返虚入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如《形容》的“俱似大道，妙契同尘”；如《洗炼》的“乘月反真”，“载歌幽人”等，其形象就说得很冥漠恍惚，虽或可从题目中去揣度，然其准确之义终在远处，使人大有如在“虚无缥缈间”之感。这种使人摸不着头绪，对诗的理解与诗的本义终隔一层的结果，应该说是以诗论诗的弊病之一。

形象性的优点带来了流于晦涩难解的弊病，而篇幅短小又使以诗论诗显得零敲碎打，缺乏系统。因而以诗论诗的另一弊病就是琐屑零星。

我们先看看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这是杜甫有意为之的组诗，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六首诗里，杜甫说了很多问题：评论作家要全面，不要只看到一面（“庾信文章老更成”，不能因徐、庾之体而否

定庾信之凌云健笔)；评论作家不能脱离历史条件(“王杨卢骆当时体”，尽管四杰之作尚未摆脱六朝诗风，但这是时代使然，不能苛求)；艺术风格要多样化(“翡翠兰苕”、“鲸鱼碧海”)；要多方面地学习、继承(“递相祖述”、“转益多师”)，等等。六首诗，谈了很多问题，但每个问题都只是涉及到，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深入地去阐发。这样，后人要探讨杜甫的诗歌理论，就只好从这些片羽半鳞中去寻求，去整理，并对这些较零碎的毛甲进行一番织补工作，使之成为一件完整的物品。但一经织补，就难以不加入织补者的主观见解，甚至会背离了杜甫的原意。要从零碎的论诗之诗中窥测作者的诗歌理论体系，确是一件难事。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是按一定的标准去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的。“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元好问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对汉魏以来的各诗人、各流派进行分清泾渭的工作，对历代诗论家的褒贬不一作一番疏通开凿，在这一贯的疏凿微旨中反映出他的诗学理论。其宗旨和目的是很明确的。但由于这三十首诗重在作家的评论上，而在各首之间又不要求意思的连贯性，因而也就没有对诗歌的理论问题作比较系统的研究。这里敲一棍，那里打一棒，我们也就不易掌握它们的核心所在。固然，我们可以从这三十首诗中整理研究出元好问的诗论主张，如主张自然真淳，反对堆砌雕琢；提倡豪放刚健，反对纤弱柔靡；提倡汉魏风骨，重视独创精神等。但这些理论问题在论诗之诗中都不能详尽地加以阐述，人们对作者的主张还只能窥见其一斑。杜甫和元好问的已算是比较完整的，它们都各能自成体系。但他们尚且失之零碎，那么其他人所写的论诗之诗就更是琐屑碎乱了，而且又大多停留在评论作家上，涉及理论问题不多。总之，以诗论诗纵使能够涉及很多理论问题，但总给人一种散乱之感。象王夫之的《夕堂永日绪论》那样讨论诗歌理论，象叶燮《原诗》那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论诗之诗是无法做到的。

上面我们简略地谈了以诗论诗之弊。这样做，并非是否定这一艺术形式，而是为了探讨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论诗体制。我私下揣度，用同一文学体裁去讨论其理论问题，是难以深入全面的。正如我们很难用小说的形式去探讨小说理论一样，用诗论诗也是很难做到系统性的(以文论文却是例外)。当然，前人论诗之诗确有许多真知灼见，是一份很可宝贵的文学遗产。而直至今天，运用这种形式来评论作家作品的，尚不乏其人，也可见这种形式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新书评介



评《中国式经济体制研究》

王 珺 袁耀文

我省经济学家王琢撰写的《中国式经济体制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丰富的材料和求索的精神,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见解,是近年来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的成果之一。

该书的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三、四节,主要是总结我国经济体制三十年来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了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和改革这种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五、六、七、八节,是作者系统论述自己理论观点的部分。作者在分析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理论支柱问题。第三部分包括第九、十、十一节,是作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所进行的系统设计和构想。书的末尾附有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可以看作全书的总结。

下面我们就该书的基本理论观点作简略的评介。

作者认为,根据我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剩余产品率低,商品率的特点,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仅不应当限制商品生产,不应超越历史阶段去推行产品生产,而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阶段限制商品生产,就会束缚社会生产力,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是限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是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前言”,第2页)因此,作者主张改变现行的以政企不分为主要特征的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政企分开的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作者在考察了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和一些城市实行扩大企业自权之后的新鲜经验,认为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模式——中国式经济体制雏型正在形成。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模式,又不同于苏联的模式,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面对这种新形势,作者既感到欢欣鼓舞,又感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因而提出了创立中国式经济体制理论的倡议。作者本着争鸣的精神对中国式经济体制理论的内容作了有益的探索。

(1)关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问题。作者认为,分析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不能只停留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进行论证,而必须从所有制的分析深入到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关系结构。我国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关系结构存在着两个层次,即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属于社会范围的联合劳动、按劳分配,这是第一个层次;企业作为生产资料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属于企业范围的共同占有、联合劳动,这是第二个层次。明确区分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两个层次,才能明白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关系,也才能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相互关系。我

们认为，作者这个“两个层次论”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给以适当的分开，既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又符合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无疑是前进了一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的相互结合问题。作者认为，商品生产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计划经济属于经济调节体系的范畴。

“生产形式与经济调节体系不是对立的经济范畴。生产形式是指生产者，或者是指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而经济调节体系是指怎样调节生产者、企业之间的经济活动，怎样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问题。”(第161页)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它与计划经济不仅需要结合，而且能够相互结合。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相互结合的理论，是中国式经济体制的理论支柱。我们认为，这个理论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为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3)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问题。作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巩固发展，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在现阶段，只能由国家来行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基本内容。作者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国家经济职能的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采用行政控制手段的管理形式，另一种是采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的管理形式。前者适用于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者则适用于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把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取消国家的经济职能，只是改变其实现形式。任何取消或者削弱国家经济职能的做法都不利于实现宏观经济平衡。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实现微观放活，宏观管住的改革目标是有参考意义的。

(4)作者运用系统分析法，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了总体构思和设计。他把经济体制分为两大结构：即基础结构和上层结构。基础结构包括生产、流通和分配三大组织体系，上层结构包括经济管理、经济调节和经济监督三个体系，并探讨了各体系的职能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强调说，整个社会经

济发展的决策、管理、调节和监督，必须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也要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过去把企业变成不拨不动的“算盘珠”，成为具有外有压力、内有动力的活细胞。这个设计虽是粗线条的，但它在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趋势方面却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当然，该书由于写于1982年至1983年间，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分析也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作者不赞成使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计划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和本质的东西，如果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就会冲淡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会模糊两种社会经济制度模式的本质区别”。而主张使用“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的概念。(164页)其实，社会主义既存在商品生产，又存在商品交换，这两方面就已经构成了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属于商品经济，两者的根本区别最主要是：(1)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2)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其范围也是不同的。对于这些区别，作者是承认的。作者之所以不主张使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的局限性，反映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的曲折过程。又如，作者为了集中研究和说明中国式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与此有关的一些经济范畴：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国家经济职能及其实现形式，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模式等，但是对这些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没有论述或论述得不够清楚，这就使人感到这些范畴在定义上不够严密，在内容上有些交叉的现象。

尽管该书在理论上有这样那样的不成熟之处，但瑕不掩瑜。而最可贵之处，是在于作者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研究面向实际，他对我国正在深入广泛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理论基础所进行的科学论证，这种系统性、专门性和理论的深入性，是少见的。我们深为感到，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当坚持这个正确的方向。该书值得一读。它对于开阔我们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会起一定的启发作用。

《阮啸仙文集》简介

刘林松

为纪念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阮啸仙同志牺牲五十周年，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学习室和广东省档案馆选编的《阮啸仙文集》，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阮啸仙从1916年至牺牲前的绝大部分文章、讲话、书信，计81篇，26万余字。

阮啸仙是广东河源义合区人，生于1897年8月17日。青年时代的阮啸仙就广泛研读了诸子百家的著作，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从历代爱国者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接受启迪和激励。他也饱读了所能收集到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书籍，接触了资产阶级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从而萌发了变革社会的愿望。《文集》的首篇《洪秀全论》及第二篇《黄种白种之智力论》，都是他当时的作文。在前一篇作文中，他高度评价了近代爱国主义者洪秀全的历史功绩。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列举四大发明的史实，批驳了所谓中国黄种人其智力不如白种人的谬论，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所患者自满自足，不能振刷”，“徒泥守成法，而不知进步”。

1921年，阮啸仙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集》收入了他在这一年写的四篇以及翌年写的三篇文章。文章表明了他已开始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察、分析中国的国情。其中，《社会主义与军人》一文，引用了马克思的论断，指出取得革命胜利的第一步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军队——赤卫军。”

党的“三大”前夕至1924年10月，阮啸仙担任团广东区委书记。在这期间，他给陈独秀、施存统、恽代英、邓中夏和团中央写了不少信，《文集》收入的就有33篇之多。这些书信，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党在这段时间的历史，特别是广东党团组织的历史，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有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1924年10月，阮啸仙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和彭湃

同志等一起领导广东农民运动，并担任第三届农讲所主任。在斗争实践中，他不仅指导和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作了广泛的研究。《文集》收入这方面的文稿有30篇。他于1926年撰写的《中国农民运动》，是我党领导下的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是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的理论意义在于：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概括了农民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及其历史必然性；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论述了农民运动发展规律及其斗争内容；提出了农民运动的政策和策略。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阮啸仙在革命的转变关头，积极参加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在朱德同志的支持下，他在仁化领导了农民暴动，建立了仁化苏维埃。《文集》收入的关于仁化暴动的两个报告以及他在1930年写的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的9篇文章，反映了他对建立和发展苏维埃，建立和发展红军的认识。他认为，在上述两项工作中，不能忽视无产阶级的教育问题，以及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问题。

阮啸仙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在白色恐怖下，辗转于天津、辽宁、上海，坚持党的地下斗争。《文集》收入的他在这期间给亲朋、家属的3封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地下斗争的艰难复杂，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

1934年，他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这期间，他起草、审阅签署了一系列工作总结。这些工作总结，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显示

了他从事经济工作的才能。

《给林匡、刘英的命令》是《阮啸仙文集》的最后一篇。1935年3月3日，任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的阮啸仙同志率部转移。翌日，部队在信丰、大余交界的马岭被阻。他当即发出了这个命令，要被敌分割的部队毫不犹豫地以连或两连为单位迅速分别突围。3月6日，阮啸仙在作

战中壮烈牺牲。

当年，陈毅同志在惊悉阮啸仙和贺昌同志先后殉难的噩耗时，曾写一首催人泪下的感人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诗中的“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等句，正是阮啸仙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今天，在我们读完《文集》后，掩卷之余，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印象。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纪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十二月

- 1日 广东经济学会开会传达“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精神。
- 1日 广东历史学会和《学术研究》编辑部联合举行广东青年史学工作者座谈会。
- 3—8日 文学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暨南大学召开。
- 3—8日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在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通什镇举行。
- 4—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广东进行调查研究，勉励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努力。
- 6日 广东省统计局和广东省统计学会邀请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作《关于统计改革问题》的报告。
- 10日 辽宁财经学院院长佟哲晖教授应广东统计学会邀请，作题为《两种产值指标（中国与西方）的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
- 12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总干事童大林和广东经济学界卓炯、王琢、张元元、黄伟泉等同志，座谈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理论问题。
- 13日 广东科社学会开会传达全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会议精神。
- 14日 广东伦理学研究会开会传达全国伦理学学术讨论会精神。
- 15日 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应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委党校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广东分会的邀请，作《计划体制改革与运用价值规律问题》的学术报告。
- 17日 广东省社联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谈关于当前改革的问题。
- 17—22日 广东省农村金融学会和农村金融研究所主办的有关多种信用形式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市召开。讨论会共收到论文及调查报告三十篇。
- 18—20日 广东党建学会佛山分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佛山市举行。
- 19—20日 广东省和广州市四十多位青年实业家、理论工作者参加由广东《希望》编辑部发起的《改革与观念更新》研讨会。
- 20—21日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农村金融学会成立。
- 20—25日 广东省纪念丘逢甲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市和梅县市举行。来自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和广东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丘逢甲的亲属一百一十三

人出席了讨论会，并提交论文四十一篇。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广东历史学会、广东中国文学学会、广东教育学会、梅县地区和蕉岭县联合主办的。

21—25日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百〇五人出席了讨论会，并提交论文七十七篇。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华南师大历史系和广东民族学院政史系联合主办的。

23日 美国伯克利大学穆素洁博士应广东历史学会邀请，作《明清广东蔗糖业研究》的学术报告。

24—28日 广东省第三次人才学学术讨论会暨一九八四年年会在罗浮山和广州市举行，共收到论文三十九篇。

25—28日 广东教育学会举行第七届年会。

27日 广东历史学会邀请四川财经学院汤象龙教授，作《关于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28日 武汉大学历史系彭雨新教授应广东历史学会邀请，作《从封建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影响看封建财经政策的作用》的学术报告。

28日 广东省价格学会开会，传达全国第二次价格理论讨论会精神。

29日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仲方应广东省法学会邀请，作关于开展法学研究问题的报告。

关于“两变”命题第二次学术 讨论会的观点简介

广 哲

继一九八一年第一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下简称“两变”）命题学术讨论会之后，广东省哲学学会和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于今年初在广州再次举行了这一命题的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位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会议。现将有关主要论点简介如下：

一、关于如何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两变”命题的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把“两变”命题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加以开拓，就理论本身来看，必须探索“两变”怎么变，它的中介、条件是什么？围绕这些议题，与会者探讨了：

1. “两变”和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概括的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物质，就是人们感性的实践活动，精神就是人们理性的思维活动。因而，这里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与哲学基本问题中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许多人都不同意把物质和实践等同，也不同意把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完全等同于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因为物质和实践是不同的哲学范畴。而且，在认识论领域，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虽然有联系，但是也有差别。其中，有的同志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同“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虽然同属于一个认识过程，但是，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两变”是着重从认识与认识对象、认识内容的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认识运动的规律；而“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则着重从认识与认识的基础、源泉的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认识运动的规律。有些同志则认为，“两变”着重于揭示认识过程的目的和结果；而“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则着重于表现认识的具体过程和途径。

2. “两变”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有的同志认为，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同主体与客体，都是认识论的三对基本范畴。这三对基本范畴，不仅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也是整个哲学的基本范畴。这三对范畴彼此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许多人都指出，“两变”的过程，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要正确发挥主体在“两变”中的自觉能动性。有些同志认为，主体在“两变”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主体的社会实践作用。第二、主体的专业知识作用。第三、主体的高度智力作用。第四、主体的科学方法作用。所有这些都属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正确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就能取得“两变”良好效果，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3. “两变”与信息的关系

许多同志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两变”命题的研究要引向深入，也应该注意从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现代科学的新成果中吸取营养。有些同志把信息引进“两变”中，认为信息和实践一样，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人们从事一切实践活动，首先获取信息，利用信息，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信息去认识世界，通过实践去改造世界。否则，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可见，人们的实践活动，无论是物质变精神，还是精神变物质，都是离不开人脑以外的客观世界的信息的。信息实际上是“两变”赖以产生的必备前提。在今天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材料、能源、信息是现代科学的三大支柱，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信息流，从信息输入到信息加工，从信息输出到信息反馈，从实践中来达到认识再到实践中去，从物质变精神再从精神变物质，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而信息的收集和加工，则是实现物质和精神相互转化的纽带和桥梁，是实现“两变”不可缺少的具体形式。

二、关于“两变”与“两种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

把“两变”问题的讨论推进到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之中，是近两年来尤其是这次“两变”讨论会的一大进展。

1. “两变”同“两种文明建设”的关系怎样？

多数同志认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既然“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就包含有物质文明可以变成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可以变成物质文明这样“互变”的关系，而这种“互变”的关系又是以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两变”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基础的。在如何理解“两种文明建设”的“互变”与“两变”这一哲学基础的关系时，许多同志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物质同精神、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是：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人脑物质的机能或属性，是物质的反映。这是从物质和物质的属性上划分的。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则是分别从物质内容和思想内容方面体现社会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从表现形态及其作用上的鉴别，可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不是本原和派生的关系，不能等同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两者的联系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受物质和精神的制约，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作用、互相包含、互相为条件的关系，是以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为前提的。这有三个方面的表现，①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②物质文明的发展将大大促进精神文明建设；③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和保证作用。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作用，主要有三点：①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全民中增强精神动力和战斗意志，同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保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将造就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勇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一代新人，他们既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又有发达智力和广博知识，将成为新的科学革命的主力军；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带来的科学变革，必将引起许多新的重大的技术革命，从而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有的同志认为，从上述角度上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关系，是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关系的具体化。

2. 社会主义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怎样转化？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转化问题，认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相互转化各有其特点。从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产品的过程来说：第一，精神产品首先作为一种物质生产资料，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是实体形态的而不是观念形态的。第二，这种作用的结果，同其他物质生产资料发挥的作用凝成一个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不论形式或内容，都是物质的，即物质产品。第三，在整个转化过程中，是物质生产者使精神产品与物质生产相结合变为一种物质生产资料，也使这种物质生产资料与其他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而最终变为物质产品。第四，一般来说，精神产品向物质产品的转化过程，是精神产品得以推广和普及的前提，重点在于普及，在于精神产品物质化，以便投入下一次的物质生产过程。从物质产品转化为精神产品的过程来说：第一，物质产品一旦进入精神生产领域，就成为一种生产资料，并在精神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是观念形态的而不是实体形态的。第二，这种作用的结果，同其他生产资料发挥的作用凝成一个综合体。这个综合体的形式是物质的，内容是精神的，也即带有物质外壳的精神产品。第三，在整个转化过程中，是精神生产者使物质产品与精神生产相结合变为一种生产资料，也使这种精神生产资料与其他生产资料相结合最终变为精神产品。第四，一般来说，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的转化过程，是物质产品得以改进和提高的基础，重点在于提高，在于拿出更好的设计蓝图，以便投入下一次的物质生产过程。纵观社会主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仅各自本身有个不断从低级到更高级的发展问题，而且相互之间也有个不断从低级向更高级转化的问题。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愈发展，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之间的转化速度和效果就愈显然。

三、关于“两变”原理的应用研究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要把“两变”原理的研究引向深入，就必须结合当前工作的实际情况，加强应用研究。

1. “两变”原理与党的思想路线

一些同志认为，毛泽东提出“两变”命题，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全部过程和发展规律，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理由如下：第一，它强调认识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突出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前提。第二，它说明了理论对于实践、精神对于物质的巨大反作用。第三，它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第四，它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实际上，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世界也就是物质变精神的过程，通过社会实践改造世界则是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因此，从认识论看，共产党人的工作就是要做好“两变”的工作，做好物质和精神相互转化的工作。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际上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尤其是“两变”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从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我党十二大新党章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新的表述，可以看到党的思想路线，其核心是实事求是，其实质则是在解决实际工作中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问题，它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整体，充分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的全过程。首先，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党的思想路线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性质，也使“两变”原理具有更为坚实的唯物论前提。其次，它明确地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认识论的辩证法，从而揭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必要条件和必经环节，使“两变”更加具体化。最后，它还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纳入党的基本路线，既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说明了实践在“两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突出了认识过程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意义，从而说明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即“精神变物质”的意义更加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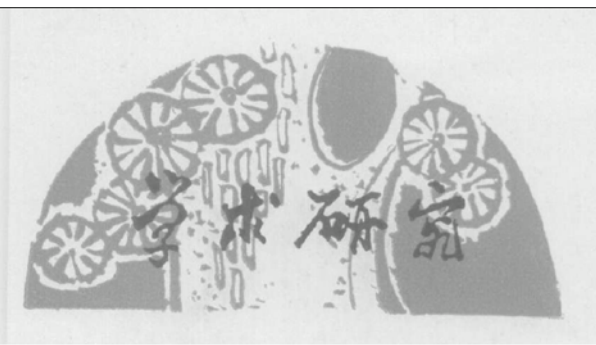
2. “两变”原理与当前四化建设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我们党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在建设四化伟大实践中研究和应用“两变”原理，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当前，特别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即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

这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运动总规律，树立“再认识”的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规律，促进四化建设的发展。②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依据“两变”原理，一方面要批判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精神万能论”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批判那种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提倡把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充分地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③重视社会实践在“两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我党领导工作方法的经验教训，以“两变”原理作为指导，吸收西方现代决策理论的精华，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领导科学。本来，领导的基本职能应该说是一个管理的问题，一个实践的问题，但过去我们认识不足，往往只停留在一般号召和一般鼓动上，这是必须改变的。

3.“两变”原理与改革

许多同志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它能够指导改革实践，为改革实践服务。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在改革中贯彻“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原理，就可以更好地制定出一整套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科学的领导方法，指导改革，推动改革，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并且取得改革的圆满成功。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原理包含着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论思想。在改革中贯彻这一思想，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是要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出发。这是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就能更好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③“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原理，既坚持物质决定精神，同时又强调精神对物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改革中贯彻这一思想，掌握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就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扬革命的变革精神、创新精神和勇于开拓的精神，改造客观世界。④依据和贯彻“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互相转化的原理，就能使我们在改革中更加自觉地努力改变落后的局面，使落后变先进，使先进更上一层楼，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总第六十九期

13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2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0.40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095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